

# 学术研究

## ACADEMIC RESEARCH

Journal For World World Exchange  
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

ISSN 1000-7326

总第100期

1990 · 3



广东仪表厂是机械电子工业部  
重点骨干企业, 定点生产工业自动化  
仪表及工业过程控制系统成套装置。

厂址: 广东省肇庆市星湖东路七号

电话: 233027

电挂: 0202

邮政编码: 526040

厂长: 严新江



省级先进企业

# 广东高要无线电厂

厂长：李焕球

本厂是全国瓷介电容器生产基地之一，年产瓷基片10亿片，电容器1.5亿只，主要产品有CC1、CT1、CC81、CT81型系列瓷介电容器及电容器瓷基片，GC型系列船用充电器、CSGD型系列船用变压器以及收录音机等，以上产品均获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和国家船招局颁发的生产许可证、型式认可证书和采用国际标准”证书，其中G C A型系列船用充电器、CC1型瓷介电容器获省质产品奖，CT1、CC1型瓷介电容器在省质量评比中获一等奖。

本厂重质量，守信誉，取得国家计量合格证，通过全面质量管理验收。欢迎用户来函、来电和来人洽谈业务。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瓷介电容器生产线



厂领导班子研究工作



厂址：广东高要县南岸

镇湖西路61号

电话：392460 392468

电挂：0044

邮政编码：526100





# 華墾實業有限公司

HUA KEN INDUSTRY & COMMERCE CO., LTD.

## 公司简介

本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组织调拨工农牧业生产资料、燃料、原辅材料、化工原料、机电设备、农业机械、建筑材料、轻纺化纤、电子原器件、汽车配件、橡胶原料、中西药原料、化肥、农药；组织调拨农、牧、渔系统生产所需计划外装饰材料、机动车零配件、食用油料、包装材料、饲料；金属材料。批发、零售、代销农垦系统生产的五金工具、家用电器、粮油、糖、皮毛、文化用品、来料加工、食品、饮料等。

本公司同仁竭诚欢迎国内外人士前来洽谈贸易，联营合作，兴办实业。

公司总经理：邓铭潮

公司副总经理：陈裕喜

▼ 公司董事会成员和顾问正在研究工作



## ▲ 公司办公环境

公司地址：广州市机场路33号  
商业大厦6楼

电话：666995 666981 666985 66

电挂：5302

传真：674115 邮政编码：5104



# 高要食品廠



本廠是有三十多年歷史的全民所有制食品生產企業，最早引進國外全套先進設備，生產瓶裝維他豆奶，並榮獲1987年省優秀新產品獎，1988年廣東省最佳工業產品稱號，產銷量居全省第一。

傳統產品“帆船牌”(內銷為“西江橋牌”)肇慶排粉，品質純潔、爽滑可口，有二十多年出口外銷歷史，為廣東米粉五大皇牌之一，多年來產銷量均居全省前列，1988年評定為省級先進企業，1989年評定為國家二級計量單位。



廠址：肇慶市廠排街 郵政編碼：526020 肇慶電話：231055 232294 233851  
駐穗聯絡處：廣州三元里瑤台前進大街52號 廣州電話：674153



# 学术研宄 发行100期

(1957—1990)

## 鸣 谢

珠江经济广播电台

太平洋影音公司

肇庆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肇庆市华侨房产建设公司

广东仪表厂

华垦实业有限公司

高要无线电厂

高要食品厂

广州花城汽水厂

广州市广东罐头厂

珠海市体育服务总公司

化州中药厂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韶关钢铁厂

乳源瑶族自治县梯冶炼厂

岭南稀土材料厂

乳源瑶族自治县华昌造纸厂

乳源瑶族自治县中国旅行社

乐昌县人民政府

乐昌县棉纺厂

乐昌县麻纺厂

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乳源瑶族自治县食品饮料总厂

韶关毛巾厂

凡口铅锌矿

韶关市人民政府

韶关第一棉纺织厂

韶关市拖拉机厂

韶关铸锻总厂

韶关市齿轮厂

韶关市印染厂

韶关乐昌棉纺厂

德庆县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

德庆林产化工厂

德庆稀土冶炼厂

德庆西江石料厂

德庆县桂皮加工厂

德庆县缫丝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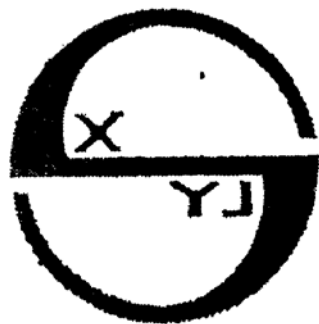
德庆县二轻服装厂

德庆县丝织厂



德庆县城镇粉厂	广东省社科院
德庆县首乌酒厂	广州市社科院
德庆城镇力高模具厂	肇庆市人民政府
德庆县无线电厂	韶关日报
德庆县农机厂	中国银行广州分行
德庆县电表厂	广州国际金融学会
德庆稀土磁性材料厂	中国银行广州国际金融研究所
中共东莞市莞城区委员会	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东莞市莞城造纸厂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广州分公司
东莞市莞城塑料厂	清远市纺织工业总公司
东莞市石龙制药厂	海康县食品饮料总厂
广东顺德贸易旅游中心	广东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
东莞市莞城电子公司	《华夏》杂志社
东莞市糖果食品厂	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东宏纸品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国旅行社
广东省东莞市南粤印刷厂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顺德乐成日用电器厂	新世纪出版社
茂名市社科联	广东教育出版社
清远市社科联	中山大学出版社
韶关市社科联	佛山市社科联
鹤山毛纺织总厂	肇庆市社科联
广东顺德县乐从镇旅行袋厂“小太阳”保 健书包	南方面粉厂
广东顺德县陈村镇花卉研究所	广东省汕头渔业用品进出口公司
广州市南方交电企业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皮肤病防治所“高效毛发生 长素”





# 学 术 研 究

主 编  
梁 钊

副 主 编  
张 硕 城

编 辑 者 学 术 研 究 编 辑 部  
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  
邮政编码：510050

出 版 者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发 行 者 广 东 省 邮 局  
订 阅 处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 所 )  
国 外 总 发 行 中 国 国 际 图 书 贸 易 总 公 司  
国 外 代 号 : BN268 北 京 2820 信 箱

代 号 : 46—64 国 内 定 价 : 每 册 1.50 元

国 内 统 一 书 号 : CN44—1070

ISSN 1000—7326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号 : 粤 工 商 广 字 01044 号

本 刊 每 逢 双 月 25 日 出 版



历 史

- 林则徐捍卫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斗争 .....陈胜彝（6）  
鸦片战争前澳门的鸦片走私贸易 .....邓开颂（11）  
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与廉政建设 .....谢明仁（15）  
历史的偶然性与概率解释 .....刘文瑞（18）

精神文明建设

-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梁渭雄（24）  
借鉴香港和国外社区工作的意义 .....邓演超（32）

哲 学

- 论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 .....杨 松（35）  
也谈宇宙概念的哲学思考 .....卢幸青（42）  
论接受与自性 .....丁 宁（45）

经 济

- 新剑桥学派的利润决定理论及评价 .....张凤林（51）  
关于我国企业集团发展的几个问题 .....孙志强（59）  
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深化改革 .....马恩成（62）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建设的构想 .....高 波（67）

教 育

- 教育史上学校起源问题的商榷 .....林柱育（74）

文 学

文明的进步与思想的逆流

- 西方二十世纪学术思潮之一……………黄卓越（78）  
论唐宋赋的尚理倾向……………曹明纲（85）  
江淹才尽与永明文风的关系……………周 锋（89）

企业之窗

- 台山机械厂如何走上外向型发展新台阶…本刊记者 湛 明（94）

争 鸣

- 从董仲舒在胶西的年代看元朔五年对策说……………于传波（96）

书 评

一个重要的理论探索

- 钟阳胜《科学生产力效应理论导论》评介……………沐 刃（98）  
深化和拓展中国哲学研究的尝试  
——评《中国哲学的探索与困惑》（殷商—魏晋）……………李文义（99）  
从一个具体部门研究明代经济史的良好开端  
——读《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蒋祖缘（101）

学 术 报 导

全国第六次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理论讨论会在广州召开

- ……………本刊记者 范 英（103）  
粤语正音委员会正式组成……………本刊记者 陶原珂（10）  
“广东社会安定与发展理论研讨会”综述……………光 力（104）



# ACADEMIC RESEARCH

No. 3, 1990

## CONTENTS

- Lin Zexu's Struggle for Upholding the Sovereignty of Macao Exercised By China..... Chen Shenglin ( 6 )
- The Smuggled Trade of Opium in Macao before the Opium War  
..... Deng Kaisong ( 11 )
- Sun Zhongshan's Proposition "the Country Is Public" and Construction of Honest Official Duties..... Xie Mingren ( 15 )
- Historic Contingency and Explanation of Its Probability  
..... Liu Wenrui ( 18 )
- On Marx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Liang Weixiong ( 24 )
- The Significance of Making Use of the Working Experiences of Hong Kong and Foreign Social Areas for Reference  
.....Deng Yanchao ( 32 )
- On Hegel's Negation of Negation..... Yang Song ( 35 )
- Talk about the Philosophical Meditation of Cosmic Concept  
.....Lu Xingqing ( 42 )
- On Reception and Self.....Ding Ning ( 45 )
- Neo-Cambridge School's Theory of Profit and Appreciation of It  
.....Zhang Fenglin ( 51 )
- About Several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Groups in Our Country.....Sun Zhiqiang ( 59 )
-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epened Reform in the Rural Areas..... Ma Encheng ( 62 )
- The Concep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and System to Be Established in China's Rural Areas..... Gao Bo ( 67 )
- Discuss the Problem of Schools' Origin in Educational History  
.....Lin Yuzhu ( 74 )

- The Progresses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Adverse Currents of Ideologies — the first article of a series on the academic ideological trends of the Western World in 20th century  
 ..... Huang Zhuoyue ( 78 )
- On the Tendency of Emphasizing Reason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Fu — ( Fu is a descriptive prose interspersed with verse )  
 ..... Cao Minggang ( 85 )
-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nd of Jiang Yan's Creative Talent and Yong Ming Times' Writing Styles..... Zhou Feng ( 89 )
- How Did Tai Shan Machine Factory Go Up on a New Step of External-type Development ... ( A correspondant of this Journal )  
 .....Zhan Ming ( 94 )
- Look into the Countermeasure Theories Appearing in Yuansuo Times' 5th Year through the Age when Dong Zhongshu Was Staying in Jiaoxi ( within present Shandong Province )  
 .....Yu Chuanbo ( 96 )
-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eekness — a comment on the book of "An Introduction of the Efficiency Theory of Scientific Productive Forces" by Zhong Yangsheng.....Mu Ren ( 98 )
- An Attempt of Deepening and Opening Up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Philosophy — a comment on the book "Seeknes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Its Perplexity" ( from Shang Dynasty to the Kingdom of Wei and Jin Dynasty ) .....Li Wenyi ( 99 )
- Research on the Good Beginning of Ming Dynasty's Economic History through a Specific Department — a review of the book "The History of China's Iron and Steel Production from 14th Century to 17th Century" ..... Jiang Zuyuan ( 101 )
- The National 6th Symposium on the Constructional Theory of Urba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Was Held in Guangzhou  
 ..... ( a correspondant of this Journal ) Fan Ying ( 103 )
- A Committee of Correcting Cantonese Pronunciation Has been Formed..... ( a correspondant of this Journal ) Tao Yuanke ( 10 )
- A Summary of "the Academic Symposium on Guangdong's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Guang Li ( 104 )



# 林则徐捍卫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斗争

陈胜莽

林则徐与澳门的关系，主要是在他受命钦差“使粤”时期和粤督任内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一方面，坚持行使中国对澳门主权，开展反击英国侵略者企图利用、控制、占领澳门的斗争；另一方面，以澳门为窗口，组织翻译《澳门新闻纸》“探访夷情”，放眼世界，开始迈出走向“近代”的步伐。本文着重探讨他为捍卫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斗争。这场斗争，就其发展特点而论，大致可以划分为反利用、反控制、反占领 3 个阶段。

## (一)

第一阶段，反利用阶段。以反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企图利用澳门对抗林则徐收缴鸦片的斗争为主要内容。时间从林则徐使粤始，到 1839 年 5 月 24 日义律和所有英国人离开广州前往澳门止。

长期蓄谋打开中国大门的英国侵略者，为了在华建立其“居留地”，从明末至鸦片战争时期，侦查了我国南北万里海疆，选择岛澳，图谋占据。其中之一，就是澳门。“常谓濠镜澳（即澳门）西洋人（即葡人）可居，我辈不可居耶？”<sup>①</sup>因此，他们越来越加强其对澳门的利用，力图把它作为侵华的桥头堡。特别是，英国侵略者利用澳门策划对抗中国查禁鸦片。在林则徐抵粤之前，英国大烟贩查顿“即请牌下澳，搭船回国。”<sup>②</sup>利用澳门作为藏匿之所和逃遁之道。义律还从澳门发出快信，向英国政府报告：“清廷已经决定坚决查禁，更可能是最严厉地制止鸦片贸易。……我获悉，一俟钦差大臣的到达，就会发布一些关于此事的强硬的官方通令”，并“将立即前往澳门或其附近，从该处开始行动。”同时向英商宣布，他

“决定留在澳门”，并“已说服……炮舰‘拉尼’号的舰长布莱克留在中国。”<sup>③</sup>摆出一副“一直抵制到底”的架势。正是这样，林则徐刚到广州两天，义律就迫不及待，先发制人，在澳门致书两广总督邓廷楨，声称“本人作为与英国政府、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及海军总司令的联系者，满怀疑虑与担忧”，公然以“我国巡洋舰正在留待大人的答复”相恐吓，要求中国官方发布一个所谓“镇定人心的声明”。<sup>④</sup>

但是，林、邓并没有“立即前往澳门或其附近”，而是在广州向外商发出了收缴鸦片的强硬通令，并相应采取了坚决措施，“禁止〔在广州的〕一切外国人前往澳门”，广州“与黄埔的交通通讯完全停止”。<sup>⑤</sup>义律此刻看到“风暴已经改变方向”，于是，于 3 月 20 日在澳门发布通告，命令所有英国船只“集结于香港，并立即进入戒备状态”，同时通过澳门同知，照会两广总督，以中国“是否有意对我国在华的人员和船只开战”相威胁。义律本人则于 3 月 24 日由澳门强行通过虎门、黄埔赶到广州，召集在广州的全体外国人，宣读他在澳门发布的上述通告，“嘱咐他们都要克制、坚定和团结”，一致对抗林则徐收缴鸦片。同时企图引领饬拿在案的首恶烟贩颠地出逃。然而，义律的狂妄行为，却遭到林则徐更为坚决的反击。义律和颠地被截回于商馆，受到严密监视；林则徐还“谕责义律以不能约束之非”，循例“将各夷住泊黄埔之货船暂行封舱，停其贸易。”由于“省城夷馆与黄埔、澳门及洋面趸船，信息绝不相通，该夷等疑虑惊惶”，最终迫使义律表示“情愿呈缴鸦片”。

林则徐的强有力措施，打破了义律企图率领

烟贩出逃，继续利用澳门为藏匿之所和逃遁之道的阴谋，使他不能不放下“一直抵制到底”的架势。“如果我坚持此种抗议方针，他（林）当以延长监禁其决定拘捕之人员来迫使全体屈从”，出现“各个商人被迫单独”呈缴鸦片的局面。在他看来，这必然“在印度和英国引起商业上的猛烈震动，使女王陛下政府陷于难于描述的困境。”<sup>⑥</sup>当义律认缴鸦片后，林则徐即同意英国驻华商务副监督参逊于4月3日离开广州到澳门，“指导和监督”缴交鸦片。义律对此感到不可理解，而且也没有想到，林则徐还依诺于鸦片收缴半数时，“量许三板查验往来，并将夷馆撤围，兼准开舱贸易”，除了“积惯贩卖鸦片”之颠地等16人仍应“暂留夷馆”外，义律和其他商人均可离开广州前往澳门。但义律此时即表示“决不离开”广州，直到鸦片缴交完毕，才于5月24日“与因贩烟而受到中国当局驱逐的十六人一起回到澳门。”<sup>⑦</sup>

义律在这一阶段，由于对林则徐的“第一步措施”判断错误而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再无法利用澳门与林则徐抗衡，因而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态度，暂时向林则徐屈服了。正如他回到澳门后给英国外交次官拔克浩斯的报告所说：“我从广州回来，被这次严酷的非常事件打击得极其厉害。”

这一阶段，林则徐本来也曾想先“从澳门清源”，同时驱逐停泊于洋面的鸦片趸船的。但“务在永杜来源”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心，促使他改变了单纯的“驱逐”计划，决心收缴和“销除净尽”趸船上的鸦片。鉴于鸦片贩子当时“多在省馆”，林则徐遂决定从谕令在广州的外商缴烟开始其行动，并以强有力的措施反击义律的阻挠，从而掌握了主动权。因而，他又不失时机地“委派文武前赴澳门”，谕飭澳葡当局配合查禁鸦片，并令“仿照编查保甲之法”，将澳门中外居民“查明户口，造册送呈”，收到了一定效果。尽管有些葡商采取转移的手法，将鸦片“运往各处夷埠”发售，但也足以说明澳门确实“查禁严紧”，使烟商“不敢在澳潜藏”烟土；尚有在澳续卖零星鸦片的葡人，澳葡当局亦自行查拿、惩处，并将所获零烟在码头焚烧；英国鸦片贩子因士义仍“私载烟土入澳”，澳葡当局不但不予保护，而且予以查拿，“将原土押交英国副领事参逊一体呈缴”。连义律也不得不承认，“不遵守澳门西洋官数月严行之约束，擅载鸦片入澳”之因士义，“其罪实堪重责”。<sup>⑧</sup>可以说，林则徐不但打破了义律利用澳门

对抗收缴鸦片的图谋，而且将澳门变成了他领导禁烟运动的基地之一。

## （二）

第二阶段，反控制阶段。以反击义律企图重新控制澳门继续与林则徐抗衡的斗争为主要内容。时间从义律回到澳门始，直到1839年11月27日林则徐发布“遵旨永停英吉利国贸易”的《封港告示》止。

收缴鸦片的顺利进行，也使林则徐、邓廷桢产生了错觉，不但称赞义律“恭顺能事”，甚至幻想他协助查禁澳门鸦片，以为义律有什么“杜绝鸦片根株之良法”，郑重其事地于6月5日会札署佛山同知刘开域和署澳门同知蒋立昂：“会督香山县丞，速即传知该领事义律及西洋兵头（澳督）、番差（判事官）等，将其所议章程呈出，由该丞等查看果否妥善可行，悉心会议，转禀核办，以期华夷杂处之地，一体肃清，勿使藏垢纳污。”<sup>⑨</sup>

殊不知义律早已别蓄诡谋。他从广州返回澳门之前，就已经命令英船不得开入内河，进入广主；到澳门后，更宣布要“尽其所能阻止英国人返回广州”，与林则徐希望英商尽快“具结”进埔，返广州从事合法贸易的政策对抗。而且，就在林、邓札委刘开域赴澳核办章程同一天，义律竟然“通知钦差大臣说，监督（义律）和英商现都住在澳门，嗣后来中国的英国船只，就在澳门上下货物，直至接奉英国政府对于他们今后行动的有关训令时为止。”<sup>⑩</sup>义律这一无理要求，实质上是企图把澳门变成控制在英国手中的外商对华进出口贸易的港口，取代黄埔港，从而使英人在澳门取得远超葡人所享优惠待遇的特权。这里包藏着义律一箭双雕的诡谋：对于准备将货船进黄埔的英商来说，则可立收阻止之效；对于林则徐为取缔鸦片贸易而要求外商保证不再夹带鸦片的“具结”措施而言，则立起破坏之功。既可逃避中国海关之稽查纳税；又可为发展非法的鸦片贸易重建囤所于澳门。这是为英国侵占澳门开路的第一步控制手段。

林则徐既看到了“此端一开，则粤海关几同虚设”的严重后果；又看到了“今趸船之积土甫除，若澳门之囤所又起，何异驱虎进狼”之利害。故对义律之无理要求予以“决绝批驳”，并于6月9日由粤海关发布一道命令：“除当地的商业照旧外，禁止一切贸易在澳门进行”；一切船只，“或进〔黄埔〕港，或离境，决无中间路线可走。”<sup>⑪</sup>



林则徐还向“中外商民暨澳门西洋夷人”发出严示：

“除住澳之西洋夷人设有澳船数额，相延已久，该船所带货物，例许进澳行销外，其余各国货船到粤，均须驶进黄埔，方准报验开舱，投行交易。……其不进埔，又不回国者，……均当并力驱除，不许与之交接。如敢勾通起卸货物，私相授受，无论澳门铺户及出海商船，并住澳之西洋夷人，一有犯法，皆必从重惩办，其人问罪，货物没官。……〔澳葡当局〕若受他夷愚弄，辜负皇恩，则澳门虽滨海一隅，亦是天朝疆土，岂能任作奸犯科之人永为驻足乎！”<sup>②</sup>

这则严厉的禁示，对于防止英国侵略者“勾通”中外商民及澳葡当局利用澳门“起卸货物”，对于防止英国和其他各国货船不进黄埔而到澳门贸易，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打破了义律请求在澳门装卸货物的诡谋。

义律图控澳门的第一步遭挫后，其第二步就转而驱澳顽抗。首先，对林则徐之批谕，不收不看，飭令洋商通事传谕，则竟掩耳走避。以至缴清烟土应立即离境之空话，尚有一半未去。奉旨驱逐之鸦片贩子，亦有数人未行。林则徐派员赴澳严催，并飭澳葡当局协同撵逐，亦受阻挠。陆续来粤之英国货船，则被阻聚泊于尖沙咀一带，均未具结进埔。其次，林维喜案发后，义律又拒不交凶，林则徐等“给与谕函，亦竟始终不接”。

在这种情形下，林则徐遂援引嘉庆十三年案例，采取坚决果断措施：“禁绝英夷柴米食物，撤其买办工人”，从8月16日起，与邓廷桢同驻香山县城，勒兵分布各处要口，并飭澳葡当局配合。自8月17日至8月27日，将义律及驱逐未去之鸦片贩子，并散住澳内的英人，全行驱逐出澳。同时明确宣布：“此举专为英夷违犯，不得不制以威，与别国均无干涉，毋庸惊扰”，至英人则“必俟交出凶夷、扫净烟土、货船进埔报验、空烟悉数开行，一切恪遵法度，然后给还买办工人，仍准住行住澳。”<sup>③</sup>争取了澳葡当局的合作，沉重地打击了义律驱澳顽抗的气焰。

义律图控澳门的第二步又遭失败后，其第三步就是诉请武装挑衅，辅以外交讹诈，坚持对抗立场。9月1日，义律仗仗刚刚到达澳门洋面的“窝拉疑”号英舰，威胁澳督宾多同意被逐英人“返回澳门”，同时宣布，英舰受命“在保卫澳门这地方、击退任何可能的袭击中，与澳门总督阁

下合作。”<sup>④</sup>在这紧急态势下，林、邓于9月2日启程“赴澳门巡阅”并到达了前山；次日“统领将备管带弁兵整队出关”，向前来迎接的澳葡理事官“宣布恩威，申明禁令，谕以安分守法，不许囤积禁物，不许徇庇奸夷”；澳葡理事官也明确表示：“现在随同官宪驱逐卖烟奸夷，亦属分内当为之事。”<sup>⑤</sup>体现了中葡双方的谅解与合作。正是这样，澳督宾多亦鲜明地答复义律，“他重申，自从中国皇帝明确地为查禁鸦片贸易而派的钦差大臣到达广州以后，他不止一次正式声明”在英国与中国之间，维持“最严格的中立”。拒绝了英舰对澳门的“保卫”和与澳葡当局的“合作”。

林则徐在此关键时刻巡阅澳门和澳葡当局的明智态度，打破了义律的如意算盘，义律就于9月4日“率领该国夷船，以索食为名，突向师船开炮”，挑起九龙之战，遭到官兵英勇还击。义律于9月14日潜回澳门，恳求澳葡当局“代为转圜”，要求会谈，企图利用谈判，“暂作缓兵之计，别生濡诈之谋”，不但继续抗缴新烟、庇纵凶犯、拒绝遵式具结、阻挡货船进埔，甚至招集英商数人，到澳会议，刁顽挟制，破坏谈判；而且，乘机让被逐之英商“纷纷回澳，并带家眷同来”。林则徐坚持原则，一再飭令文武“严行驱逐”回澳之英人，“并谕令西夷一体催撵〔英人〕出澳”；宣布对遵式具结进埔贸易之英商，“其携带眷口，即准令住澳，以示优恤。……其余未经遵办者，倍当严紧驱逐。”<sup>⑥</sup>谈判破裂后，义律与士密率英舰至穿鼻洋，致函林则徐，“要求他不要再放火烧英船；并且要求听任英侨住居澳门，不要加以干涉。”遭拒绝后，旋即挑起了穿鼻之战和官涌之战。

两轮澳门谈判与英方三次武装挑衅，使林则徐愈益看清义律“忽恭忽倨，皆有濡谋。”本乎“与其开门而揖盗，何如去莠而安良”的原则，林则徐于11月27日发布对英封港告示，宣布自12月6日（十一月初一）起，除两艘遵式具结的英船仍准照常贸易外，停止中英贸易。义律图控澳门的计划终于破产。当义律于封港后，又一次以“远职实心欲求承平”的求和面孔出现，请求允准“英国商人、家眷等，复得回澳居住”时，林则徐严正指出：“澳门暂住夷商，原为料理贸易之事。〔尔〕既即不许〔英国〕货船进口，即不应仍住澳门。乃尔于出澳之后，在九龙、穿鼻等处，皆尔先行开炮，欲求承平者，顾如是乎？”驱逐英人出澳，乃至封港，“皆由于尔之自取。”<sup>⑦</sup>义律搬

起石头终于砸了自己的脚。

(三)

第三阶段，反占领阶段。以防范英军占据澳门、继续争取澳葡当局合作和武装保卫澳门的斗争为主要内容。时间从林则徐发布对英封港告示始，至1840年10月20日林被撤职离任止。

九龙、穿鼻、官涌之战，提高了林则徐的警惕，使他虑及多年来“久住澳门”的义律等英国侵略者，“自断贸易以后，穷蹙无归，势必图占澳门”；<sup>①</sup>“既不准通商，尤恐其铤而走险。”<sup>②</sup>事实上也是如此，“封港之后，该船应即离澳，乃犹群聚逗留，且敢往来窥探”，甚至对中国巡船“施放枪炮，迎头拒敌”；<sup>③</sup>义律还致函澳督宾多，“以英吉利国家之名，恳请求准将英人存下货物运至澳门，囤贮检棧房，依澳门章程纳税”；企图从囤货入手，以发货为途，把澳葡当局变成其代理人，变澳门为其“长久大利益之处”。澳督认为这是他“不能有如此大权回答”的“大紧要之事”，拖了半个月才答以“首领事（义律）曾在澳门居住数年，谅已知道在澳西洋人与中国官府之交情”，故“今我等已定夺，不能如首领事所请。”<sup>④</sup>这一要求被拒绝后，英国侵略者图占澳门的野心却愈益强烈。义律带头率领数名英人，逞强入澳，欲“作长住的打算”。为了对抗中国官兵对义律等人的查拿，英舰“海阿斯”号舰长华伦，“接到士密大佐的命令，要他将战舰开到〔澳门〕内港”；士密在致澳督宾多函中声称，他“遣一只兵船进至澳门港口，不独为保护在澳居住之英吉利人，亦可守着澳门，以为有事时退步之计”。<sup>⑤</sup>显然，企图把澳门变成其军事控制下的据点，英军侵华进退之基地。

林则徐为防范英军占据澳门，早已注意加强澳门的防务，不但将新升南澳镇总兵惠昌耀留任香山协之任，而且选派了新授高廉道易中孚“暂行驻扎澳门，督同澳门同知等查办夷务”；并畀以事权，予以兵卫，将向归香山协管辖的前山内河水师都司及所率之兵，交“由该道节制，遇有缓急，听其调遣。”<sup>⑥</sup>故当义律等潜入澳门后，易中孚就在澳门贴出告示，宣布要调兵“进澳门逮捕义律及其他英国人五名。”<sup>⑦</sup>此举使葡、英双方都深受震动。澳葡当局以“澳内华夷杂处，若兵役围拿，恐致扰动，恳请稍缓，自必驱逐等语”，向林则徐递禀；<sup>⑧</sup>同时复函士密，谓英舰进澳，“似是与我等国中对敌”的“不公允之举”。而士密

则数次致函澳督，要求庇护未果，只好保证撤退。林则徐又一次争取了澳葡当局的谅解与合作。英舰退出澳门后，义律和其他英人亦先后被驱逐出澳。“义律于是被迫继续利用船舶作为商务基地”，<sup>⑨</sup>其企图占据澳门作为英军侵华进退基地的阴谋，又未能得逞。

然而，林则徐又从“该国夷人传说”中获悉：“英夷祖家兵船十二只，孟买兵船十二只，不久可到”。他立即警惕起来，札飭易中孚等即行传谕澳葡理事官，直截了当地提出：“澳门一区，乃天朝土地，各国夷人俱不准混行托足，独许西洋夷人聚族而处，长育子孙”；故而临英军图占，“与其临事张皇，坐失依据，何如敬听官宪指示，将官兵早带入澳，妥为布置。一旦有事，该夷随同拒敌，则有备无患，定使比户不惊”。还强调说：此举乃“为尔西夷安枕之计”，故“该夷等务宜效顺去逆。”<sup>⑩</sup>把防范英军侵占澳门与继续争取澳葡当局合作紧密结合起来，其用心在于“乘此警动之机，冀绝勾通之渐也。”<sup>⑪</sup>澳葡当局从切身利益考虑，在“英夷已被尽数逐出”后，亦“称今后必永远不敢允准英夷入澳或窝藏彼等而违抗法度。”<sup>⑫</sup>林则徐在澳门地方派驻兵勇等防务工作亦得以顺利进行，直到1840年6月侵华英军封锁珠江口之前，林则徐还先后飭令澳门同知制定有关管理外贸和外船的新规章。中国对澳门的主权继续得到充分行使。只是后来清廷妥协屈服，革除林则徐职务，才使澳门成了英军侵华的基地。但他为捍卫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所作的一系列斗争，对防止英国侵略者“抢夺澳门”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因而赢得了全国人民和澳门同胞的敬仰。

① 颜斯综：《海防余论》。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 《林则徐集·奏稿》第627、674—675、682、764、765—767、767—769、713—714、765页。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 《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第337—340、341、341、360、373—375、384—385页。

⑧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 《林则徐集·公牍》第84—85、120—121、163、180—181、187、182、187—188页。

②③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60、88页。

⑩⑪⑲⑳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264—265、264、290—291、291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林有能

---

## · 学术报导 ·

### 粤语正音委员会正式组成

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1990年3月10日在省社科联举行理事会扩大会议，在总结了近二年的工作之后，商讨了成立粤语正音机构的问题。鉴于省、港、澳目前许多学校仍用粤语教学，并没有专门的粤语广播、电视节目，会议认为，除了应该继续大力推广普通话之外，很有必要切实做好社会的粤语正音工作。为此，会议决定由

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和广东省广播电视厅共同发起并组织由省、港、澳三地专家共18人组成的粤语正音委员会，同时推举詹伯慧教授为会长、周无忌先生为副会长。该正音机构将有计划地组织广播员进行正音训练，并将以《广韵》所收字为主编撰粤语正音字典，切实解决粤语教学的正音问题。

（陶原珂）



## 鸦片战争前澳门的鸦片走私贸易

邓开颂

### 一

18世纪初,葡萄牙人为了挽回澳门海外贸易的衰颓形势,开始往中国贩运鸦片,从1729至1772年的几十年间,是葡萄牙人独操走私鸦片进中国的时期。他们以澳门为据点,从印度西北海岸的葡属租借地果亚和达曼源源不断地贩运鸦片至澳门,再由澳门走私进入大陆内地,初时每年约200箱之数,供中国人吸食之用。《大英百科全书·中国条》记载:“吸食鸦片当在吸食烟草之后……,而第一次关于此种嗜好的记录,则始于一七二九年,尔时输入之鸦片,纯由葡萄牙人供给。其出口年约二百箱。”1729年以后,中国吸鸦片的人不断增加,葡萄牙人运往中国的鸦片也随着逐年以20箱的速度递增,至1767年,进口的鸦片数目已达每年1000多箱。“则运一千箱,这样的数额持续了好多年,皆由葡萄牙人经营。”<sup>①</sup>可见,澳门在18世纪初、中叶已成为鸦片输入中国的贸易市场、鸦片走私的基地了。

鸦片走私贸易是一项既有风险又很得利的生意,葡萄牙商人为了自身利益,当然要千方百计地保护鸦片走私贩运的独占地位了。首先,葡萄牙人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与中国王朝对澳门实行的特殊政策来确保贩运权。澳门既是广州的外港,又是中外贸易的转运港,凡是来华的外国船只,按中国政府的规定,应先在澳门停泊,申请引水,由中方引水员带进虎门,停靠黄埔后旋即赴粤海关上税。然而,自葡萄牙人租借澳门之后,明清政府对澳门实施特殊政策,其中一条是允许葡国商船直接从十字门入口,停泊澳门“但量船身,即搬入澳,迨至内地商人赴买,始行输税”。<sup>②</sup>这就是说,对葡商船省去了入口验货稽查这一关,给葡人将不法商品和鸦片混进关口提供

了可乘之机。于是,葡商“每于赴本国置货及赴别国贸易回帆时,夹带鸦片来粤偷售。”<sup>③</sup>

其次,澳葡政府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自行制定通商法规,坚持任何它国商人在澳门经营鸦片贸易只能由葡萄牙商人代理,规定它国商人贩运鸦片前来中国只能通过葡萄牙商船转运,在澳门卸货。以此来抵制其它国家商人插手鸦片走私贸易。因而“大量鸦片均由各土邦以悬葡萄牙国旗的船只通过达曼的葡萄牙港口出口,这些船只必在澳门港口卸货缴税”,<sup>④</sup>“港脚商(英印私商)于是租用悬葡萄牙旗的船只将白皮土运往澳门”。<sup>⑤</sup>为了确保走私鸦片顺利进行,葡萄牙人专门设置了一项“贪污基金”,以1815年为例,每箱鸦片需缴40元基金,这一年,可集“贪污基金”达10万元之多,这笔巨款用来支付中国鸦片捐客的佣金,规定每贩卖一箱,给金两元,而更大量的的是用来支付给中国官吏的“规礼费”。

由此可见,葡萄牙人为了保护其既得利益,可谓绞尽脑汁,不择手段。然而,其它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看着葡萄牙人靠鸦片走私贸易大发横财,早就垂涎欲滴,想方设法要把这个财源抢到手。从1773年开始,葡英两国围绕着澳门鸦片市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 二

1773至1820年,是葡萄牙与英国围绕澳门鸦片市场展开激烈竞争的时期。这一时期中的前20年,澳门仍然是中国鸦片走私的唯一集散地,然而,自1794年英国第一艘鸦片船进入黄埔港开始,鸦片走私的中心集散地便逐渐移到黄埔港来了。从此,英国也就逐步取代了葡萄牙对华鸦片贸易的垄断地位。

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取得鸦片专

实权，开始试运鸦片到中国出售，他们以澳门南面的云雀湾为储存站，在那儿进行兜售交易。据记载，1780年东印度公司有两艘鸦片船在云雀湾，以每箱500至600元价格进行兜售。第二年，该公司又派遣一艘武装押运的鸦片船来到云雀湾，然而行情不佳，稽留甚久，迫于无奈，只好把1600多箱鸦片以每箱210人头洋的低价卖给澳门经营鸦片的大行商。⑥东印度公司委员会在他们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相信，下列是葡萄牙船输入澳门的麻洼鸦片数量的正确报告表：摄政太子号三八八箱，安兹里加号三九六箱，比里沙里奥号四箱，安祖斯号二二七箱。”⑦1782年，东印度公司的嫩兹兹号运鸦片抵澳时，发现“在该市的鸦片，除已售出者外，最少尚有1200箱。”⑧澳门葡萄牙当局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插手鸦片走私贸易十分不满，因此，除了对英商课以重税以外，还处处设防，限制他们的活动。据1787年英人贸易季度咨文透露，“葡萄牙人知道碇泊该处（燕子湾）的外国船只，是为了使违禁买卖进行得方便，是对他们很不利，同时特别猜忌从孟加拉开来的船，他们怀疑船上载有鸦片”。⑨1793年澳门海关总督责备船只停泊燕子湾，要求将船只驶入内河丈量，否则一律开出海外，迫使外国鸦片走私船只离开澳门。

英国人对于澳门种种限制耿耿于怀。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前往加尔各答的葡萄牙船只课以重税，澳葡当局则立即采取不允许任何非葡萄牙船只运来的鸦片靠岸、卸货，以示报复。

纵观1773至1794这20年葡英鸦片贸易之争，还是葡人占了上风的。但是，“由于葡萄牙人要在鸦片上尽可能地抽征税款，由于他们坚持外国人在澳门经营只能由葡萄牙代理人经手，英国的白皮土（出自孟买，又称小土）商人就被驱逐到黄埔了。”⑩“1794年，在多次请求葡萄牙政府允许其建立贸易失败之后，……经营此种生意的人遂驾了一艘专载鸦片的船只驶到黄埔，……船上载的鸦片约二百九十至三百箱。”⑪据记载，最初，“鸦片象英国的多罗呢和印度的棉花一样，是进口船只中的货载，公开贸易，并且用同样的方法进行船只的保商，即公行的一个会员出售的。”⑫上述的鸦片船“在黄埔停泊了十五个月以上，安然无事。”⑬马克思在他的《鸦片贸易史》中指出：“看来，黄埔比澳门更适合于做堆栈。”⑭从此，英国商船明目张胆地在黄埔大做鸦片贸易，终于引起

清廷的注意，从嘉庆帝即位（1796）起，几番降谕停止征收鸦片税，禁止鸦片进口，东印度公司不得不表面上有所收敛，宣布停止广州的鸦片贸易，但实际上却是“暗渡陈仓”，把鸦片贸易转回澳门进行，并在澳设立存储站，再由港脚商人继续把鸦片运到黄埔，暗中交易罢了。据嘉庆廿年（1815）两广总督蒋（攸钰）曾奏：“有本地奸商在澳门贩卖鸦片”。⑮葡澳当局为了重掌鸦片走私的操纵权，故以“英公司须每年纳交澳门海关十万两”为条件，“允许英船鸦片入澳门每年五千箱”。⑯后来，英人不满意葡人的重税，加上葡萄牙当局也恢复禁止非葡萄牙船运来的鸦片在澳门上岸的旧例。因此，“装载鸦片的船只，通常是把鸦片继续留在船上，并且运到黄埔，在那里成交，就在船边交货。”⑰因此，这一时期，鸦片贸易“仍然在黄埔与澳门两地进行，一直延续到1820年”。⑱

英葡两国在鸦片走私贸易中，既明争暗斗，又互相勾结，互相利用。英人在黄埔做鸦片买卖亦非易事，经常受到中国政府干预，故时刻提心吊胆，澳门鸦片贸易代理商中唯一的英国人汤姆士·比尔以自己亲身经历警告他们在加尔各答的贸易往来户说：“要想在黄埔托售鸦片，不要轻举妄动，因为在那里很容易被查抄和发生困难。”⑲为了保险起见，“他不得不在澳门的鸦片市场中雇佣葡萄牙代理人”，⑳代理人从销售中提取一定的佣金，而澳葡当局可以通过这些代理人了解鸦片市场行情和征税信息，比尔的生意有了葡人的支持，越做越大，甚至发展到跟澳门审判长阿利加暗中勾结，专心做起大规模的鸦片生意。

澳门的鸦片市场亦非一帆风顺，嘉庆年间多次禁止鸦片进口，违者处以重罪，有一个时期连葡萄牙人也被禁止在澳门交易鸦片，有些商人只好把鸦片运到马六甲出售，因而导致嘉庆十至十一年间澳门出现了一次严重的鸦片销售危机，英国代理商比尔在澳门滞留了10个多月，“等待出售（鸦片）的最好机会”，然而几乎一箱也卖不出去，他沮丧地承认，在这个时期，鸦片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商品，易于遇到突然的和往往是不可思议的波动”，“它（鸦片）的价格在所有商品中是最不稳定的”，并且“是极端危险的”，即使如此，比尔也忘却不了往日走私牟取的暴利，表示继续干下去。从比尔的思想足可见当时的鸦片走私商的心态一斑。

葡英为争夺中国鸦片走私霸主地位的斗争，时起时伏，只要省城广州禁烟的气氛稍有缓和，英国人就把鸦片船开到黄埔去，而葡人为保障澳门在鸦片走私贸易中的独占地位，尤其针对英国鸦片商人，课以重税；英国东印度公司是最大的英国鸦片走私商，立即以牙还牙，对“葡萄牙从不列颠印度口岸装运棉花的口岸税增加并被征高额关税”。（对前来加尔各答装运鸦片的葡萄牙船只也课以重税）。这样的摩擦争斗，受损害最严重的是澳门经济。为此，1819年11月30日，澳门总督若瑟·奥所里奥提出5条改变鸦片贸易方式的计划：

1. 在孟买设立一个与加尔各答同样的鸦片市场，并享有同样的独占权；

2. 该两市场销售的鸦片数量可由协议决定，在开始时，市场似乎需要2000至2500箱北方的（麻洼）及2500至3000箱的孟加拉鸦片；

3. 葡萄牙政府为了补偿放弃所有价值的贸易而造成的损失，每年接受一定数量的鸦片，其数量及批次通过协议固定下来，类似的协议已跟法国和荷兰签定过了；

4. 澳门居民的船只真实财物在口岸税与关税方面与不列颠船只同等待遇；

5. 核准输入5000箱鸦片，英国公司每年缴付澳门海关100,000两，如数量减少，按比例扣除。<sup>②</sup>

澳督此计划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故英国人不理会他的呼吁，而是把眼睛盯着黄埔的走私动静。澳督这个错误地估计了葡萄牙力量的计划，到头来仍是纸上谈兵而已。

从上可见，澳门至19世纪20年代前均是鸦片走私和贸易集散地，它不仅招徕从葡属印度港口用葡萄牙船运来的全部鸦片，同时也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垄断生产制作销售的英印鸦片的广大市场，其它西方国家，如美国、西班牙等，都纷纷涌至澳门进行鸦片贸易。据统计，1820~1821年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总数为4244箱，经澳门销售的就占3174箱，在澳门以外（主要是在黄埔）销售总数为1097箱，经澳门销售的鸦片占输入中国的鸦片量的3/4。因此，澳门是名符其实的中国鸦片走私贸易中心。

### 三

1821年至鸦片战争前，鸦片走私贸易中心逐渐移到伶仃洋，澳门鸦片走私贸易一时走向低谷。

1821年道光皇帝登基，面对鸦片吸食泛滥，帝国千疮百孔的局面，重申严禁鸦片，并且采取果断措施，法办澳门屯户叶恒树，摘掉因徇私隐瞒外船夹带鸦片的十三行总商伍敦元的三品顶戴，审理上报到朝廷的大烟案6宗（其中澳门5宗），同时封锁黄埔和澳门两大关口。外国鸦片走私船只好另寻新的囤货、销售地，他们利用在伶仃洋停泊的一些武装的浮动废船充当趸船，用于贮存鸦片以及供应中国鸦片船的提货。这么一来，澳门的鸦片市场受到极大冲击，不单难以进口，甚至出现复出口的现象，有些英商宁可向澳葡当局付缴每箱25元出口税后偷偷运离澳门转经它处再出售，并且写信到印度嘱咐他们再不要运鸦片来澳门了。澳门的财政、税收面临困境，“如果目前作为他们唯一财源的这项贸易被夺去，则澳门必不能免于崩溃。”<sup>③</sup>为了挽回行将失去的鸦片市场，澳葡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劝诱英、美商人在澳门贮藏鸦片，给他们以与葡萄牙人同等的待遇，不再课以重税，并且建议对每箱鸦片征收一定数额的附加费用。每年凑足20万元，贿赂中国官员，打通走私的关节等等。但是澳葡当局的一厢情愿遭到英商的拒绝，英东印度公司控制着印度鸦片，葡萄牙人在印度鸦片的势力日渐衰颓，所以英国人为了摆脱葡萄牙人，宁愿跑到伶仃洋去进行交易，葡萄牙人也只得徒呼奈何！到了1825年夏季，中国赌客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在澳门的活动，澳门“除供应当地消费的有限数量以外，销售几乎完全都在伶仃和外洋的趸船上”<sup>④</sup>进行。所以，从1827—1833年的6年中，输入伶仃鸦片的总数为91024箱，输入澳门仅为3113箱，只及伶仃的3.3%。

澳门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鸦片走私贸易的霸主地位，只得利用与伶仃隔海相望的有利地理位置，大力发展房地产，吸引了不少鸦片商人前来渡假，并且伶仃也需从澳门补充给养、收集信息，作为进入中国的中继站。1832年2月27日，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乘“阿英士德”号北上中国各港口进行长达7个月的考察，于同年9月回到澳门，许多鸦片商都纷纷向他打听情报。1832年1月又有一艘“阿格尼斯”号从伶仃岛启锚北上考察，3月返至澳门。

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结束了长达233年之久的对华贸易的垄断局面，向英国私商全面开放鸦片贸易，也就是说，任何英商都可以前来中



国自由贸易，致使鸦片战争前的这几年间，鸦片走私贸易达到疯狂的地步。“鸦片走私又象1821年以前那样在广州水道上出现，所不同的只是此时在数量上已超过已往六倍”。<sup>②</sup>外国鸦片船在珠江口内外横冲直撞，穿梭于澳门、伶仃、广州之间。据马士统计，1834—1839这6年间，向中国输入

的鸦片多达81,922箱。<sup>③</sup>

综上所述，从1729年至鸦片战争前夕(1839)这一百余年间，广东的鸦片走私贸易是何等猖獗，澳门以及伶仃成为西方列强吸取中国民脂民膏的罪恶基地。

- ①⑧⑪⑬⑮⑱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314、314—315、315、315、316、316页。
- ② 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八“夷商”三。
- ③⑯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168、401页。
- ④⑤⑩⑲⑳㉑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22、115、119—120、119—120、119—120、108页。
- ⑦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 3 Cha P.7.
- ⑥⑨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2，第78、140页。
- ⑫⑰㉒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1，第199—200、201、238—240页。
- ⑭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页。
- ⑳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3，第357—358页。
- ㉓㉔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一册，第122、120—121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  
责任编辑：林有能



## 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与廉政建设

谢明仁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中国推翻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震惊了亚洲和全世界。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革命事业，为求中国富强，鞠躬尽瘁，是中国人民非常敬仰的伟大革命家，也是世界人民崇敬的伟人。

孙中山一生题字很多，尤以“天下为公”四个字为最，“天下为公”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身体力行，奋斗终生的目标。学习、宣传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精神，并使之发扬光大，对当前加强廉政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孙中山先生一生向往的是大同世界。而“天下为公”则是他大同世界思想的核心。孙中山从甲午战争失败中，清醒地看到清政府以愚民政策为治世的要义，以压榨人民的膏血为官吏治民的能事，积弊日深，卒致造成中国的衰弱不振，坐令大好河山陷入任由帝国主义列强宰割攘夺的悲境。他指出：“天下者，是天下人之天下。”“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外国是有相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

乐，都不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sup>①</sup>他以改造天下为己任，主张“均贫富，平均地权，经济平等”，通过“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实现“民有、民治、民享”，“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

为了达到大同境界，孙中山在中国近代最早提出建设心性文明、物质文明的政治主张。他拟订出完整的实业计划，以建设铁路、港口、城市，引进外资、科技，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人民福利。孙中山还拟议兵工计划，主张化兵为工，带动国家经济发展。他还主张两个文明一齐抓。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有自己的优点，要加以发扬光大。他说，“我们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就要“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为一个大国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sup>②</sup>虽然上述这些设想在当时由于种种局限未能实施，但他决心要把一个积弱已甚的中国，建设成为与欧美并驾齐驱的新式共和国的大同理想，是很崇高的。

孙中山认定建设中国有一个好的计划还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必须有一个清

政廉明的好政府。孙中山规划在革命胜利之初，即建立军政之治，提出“以斯扫除积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抽捐之横暴”。<sup>③</sup>“欲拯斯民于水火之中，而扶华夏于分崩之际”，<sup>④</sup>“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的政府，中国要实现‘任何改进’，中华民族要振兴都是不可能的。”<sup>⑤</sup>而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关键在于各级政府官员从自己做起，带头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孙中山是一位“重实际而黜玄想”的革命家。他的“务实精神”决定他“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他一生提倡以树立人民公仆思想为核心的社会道德，“群策群力，以图振兴”。要求在民初政党纷起，耽于攘权夺利之际注重培植党德。要“各以国家为前提”，<sup>⑥</sup>不可“固守私见，借政党之名，行倾轧之实”。<sup>⑦</sup>并号召“真正爱国的人必须勇于揭露一切阻碍祖国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堕力因素”，<sup>⑧</sup>才能使全国人民觉醒和奋发起为振兴中华而踊跃投身于这一伟大事业。孙中山获选为临时大总统后曾致电告各省都督：“以诸公历战经营，光复神壤，文得赐归国，且感且惭。今日代表选举，乃认为公仆，自顾材力，减无以当。”<sup>⑨</sup>他说到做到，一心为公。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每次改朝换代总是打倒一个皇帝，又换上一个新皇帝。唯有孙中山推翻皇帝不做皇帝。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的清王朝，昨天的革命者，一夜之间成了执政当权派。许多人一朝大权在手，便在庆功会和一片赞扬声中丧失了革命锐气，陷进了贪图荣华富贵的泥潭之中。目睹这一切，孙中山深感革命队伍蜕化的严重性。为了

使“专制政体”连同“帝王思想”一并“绝迹于天下”，他决定变革官制，对各级官员进行革命思想教育。首先是改变称呼。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颁布命令，规定“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sup>⑩</sup>其次是废止跪拜之礼，明令规定普通相见为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孙中山虽然身任大总统、大元帅，但他丝毫没有沾染封建帝王享乐腐化恶习，而是处处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振兴中华。故此毕生“不受金钱财货所引诱，从不广置私产不作子孙马牛”，<sup>⑪</sup>也从不挥霍公款。他奔走革命，得到其兄孙眉倾家资助，甘为国民的公仆。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一位姓萧的盐商特地从扬州到南京求见。一见面萧老先生就行起三跪九叩之礼来。孙中山赶忙把老人搀扶起来，并恳切地说，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体国民服务，你老不能这样。萧老先生随口问道：“总统离职后呢？”孙中山答道：“总统离职后就和老百姓一样。”“唯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省”，是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一贯坚持的原则。孙中山的胞兄孙眉在海外组织发动华侨支持孙中山革命不遗余力，对国民革命作出巨大贡献。后来回国，在一些人的怂恿下，要求孙中山封官。孙中山不循私情，婉言相劝其继续经商，不宜做官任职。还有当时美洲致公堂主持人黄三德回国会见孙中山，毛遂自荐要求担任财政部长。黄曾多年跟随孙中山为革命筹款宣传，贡献很多，是一位对革命有功的老同志。但孙中山却认为他才学不足以承担财政部长的大任，只能聘请他任政



府顾问。

1912年4月，孙中山宣告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第三天，即赴上海、武汉、福州和广州等地进行考察。在福州港口时，看见江面的大小船只都插满“欢迎孙大总统”、“孙大总统万岁”等纸旗。他很不高兴地对来迎接的福建省都督孙道仁说：“太不象话了！总统御任就是平民了，怎么还可以继续称总统呢？如果你们不取消，我只好下船了。”<sup>①</sup>孙中山一生尽瘁国事，不治家产。他临终时所写的家事遗嘱，言其遗产仅留房一所，此房乃四位热心的华侨集资为他在上海购买的。中山市翠亨村的中山故居，则是孙中山哥哥孙眉汇款回乡所建的。由此可以看出，孙中山从不广置家产为子孙谋私福。即使个人生活也保持劳动者的本色。他虽身为大元帅，仍然保持俭朴作风，平日膳食菜式以瓜菜为主，衣着也很简单。有一次，他从广州河南住所到河北文明路广东大学演讲，为了节省汽油，他不乘汽车，改为步行。1917年11月，南北军阀企图通过和谈（至1919年）进行肮脏的交易。孙中山立即发表声明：“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他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为发展我国铁路事业而奔走全国。当时军阀政府曾以物质利诱他，提出给予他总统之“厚禄”待遇，他说：“其曰受功，则虽总统遇我厚，然他人出血汗未得偿，我能腆颜独被优异耶？”<sup>②</sup>断然拒绝了北洋军阀的

利诱，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高尚道德情操。“天下为公”的思想贯穿于孙中山不断追求革命不断追求进步的一生。孙中山之所以能在道德风范上享有盛名，就是由于他毕生具有伟大的思想品格和崇高的革命情操，从而成为人们敬仰的楷模。

正值孙中山逝世65周年之际，我们纪念他，学习他，就要学习他的革命气概和高尚品质，学习他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大公无私、清正廉明，从他的这些思想遗产中吸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并予以继承和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认真贯彻好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① 《孙中山选集》第928页、843页。

② 《孙中山选集》第140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296页。

④⑤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81页。

⑥⑦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81~382、414、477页。

⑧⑨⑩⑪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之《孙中山事迹》。

⑫ 吴玉章《孙中山先生的一回忆》《文汇报》1950年11月14日。

⑬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409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山市委  
责任编辑：林有能

## 历史的偶然性与概率解释

刘文瑞

在我国的历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偏向，就是重视必然性而轻视偶然性，关注历史的因果关系而忽略历史的选择关系，满足于对历史的决定性解释而放弃对历史的概率解释。这种偏向严重束缚了我国史学的发展，有必要加以矫正。

—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选择关系无所不在。历史包含了无数的可能，某一历史事实，只是在众多可能中实现了的一种可能。研究历史，需要弄清为什么，而不能只满足于是什么。仅仅弄清是什么，尚可以摆脱选择关系只讲因果关系；而要弄清为什么，则必须弄清众多可能只有一种变为事实的选择。不弄清为什么，只能从现象上、经验上把握因果关系，而不能从本质上、理性上把握因果关系。或者说，不研究历史的偶然性，就不能理解历史的必然性。所以，不弄清为什么的历史，充其量只能算史料意义上的历史，而无法称之为科学意义上的史学。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的意志以及在历史创造活动中的选择，从属于社会生活中的生产与再生产。但是，这种决定论不同于机

械决定论，历史偶然性被引入到历史认识论之中。历史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偶然的，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只有通过偶然性，必然性才能表现出来。历史偶然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应有的位置。

许多人有意无意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经济决定论，历史是必然的，偶然性无关紧要。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十分重视历史的偶然性研究，反复指出偶然性在历史中的地位。在恩格斯那封著名的致布洛赫的信中总结道：“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历史过程“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决定论之所以重视历史偶然性，关键在于它建立于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不是“从纯粹思维出发”，而

是“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sup>②</sup>因此，在马克思那里，逻辑的方法服从于历史的方法，不是事实适应理论，而是理论随事实修正，从而克服了机械决定论完全排斥历史偶然性的缺陷，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大特征：一是研究方法上演绎从属于归纳，二是理论叙述上决定性解释从属于概率性解释。

历史的偶然性无穷无尽，归纳方法不可能将历史事实囊括无遗。首先，由于史料的缺漏佚亡，我们只能在现存的史料中进行归纳；其次，由于我们的认识能力和手段局限，我们只能在现有史料中择取“主要的”史料进行归纳；再次，以往历史资料的新发现又会不断被补充进史学家归纳过的领域，这种补充会不断更改史学家的择取史料意向和对史料“主要”“次要”的判断，修正过去的归纳；复次，历史的发展还会将现实不断地添进“史料仓库”，促使史学界延展归纳领域和归纳时限，发展已有的归纳。这一过程归纳法不能担保自己不出差错，“甚至它的似乎是最可靠的结果，每天都被新的发现所推翻。”<sup>③</sup>所以，归纳法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有时限的、大体上的，即概率性的。

凡是承认历史有规律可寻的史学家，必须要对历史进行法则解释。而法则解释又可分为两类，即决定性解释和概率性解释。多数史学家都以为，法则解释是必要条件解释而非充分条件解释，法则只能是概括的、轮廓的。坚决主张历史解释是法则解释的亨佩尔从逻辑经验主义出发，把科学解释分为决定性解释和概率性解释两种，认为在自然科学中两种解释的使用率相差不多，而在历史科学中大量应用的则

是概率性解释。这种解释只告诉人们历史发展的“纲要”和因果关系的可能几率，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sup>④</sup>正是这种概率解释，使史学家对历史规律的探寻一直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之中。前人得出的普遍规律，并不是绝对正确的规律，它的概率性，要求并引导后人依据新的事实对它进行修正、补充和更深层次的探寻。基于这种概率解释，史学才能常存常新，持续前进。

## 二

排除偶然性的决定性解释，只有具备了两个条件才能完成：一是掌握世界上“所有的力”，以及“一切事物的特定状态”，即对客观存在了解无遗；二是研究者要具有“博大精深”的无边智慧，能够洞察分析并精确无误地掌握一切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正如拉普拉斯所言：“假定在某一时刻，有一种智慧能够把握自然界所有的力以及组成自然界的一切事物的特定状况——这种智慧博大精深足以对所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那么，它就能将宇宙间从最庞大的物体到最微小的原子的运动全都囊括于同样的公式之中，对于它来说，没有什么是不确定的，未来，一如过去，都呈现在他的眼前。”<sup>⑤</sup>显然，史学并不能满足上述两个条件，起码在目前是无法满足的，历史发展规律也就只能是不确定的偶然性概率描述。即便史学家做出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决定性描述，而且假定这种描述是正确的，它也只能是局部的、有时空限制的，必须从属于整体的、无限的概率描述。况且迄今我们对历史所进行的概率描述仍然是有限的，所以，历史发展规

律的决定性解释实际上是非常“狭隘”的，要受到严格的限制。

历史的偶然性研究在探寻历史规律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打破因果关系的局限，用选择关系反映规律。对历史偶然性的概率解释，大体上有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对我们目前还无法找出因果关系的“纯粹”偶然事件进行概率解释。这种解释在历史研究中最富有创造性。它可以用历史偶然性把人们由于认识能力局限和习惯局限认为“没有”任何联系的纯偶然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从中发现某种规律，是历史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和认识飞跃的重要途径。

例如，按照历史学家的习惯认识，爆发战争的年份分布是纯属偶然的。但是，有的学者用普阿松分布来研究战争频度问题，却突破了习惯认识的局限。<sup>⑥</sup>从1500年到1981年的482年中共爆发过299次战争， $\lambda$ 值为0.69，普阿松分布的理论值与实际值如下表：

一年中爆发的战争次数	实际频度	理论频度
0	223	217
1	142	149
2	48	52
3	15	12
4	$\frac{+ 4}{432}$	$\frac{+ 2}{432}$

上表中的理论值与实际值相当吻合，说明了战争爆发的频度（年份分布）具有非因果性的某种规律。有人认为，这种吻合反映了人类具有一种恒定的“敌意水平”。还有人把每年战争结束次数进行随机变量研究，发现也符合普阿松分布，反

证了人类具有一种恒定的“和解水平”。综合以上两种概率解释，有人认为，人类在社会中恒定的既非敌意（战争爆发）也非和解（战争结束），而是一种对变化的渴望。无论怎样解释，这一研究起码推翻了把战争频度当作不可捉摸的“纯偶然”现象的看法，证明了随机事件中照样蕴含着某种规律。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发掘，人们对战争史规律的认识，早晚会有重大突破。

第二，对从属于不同因果关系序列的同类型偶然性历史事件进行概率解释。这种解释在历史研究中最富有综合性，它可以用偶然性把人们通常认为“不相干”的历史事件联结起来，从而使由不同因果关系序列得出的各个具体历史规律由互不相干转向概率联系，将具体历史规律升华为普遍历史规律，是历史研究由局部到整体、由微观到宏观的主要途径。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线索，都有自身的历史因果序列，但这些不同的因果序列之间多数没有必然联系。中国的辛亥革命，固然有深刻的内在原因，但它与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显然没有因果关联。而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与北非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拉美的古巴革命，几乎“风马牛不相及”。倘若我们能够放弃那种主观臆造的、史实依据不足的因果关系框架，从历史偶然性角度处理这些没有因果关联的历史事件，从中得出足以说明问题的概率性解释，我们就能找出它们的非必然联系，并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普遍规律，民族解放运动史的视野就会从一个个孤立的国家、民族扩展到全球。



第三,对一因多果、一果多因的历史事件进行概率解释。这种解释在历史研究中最富有客观性。这种解释的对象是历史上确有因果关系的事件。历史事件很少有单一因果链的,往往由于历史上的选择淘汰或复合并存弄得线索不清,人们在进行决定性解释时必须“认定”一条主要因果线索,排斥因果之间的偶然性选择,而且还会忽略并存的因果线索,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不同的解释只不过是“认定”因果线索的不同。进行概率解释,则可使这种线索不清的(复合的或选择的)因果关系清理出几率头绪,以客观史实出现的概率确证或反证决定性解释,使决定性解释向客观真理方向发展。从广义上讲,人们认定的因果关系属于科学假说性质,有待于证明,而历史的不可重复性决定了因果证明不能将假说变为事实。因此,概率解释是证明假说、认识历史规律的有效途径。不论概率解释对决定性因果解释是证实还是证伪,都将推动因果解释的进一步完善,修改、补充甚至推翻重构与概率解释不相吻合的因果解释,从而使人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得到验证、深化和发展。

中国农民战争史上一因多果、一果多因的现象十分多见。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每次的爆发原因都是多方面的,而且每次的原因都不尽相同,如徭役过度、赋税过重、自然灾害、政治腐败、民族冲突、异族入侵、对外征战等等,诸多原因导致了同一结果,即农民对政府的暴力反抗。同样是农民战争,每次结果却各种各样,有的引起王朝更替,有的引起宫廷政变,有的导致“让步政策”,有的导致“反攻倒算”,等等。但迄今对农

民战争史的研究仍限于决定性解释的范围,无非是认定一个主要的因果序列,从必然到必然,历史偶然性在无数次农民战争中似乎不存在。

如果我们对历次农民战争的多种原因、多种结果进行偶然性研究,把这些原因和结果当作随机离散现象,用统计学方法归纳出各种原因和结果的概率分布,我们就可以比较客观地确定引起农民战争的主要原因以及农民战争的主要后果,甚至有可能掌握农民战争不同原因与不同后果的各自临界值。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依据概率分布构造农民战争中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量化模式,使我们对农民战争史规律的认识由浅入深,由粗略到精确。这种概率解释,是历史科学的活力所在。

### 三

认识历史偶然性和概率解释的地位,对于我国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史学界一直被这样一个命题所困扰:决定论是唯物主义的,非决定论是唯心主义的。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只注意必然性因果联系,不注重偶然性随机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偏爱寻找因果关系的演绎法,忽视寻找随机关系的归纳法。我们的史学往往象恩格斯嘲笑的那样:“必然的东西被说成是唯一在科学上值得注意的东西,而偶然的東西被说成是对科学无足轻重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可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知道的东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都是可以不加理睬的。这样一来,一切科学都完结了,因为科学正是要研究我们不知道的东西。”<sup>①</sup>

我们虽然承认历史偶然性，但我们却不敢从非决定论角度来探讨偶然性，把一切偶然性都塞进决定论的因果关系框架。丰富多彩的历史，正是沿着这一途径被简单化为公式的。

正是由于我们在认识论上的偏差，往往使归纳成了从属于演绎装饰品，不再起对演绎前提的否定和质疑作用。历史研究的逻辑分析前提由经验性质变为先验性质，史料的随机性被人为抹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论断成了没有条件限制的全称判断，而不是含有概率的盖然判断。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sup>⑥</sup>

从概率性解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论断，我们会认识到，马克思并没有终结对历史规律的认识过程，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掘历史资料，并按照历史资料的客观分布从中归纳为新的解释，为更高层次的演绎推理提供新的前提。不再局限于证实马克思曾经提出过的论断，而力求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断。对历史进行概率性解释，还有助于我们正确处理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更科学地把握史学认识与历史真实之间的相互影响，以促进历史研究的发展。

近年来，史学方法论的研讨堪称热潮，而且确实取得了较为重大的进展。最明显的是，过去中国史坛上很少见且不被重视的计量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比较史学方法、系统方法、社会史学方法等，不仅为史学界所瞩目，而且引起了争鸣。但这种热潮的背后蕴藏着不足，笔者认为，

主要的不足是没有把方法论和认识论结合起来。而没有认识论的变革，方法论的变革就难以奏效，或者事倍功半，即使引起轰动也缺乏“后劲”。认识论上一旦突破，就可扫除方法论研究中的许多障碍，进而铺平史学现代化的道路。因此，历史的偶然性研究和概率解释，不仅能促进认识论的变革，而且能促进方法论的变革。

首先，计量史学方法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概率解释方法，统计规律本身就是概率性规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计量史学的发展速度令人瞠目，概率论成了史学中的一种基本方法理论。但在我国史坛上，计量方法仅限于十分初级的数据处理，概率论指导下的统计分析和统计研究还谈不上。我们只有把历史研究的角度转向概率解释之后，计量方法才可能为史学界普遍接受，上升到较高层次。

其次，比较史学方法的基础是归纳方法，比较研究的目的就是从多样性中找出统一性，从具体中找出普遍，从相异中找出相同，最终从个别找出一一般，即从丰富多彩的现象中找出经验规律。这种经验规律在未经比较范围之外的历史事实验证，即演绎验证之前，只能是对历史的概率解释。

再次，心理史学方法、系统方法、社会史学方法，都离不开对历史的概率性解释，这几种方法的共同点，是对历史上的离散无序现象进行研究，找出其中的有序规则。心理分析离不了个案、问卷、作品、笔记的统计学研究，系统方法离不了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统计结构分析等统计学研究，社会史学方法离不了随机抽样、经验归纳、离散值处理等统计学研究。

所有这一切，决定了这些方法立足于历史的概率性解释。

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互相关联，我们以往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多限于本体论，对认识论与方法论重视不够，不但没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唯物史观倒退到机械决定论。重视历史的偶然性研究，给历史的概率性解释以恰当地位，是我国史学界的一个迫切任务。

①、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0页。

③、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206、196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

④ 亨佩尔：《普遍规律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

⑤ 转引自陈克艰：《上帝怎样掷骰子》第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⑥ 普阿松分布是一种离散变量分布的概率模型。如果一个事件（如战争）在每单位时间（如例中的432年）以恒定的平均比率 $\lambda$ 出现，则在T单位长度时间内该事件出现的次数X服从普阿松分布 
$$P(x=r) = \frac{e^{-\lambda T} (\lambda T)^r}{r!}$$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凌 峰



##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梁渭雄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只有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这一精神支柱的巨大作用，才能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好。

###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支柱的新型社会精神文明

所谓精神支柱就是在社会精神文明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的系统化的思想意识。任何一种精神文明，都是以各自历史阶段上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为核心，为精神支柱的，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是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各自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但是，由于它们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都是以私有观念、利己主义为精神支柱，一切以剥削阶级的私利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基础上的，是以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为核心的。而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是什么呢？是

马克思主义。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所指出的，“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的伟大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我们的理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民主法制观念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是处于核心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精神支柱；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支柱的新型的社会精神文明。

具体来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建设方面，主要的是要使人们确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道德和



纪律；而它们又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是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客观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指明了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争取解放，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和途径。所以，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为根本，人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以及道德纪律等，才有一个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和深厚的根底，否则，就会随风而动，摇摆不定。

在文化建设方面，我们与过去剥削阶级统治的文化建设，在性质上和方向上存在着根本区别，这也要靠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保证。这无论在文化、教育、科学、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方面，都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一、为社会主义的各项文化事业确定符合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利益的方针政策，以保证各项文化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二、为各项文化事业的建设、改革和发展，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三、在各项文化事业的具体活动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原则和态度，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四、在文化事业的各个领域贯彻实现思想教育引导的任务。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思想文化具有多元性、多层次性和开放趋向性的特点。在这多元性的情况下，要保持和发

展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想文化的主体地位，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多层次的情况下，要使思想文化逐步向高层次发展，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开放趋向中，要正确开展对外来思想文化的联系、吸收与批判，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江泽民同志在建国4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强大精神支柱的民族，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确立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支柱，是我们新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 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坚持精神文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原则

（一）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是当今的时代潮流，这不仅有利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这已为实践所证明。改革开放有力地促进了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同时也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物质基础雄厚了，不仅有助于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而且有助于人们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提高。这是必须首先充分肯定的。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也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的问题。

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改革开放的主要问题。事实表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的发展，正在极大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财富和社会效益大幅度增加，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了改善。这是本质和主流。同时，也必须看到，尽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着性质上的区别，但只要是有商品经济，也就有着它们的共同属性，况且我们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也就难以避免地存在消极的因素，带来消极的影响。比如，商品经济是以价值规律为前提的，在促使了人们注重交换价值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商品的价值；商品经济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促使了人们注重经济核算，但却使人们容易萌发一切向钱看的拜金思想；商品经济强化了人们的物质利益观念，却容易淡化人们的奉献精神；强化了人们的竞争意识，却容易淡化了人们助人为乐的精神；强化了人们追求物质文化生活消费的意识，却容易淡化人们艰苦朴素的观念；强化了人们的个人成才意识，却容易淡化人们服从组织需要工作需要的观念；特别是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往往容易被一些人错误地引进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交往当中，作为人际关系的准则，等等。这都充分说明，必须十分重视处理好发展商品经济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者应该是统一的。因为我们要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如果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走向资本主义的轨道。同时，我们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要与精神文明的发展、社会主义新人的发展统一起来的；如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原则，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导致阻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发展。

当前，特别要注意在发展商品经济中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物质利益关系，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三者利益关系明显化起来，这种明确的利益关系大大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和竞争性，培养了主人翁的责任感；但与此同时，也可能导致人们某些观念变化所引起的消极作用，如斤斤计较本单位和个人利益的狭隘观念，单纯为了追求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而不顾大局、不顾国家利益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这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进行教育、引导和批判。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当前十分突出的是一些人把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照搬过来，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各种各样的行贿受贿等贪污腐败行为，大多是在这样的思想原则侵蚀下发展起来、泛滥起来的。因此，必须特别注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防止和抵制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的侵蚀。

（二）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

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文化理应是全人类文化的精华荟萃。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文化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卫生、体育、文物、图书馆、博物馆等，都有了新

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不容置疑的。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蚀和影响，因此在文化领域中存在着偏离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情况，有的甚至比较严重，造成了“精神鸦片”的传播和泛滥。比如发表宣扬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言论；发表宣扬了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东西；发表宣扬了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崇洋媚外的东西；发表宣扬了渲染色情淫秽、暴力凶杀和封建迷信等黄色庸俗下流的东西；等等。事实充分表明，坚持文化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必须高度重视的至关重要的问题。现阶段，应该着重坚持贯彻以下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工作原则。

一是坚持文化建设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这是文化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是检验社会主义文化的社会作用的标准，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是文化发展的源泉。文化的建设，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离不开社会主义。文艺、新闻、出版等要努力反映在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伟大斗争，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和趋势，反映祖国灿烂的历史和广阔的现实，从而鼓舞人们的斗志，确立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如果文化事业偏离了为人民服务 and 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方针，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它就失去了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应有的作用，失去了它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二是坚持文化建设以社会效益为最高标准的原则。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

主义精神产品生产的一个基本原则。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工作是以提高人们的文化科学水平、思想道德水平和增强人民体质、维护人民健康为宗旨的，根本不同于以盈利为根本目的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部门，也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工作、经济活动。精神产品、文化活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思想品质的高低，社会伦理道德的和社会风气的好坏，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工作的最高准则只能是社会效益。当然，文化部门也是要讲经济效益的，但要适当，而且必须坚持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的原则。这就要求文化部门一方面既要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健康有益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要求的精神产品，另一方面又要抵制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要求，毒害人们心灵，庸俗、低下、消极，有损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产品。

第三，还要正确处理好对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借鉴、吸收与抵制、排除的关系，坚持把两方面统一起来。这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必须坚持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原则。因为社会主义文化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大道而凭空创立和发展的，它是以往历史上文化优秀成果的批判继承，是人类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在当代的最高表现。社会主义文化不仅不排斥以往社会文化的成果，而且是更自觉地借鉴和吸收历史遗留下来的精神养料，有分析、有选择地批判继承其中有益的成分。对于现代资产阶级文化的态度也是如此。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我们确定了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抵制相统一”、“排污不排外”的正确方针。

（三）在社会主义的教育建设中坚持

马克思主义原则。

教育建设与文化建设一样，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国40周年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教育，就是提高民族素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基础性、根本性的环节。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也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坚持教育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去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深刻教训，使这个问题更加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育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其他方面一样，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影响，在教育问题上也存在着各种错误的思潮和倾向，以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原则和方向。比如有人说什么“过去提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错了，现在提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也错了，教育的功能只在于育人”，“学校要以教学为中心，不要提把坚定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已经过时”；等等，这都是涉及到办教育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重要问题。

教育工作与物质生产不同，教育的功能在于育人。如果抽象地说，这没有错。问题在于我们要育的是什么样的人？如果离开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离开一定社会和阶级的政治、经济的状况和要求，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得到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独立的、抽象的教育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的教育脱离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实际需要，抽象地鼓励什么学生的“自我设计”、“自我发展”等等，也就必然为资产阶级的渗透敞开大门，这就必然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

坚持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与把德育摆在首位，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则，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也都有过深刻的论述。必须认识，德育在培养什么样的人中具有首要的、关键性的地位。我们决不能因为学校以教学为主，就走向只重视智育，不重视德育，忽视和削弱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路子，而是要把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统一起来。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一向十分重视的。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改造社会的最强有力手段之一；而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这是培养学用一致、理论与实际结合、脑力与体力结合的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也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途径。可是，相当一段时间里，对这样一个重要原则也淡薄了，以致培养出来一些人缺乏真才实学，不愿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不愿意做艰苦的工作，反而自以为是社会的“精英”，这也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结果。今后，在我们的教育建设中，必须继续坚持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加强劳动教育，参与社会实践，接触工农群众，以利于培养我们所需要的“四有”社会主义新人。



## 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是深层次的

###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庞大社会系统工程，在整个系统工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有着它特殊重要的地位，它是深层次的处于核心地位的精神文明建设。这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重要作用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科学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学说，是全人类精神文明的伟大成果，它凝聚着全部人类的思想文化的精华，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认识史上最革命，同时也是最科学的学说，是高度革命性与高度科学性相统一的，所以，它是我们的革命、建设事业和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全部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我们的事业就发展，就胜利；否则，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今天，我们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才能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才能正确地制定和贯彻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加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保证社会进步的性质和方向，不断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推向前进。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是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意义的。

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各个层次系统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是处于主导性、支配性的地位的。因为，马克思主

义虽然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它不是一般的组成部分，而是对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起着主导作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处于深层次的核心地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的灵魂”。前段时间，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而产生的思想的混乱，根本在于理论上的混乱，而理论上的混乱，说到底又首先在于哲学上的混乱。所以，必须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和宣传的特殊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重点在于执政党的理论建设。只有全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特别是首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全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真正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核心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是有明确的认识和良好的传统的。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就十分重视党的理论建设，并且把党的理论建设与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毛泽东在30年代的重要著作《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的发表，40年代初《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发表，以及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加强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重大决策和措施。在我国社会主义初期，我们党也十分注意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强调加强理论建设。毛泽东在50年代已反复强调指出：“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毛

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2页）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同样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建设，邓小平同志为此曾发表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重要文章，为在改革开放的新条件下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指明了方向。当前，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也把党的理论建设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作为全党的紧迫任务。江泽民同志在建国40周年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指出：“党在理论上的提高，是党的领导的正确性、科学性的根本保证。鉴于世界和中国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鉴于我们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担负的重大责任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有必要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和探讨当代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理论问题，作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提到全党面前。在党内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中，要提倡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特别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这是中央关于加强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决策，必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包括理论研究、理论教育和理论宣传等几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在理论建设中，一定要坚持不懈地从这几个方面着重抓好以下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工作。

一是要提倡认真学习、研究和宣传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特别是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是说，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比如主观符合客观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全面的辩证的观点、阶级分析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等。要深刻领会列宁所说的辩证法这一“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

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和探讨当代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理论问题，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它是在历史和科学的前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尤其是当代的世界和中国都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和认识，因此，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各个方面研究探索当代世界的新情况、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情况以及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重大任务。特别是探索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研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更应作为我们理论研究工作的基本主题。

三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不懈地深入开展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分析批判，澄清思想理论上的混乱，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也是理论建设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因为，国际敌对势力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在国内，四项基本原则

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也将长期存在，因此，在理论建设中，决不能把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分析批判当作一时之举。

四是坚持不懈地加强对广大干部和青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教育和训练工作。使他们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牢固掌握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坚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从而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正确认识和改造自己。特别是在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荒疏的严重情况下，理论建设

更加要着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把是否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作为党员干部有没有党性的重要表现，作为青年是否革命化的重要表现。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不能灌输”、“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有悖于思维规律”等种种错误的说法，对于部和青年的理论教育造成严重的恶果，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必须予以纠正。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范 英**



## 借鉴香港和国外社区工作的意义

邓演超

香港的社会福利和社区工作，从战后到现在已有40多年历史。它从组织中国民间的慈善、救济组织——街坊会、互助会开始，经过不间断的努力，协同港府去处理各个时期的移民问题和社会问题，逐步建立了当代世界流行的社区工作。被西方视为社会福利和社区建设较发达的地区之一。香港社区工作的要点如下：一、有系统的社区发展理论和方法作指导。香港社区工作采用英美社区工作的理论，并吸收欧美、新加坡、台湾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1976年继港督提出“社区建设”之后，提出了《社区发展立场书》。1986年的立场书指出：“社区发展是一个提升社会意识的过程。以集体参与鼓励居民识别和表达本身需要并因而采取适当行动。这种社区导向性的社会工作方法，内容包括一系列经过计划的行动，最终目标是谋取社会正义和改良社区生活的素质。”这一关于社区发展定义的表述，同国际上通行的社区工作的含义是一致的。二、强调发动居民参与、提高社区的自助和自治能力。香港在社区发展和其他社会服务工作领域，如社区中心、邻舍层面发展计划、社区健康计划、劳工发展服务、公民教育、妇女发展工作、区议会、地区选举等等，都贯彻教育与组织居民，围绕社区发展目标，提高社区意识，培养居民领袖（骨干），实行社区自治，动员自身的人力、物力来解决本社区的问题。三、大量工作由民间团体——志愿机构承担。香港以团体会员资格参加“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的志愿机构有191个，它们在联会的统筹、协调和不抵触法律的情况下，可独立自主地开展各种社会福利工作，以自己的服务争取政府、社会

各界和海外人士的支持。这是香港社区工作的一大特色和优点。四、在志愿机构担任专职的社会工作人员大都年轻、有朝气，经过专门训练，修完“社会工作学系”课程。他们在学期间除了要系统学习多门社会科学课程，掌握社会个案工作、社会团体工作和社区结构与发展等工作方法，还十分强调社区实习，熟练掌握从社区理论、政策到组织、动员、宣传等技巧。其待遇与政府工作人员相同。五、计划性、规范性较强。香港的社会福利工作和社区建设要通过一系列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贯彻实施，每项计划从工作内容、组织措施到目标要求等等，大多都有数量指标。如社会福利服务制定了一个标准性的规划：在1.5万至4万人口设社区会堂；在4万至8万人口设社区福利大厦（屋邨社区中心）；在8万至12万人口设社区中心。六、政府、社会各界重视社会福利和社区建设，分别提供了财政支持。据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研究部1988年统计，香港社会福利、医药卫生和教育署等政府部门，在1986年4月至1987年3月财政年度，给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和会员机构津贴6.981亿港元；该会从香港和海外的基金会、投资和服务等，收入2.48亿港元，总收入9.463亿；各项社会工作活动总支出10.976亿港元。（不含政府部门管理的项目）在总支出中，专业社会工作者和职员的薪金近8亿元，占总支出72.35%。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香港对社区建设，对专业社会工作者的重视。

广州虽没有广泛使用明确的社区概念和理论，但实际上建立了强有力的、相当地域性基层社区的区、街工作。一、区、街工作的总任务和目标是，从实际出发，把区街建设成为“经济繁荣、



文化发达、道德高尚、社会安定、生活方便、环境优美”的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区街。以造福区街，逐步提高广大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宗旨。二、有一支在建国前后参加工作，熟悉情况，有较丰富的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经验担任骨干的区、街干部队伍。每条街有干部100人左右。这批干部近几年分别参加各类成年人教育，提高了政治文化和业务水平，并补充了一批年青干部，朝着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和年轻化的方向进行建设。三、在理论和方法上，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运用传统的群众路线和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带动中间，推动落后，不断促进工作的进步。四、组织严密。区、街工作在中共广州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下，分市、区、街（镇）、居委会四个行政层次。街道办事处目前仍是区政府的派出机关，但已在相当程度上起了基层政权的作用，行使了许多地域管理的职能。街道办事处直接领导、管理由居民按居住地区直接选举组成的居民委员会。居委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将居民按地段或楼、院编成居民小组。五、群策群力。区街的各项工 作，如发展经济、安置就业、计划生育、治安保卫、环境整治、宣传教育、除害灭病、托幼安老、扶残抚恤等等，统属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除了区、街、居委会负责组织，还有民政、教育、卫生和劳动等部门，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红十字、残疾人等群众团体协同工作，广泛组织发动辖内机关、部队和企业“共建”，吸收居民中的积极分子，退休的工人、干部、教师以及学生等义务参加，形成了社会合力，有力推动了各项社会工作的进步。六、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资金。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福利由国家包下来逐步改变为“社会福利社会办”，采取由国家、地方财政拨款、区街经济支持、辖内企业和机关单位集资、发行福利奖券、兴办福利基金以及福利单位的经营和服务收入等。

香港和广州由于政治、历史、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两地的社区工作，在工作目标、内容和方法上，既有共同、近似的地方，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第一，两地政府都重视社区工作，工作内容（项目）大体相同，都注意发动居民参加（与），以提高居民的素质、安定社会为目标。两地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基本上适应了各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and 水平。第二，香港的社区工作，以现代社区理论和方法作指导，有一支专业“社工”队伍，通过社团和民间志愿机构进行工作，基础设施和工作条件优于广州。但是，由于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广州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两地的社区工作又有来源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根本不同的区别。第三，广州的社区工作强调深入实际，依靠居委会和基层骨干，发动群众，组织程度和教育活动优于香港。区、街、居委会三级，特别是街道，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以一部分收入用于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也注意动员社会力量和资源开展“共建”活动。但是，广州的区街工作，没有普遍应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社区发展的理论和方法。干部的年龄较大，文化素质较低，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没有上升成系统的理论，工作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还没有形成一个既有利于生产发展，又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机制，存在着多头管理，功能不全，不协调、不规则的状况。为了扬长避短，兴利除弊，借鉴香港和国外的社区发展理论，对于提高我们的工作水平，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理论，开展社会主义的社区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一，有利于动员群众和社会力量，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型社区。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家还不富裕，如何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深化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发展民主，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又保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实践表明，这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和困难的任务。为此，我认为，借鉴社区发展的理论和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城乡推行社区发展战略，有助于完成上述任务。这就是：依靠群众，依靠基层，面向社区，扎扎实实地动员群众和社会力量，进行两个文明建设，使社会保障系统成为社会稳定机制，把社区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社区，增强爱国、爱乡（社区）的归属感，开辟一条通过建设基层社区促进国家发展的新路子。

第二，便于实现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服务体系社会化。

推行社区发展，强调组织发动群众，实现社区自治。社区工作人员在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的领导下，以普通群众的姿态，深入社区，将居民和机团组织起来，提出若干发展目标。起初这些体现社区群众共同利益的目标，往往是单项的，逐渐变为多项；在条件成熟时，就可以将生产、教育、福利、卫生和社团工作等，统一纳入社区发展计划，并与区（县）的发展计划相衔接。这样，随着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就可以提高社区的自治程度，实现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体系的属地化和社会化管理，从而大大减少以至完全解除“企业办社会”，释放生产力，并将面临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缓和、化解在社区，增强社区的整合能力。

第三，有助于加强和完善基层政权。

目前，我们城乡基层政权仍有待加强和完善，农村有一部分处于瘫痪、半瘫痪；城市街道办事处，实际上承担了大量基层政权的工作，已远远超出1954年《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所规定的三项任务，但至今仍然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区政府作为城市的基层政权，不仅管辖的范围过大，人口过多（广州市四个老市区，一个区管辖50万—60多万人），而且距离群众太远。街道办事处由于没有全面享有一级政府的行政权力，特别是没有街道一级财权，许多有关生产和群众生活的问题都难以解决。而推行社区发展计划，有步骤地建立社区自治组织，首先要求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加强对群众自治组织的领导。这就要求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加强自身建设，克服组织不健全或无人管理的状况。其次，在党组织和基层政权领导下，建立了社区自治组织，广泛开展了社区服务。街道办事处若改为基层政权，就可以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构想，根据“党政职能分开”、“下放权力”的原则进行设置，大大减少日常事务，切实加强基层政权的职能。而社区群众组织在基层政权的指导、帮助和监督下，可以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的作用，做到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办。

第四，有利于清除封建残余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总结了民主和法制方面的历史教训，在推进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专制作风、特权思想、宗法观念、拉帮结派等还屡见不鲜。而且，越到基层，民主风气和民主生活越淡薄，封建宗法习俗和独断专行的作风越浓。而推行社区发展，根据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在基层实现群众性的社区自治，是在城乡铲除封建残余影响，普及民主的好方法。

如上所述，社区发展理论和实践的精髓是民主。社区共同利益的认定，目标的选择，力量的组织，决议的作出，领导人的选举更换等，都离不开完整的民主（程序），离不开社区居民的直接参与。民主意味着平等，在社区组织里，人们只有庄严的一票，少数服从多数被视为最高原则，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的相辅相成，都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可见，社区的发展，就是民主生活和民主制度的发展。社区自治组织，就是学习和训练民主的学校。社区自治组织既同国家形态的民主、基层政权和人民代表大会相联系，直接参政、议政，监督国家工作人员，推进经济、文化和廉政建设；又将民主生活和民主管理普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起到调节各种社会关系，增强人民内部团结，打击坏人坏事的作用。而当民主被人们熟练地运用，成为习惯，就会成为清除封建遗毒，移风易俗，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和新道德的武器。通过基层社区的民主，推进国家实现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可以预期的。我们应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区工作体系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责任编辑：范英

## 论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

杨 松

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曾经说过，否定之否定“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每日每地都在发生的过程，一旦消除了旧唯心主义哲学盖在它上面而且由杜林先生一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学者为了自身的利益继续盖在它上面的神秘垃圾，它是任何一个小孩都能理解的。”<sup>①</sup>可是时至今日它仍然没有广泛地被人们所理解，在理论界它仍然是一个有着较多争论的问题。例如有人继续把它当作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认为否定辩证法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矛盾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从而主张用对立统一规律代替它。有人虽然承认否定之否定规律，但往往把它置于对立统一规律之下，不能提高它在辩证法中应有的地位，生怕染上黑格尔主义瘟疫。要搞清这些问题，我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将否定之否定理论化、系统化的哲学家，研究、探索黑格尔关于否定之否定的结构、由来和实质，或许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掌握否定之否定规律。

### 否定之否定的结构

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如果从形

式上看，好象和旧的三段式差不多，也好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它是由两个对立统一构成的。如果从内容上看，它却是由两种极端对立的哲学观点，即形式逻辑的“抽象同一”和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即“具体同一”有机结合的产物。这些听起来可能会感到奇怪，然而的确是事实。

黑格尔在论证他的思辩逻辑时曾这样讲过：“思辩逻辑内即包含有单纯的知性逻辑，而且从前者即可抽得出后者。我们只消把思辩逻辑中辩证法的和理性的成份排除掉，就可以得到知性逻辑。这样一来，我们就得着普遍的逻辑，这只是各式各样的思想形式或规定排比在一起的事实纪录，……。”<sup>②</sup>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出黑格尔的思辩逻辑是在普遍逻辑的基础上，把辩证法的和知性的(形而上学的)这两种根本对立的成份有机结合的产物。在黑格尔看来，形式逻辑只能在有限关系里作形式的推论，这种有限关系在他看来正是以抽象的同一性为基础的。他说：“理智的同一性，即任何东西都不应该自相矛盾，是它的基础。这种逻辑，按其本性来说就不是

思辩的。这个逻辑只是有限的东西的逻辑，但人们却也必须熟知它，因为在有限的东西里面，到处有它的存在。”<sup>③</sup>他认为，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则作为真理的逻辑标准是不可缺少的，但它提供的只是形式上的正确，而不是知识内容的真理性。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与形式逻辑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形式和内容是密切联系的，它不像形式逻辑那样没有矛盾，没有发展，也没有各部分之间的内容的必然联系。所以要把握事物的具体真理，光靠形式逻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突破抽象同一性的狭隘界限，使之与具体同一性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新的逻辑学——辩证逻辑。否定之否定的构成也正是采用了这种方式。

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个公式是由三个阶段和两个否定构成的，这一点是大家都十分清楚的。但是，这个公式还包括两个同一，这一点可能就不很清楚，因为人们不太注意同一—区别(对立)—同一—这个公式。至于这个公式所包括的两次否定和两个同一也是两个过程，这一点也就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而这正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奥妙之处。

黑格尔在用他自己所特有的逻辑推理的形式描绘世界的自我发展过程时，曾经对否定之否定的结构作过如下的规定，他说：“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者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实体作为主体是纯粹的简单的否定性，唯其如此，它是单一的东西的分裂为二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

程，而这种过程则又是这种漠不相干的区别及其对立的否定。所以唯有这种正在重建其自身的同一性或在它物中的自身反映，才是绝对真理，而原始的或直接的统一性，就其本身而言，则不是绝对真理。”<sup>④</sup>黑格尔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实体。在他看来，世界的发展并不是客观世界本身在发展，而是他的绝对精神在发展。所以，他把绝对精神看作是唯一的活的实体(这个实体即绝对精神，处于肯定阶段，它和自己是同一的)。绝对精神首先外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变为主体，(在这里绝对精神进入否定阶段，出现了区别和对立)最后它又回到绝对精神，在黑格尔哲学那里达到了绝对真理。(在这里绝对精神已进入否定之否定阶段，重建其自身的同一性。)虽然黑格尔这种描绘方式带有某种神秘性，是十足的唯心主义，但是他却猜测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自我发展，自己运动的客观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客观世界的辩证发展过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是这个过程的形式，同一—对立—同一是这个过程的内容。第一次否定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单一的东西分裂为二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把绝对精神分裂为绝对精神和自然界、人类社会两个方面的过程。这是统一对立者，即抽象同一，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分为二”的过程。

第一次否定的结果没有达到对立面的统一，因为绝对精神外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以后，绝对精神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它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同自己绝对对立起来，没有把对立面的双方统一起来。



也就是从肯定（正）到否定（反），并把正、反两者对立起来，使它们互相排斥，互相矛盾，没有达到两者的统一，是简单的否定，抽象同一。黑格尔在认识的阶段性中对这种简单的否定做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认为可以把认识分为知性规定、消极（否定）理性和积极（肯定）理性三个阶段。知性规定使某物成为某物，不是它物，这是肯定或正的阶段，理性是相反的，它把知性的规定加以否定，使某物变成它物，体现了否定的精神，但理性对知性规定的否定是简单的否定，只是使某物走向反面，某物变成它物，所以是消极的理性，这是否定或反的阶段。

在黑格尔看来正、反两者都不是真理，只有两者的对立统一“合”才是真理。所以过程到此并没有结束，还要对第一次否定的结果继续进行否定，即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杂多现象之间的漠不相干的差别，以及绝对精神和自然界、人类社会之间的对立进行否定，这是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在如何扬弃消极理性的过程中，黑格尔对第二次否定也做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认为精神把知性规定和消极理性结合起来，扬弃了消极的理性，达到了对知性的否定之否定，进到了理性的最高原则——对立统一，认识到某物是某物，又是它物，所以精神才是积极的理性，积极的辩证法，这才是否定之否定（合）的阶段。

否定之否定是对第一次否定，即简单的否定的否定。第一次否定离开了正，第二次否定又回到了正，因此否定之否定就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不能把否定单纯看作是否定，也要把它看作是肯定，所以黑格

尔把否定之否定看作是具体的否定，绝对的否定，是具体的同一。这种否定使绝对精神又重新回到绝对精神，并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绝对真理。这个过程就是绝对精神和自然界、人类社会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过程，是具体同一，也是人们通常说的“合二为一”的过程。

以上两个过程的结合，即抽象同一和具体同一的有机结合，也就是从正到反，以及正、反两者的统一“合”的进展过程和推论过程。这两个过程的结合，在黑格尔那里适应于一切逻辑范畴的变化。发展的圆圈式、螺旋式、周期性，从低级到高级，从抽象到具体等等，一系列的重要思想都是由此而产生的。黑格尔在谈到直接的东西（肯定的东西）经过间接物（否定的东西）转化为普遍的东西时指出：“用以证明这一点的实例，那末全部逻辑都是由它们组成的。”<sup>⑤</sup>

从上可见，在黑格尔看来两种极端片面的哲学思想经过有机的结合是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的。他在把斯宾诺莎的物质实体和莱布尼茨的精神实体“单子”，相结合成他的精神实体绝对观念时更加明确地指出：“某一种哲学原理的片面性通常都是跟相反的片面性对立起来，于是整体往往作为至少是一种散漫的完整性而出现。”<sup>⑥</sup>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黑格尔构造了他的整个哲学，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构造了他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 否定之否定的由来

抽象统一，这种哲学形式在哲学史上最早是由古希腊以芝诺为代表的埃利亚学派提出来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

对立统一，是赫拉克利特的具有辩证

法的哲学世界观。他认为：一切都是生成，这个生成就是原则。这点包括在这句话中：存在和非存在是同样的少。这就是说存在并不比非存在多，非存在也不比存在少，存在和非存在既是对立的（有区别的），又是统一的（同一的）。存在和非存在的对立统一便构成生成，并把它看作是存在和发展的原则。关于这一点，列宁曾明确指出：“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世界的基本规律是‘向对立而转化的规律’。”<sup>⑦</sup>我们可以把对立统一这种哲学形式用公式表示为：对立—同一。

以芝诺为代表的埃利亚学派则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存在或一，否认非存在的存在，认为非存在是不存在的，至于人们之所以说非存在是存在的，那只不过是人们的意见，是不真实的。他们还把存在和非存在，一和多绝对对立起来，否认它们之间的转化。黑格尔认为把“有只是有，无只是无”当作原则的哲学观点，可以称为同一性体系。但是这种同一性只能是抽象的同一性。因为在他看来，以芝诺为代表的埃利亚学派也认为世界是统一的，只不过是统一于存在。由于他们否认非存在，并把存在和非存在对立起来，所以黑格尔又把这种抽象同一性的哲学形式称为统一对立者。我们可以把它用公式表示为：同一—对立。

以芝诺为代表的埃利亚学派的抽象同一也包含着辩证法的因素，因为他们不是从运动和变化的外部，而是从内部反对运动和变化的。比如他们说：“假如你肯定变化，则变化里就包含着变化的否定，或变化的不存在。”<sup>⑧</sup>这样他们就揭露了事物的内在矛盾。在黑格尔看来，正是揭露事

物本质自身所具有的矛盾才是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此外，黑格尔认为辩证法还应具有思辩的形式，但是在埃利亚学派之前辩证法还没有达到用思辩的形式来表现概念，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还处于感性的直观阶段。当时人们所使用的概念都是一些具体的概念，直接的概念，而不是一些纯粹的抽象概念。例如，赫拉克利特所说的存在和非存在都是具体的存在，不是抽象的存在。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火，这个火就是一个直接的概念。埃利亚学派所说的存在或有，却是纯存在或纯有，是一个纯粹的抽象概念。黑格尔认为“埃利亚学派最早有了纯有这种简单的思想，尤其是巴门尼德把纯有当作绝对物，当作唯一的真理，在他的遗留下来的残篇中……第一次以绝对的抽象来理解有。”指出：“唯‘有’有，而‘无’则全没有。”<sup>⑨</sup>因此黑格尔说他在埃利亚学派那里发现了辩证法的开端。当然，他们的辩证法是主观的辩证法，是属于主体的考察。

如果我们把芝诺的抽象同一和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一结合起来，即把同一—对立和对立—同一—同一结合起来，便构成同一—对立—同一，这就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公式的内容。我们把这个公式同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所概括的同一—差别（其中包括对立）—矛盾这个公式相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是完全一致的。因为黑格尔说解决了的矛盾就是根据，就是作为肯定和否定的统一的本质。这里的统一就是同一，两者用法完全相同。“同一性……是从存在中出来的”，<sup>⑩</sup>目的是要证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要达到这种统一，可能有

两个途径或形式”，<sup>⑩</sup>既可以从同一出发，也可以从存在出发。同一—对立—同一是一种形式，有(存在)—无—变是另一种形式。

同一—对立—同一是芝诺的抽象同一和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一有机结合的产物。黑格尔认为这种作法并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主观辩证法或统一对立者，这种哲学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说：“芝诺的主观辩证法更进一步的发展，就必然是主观的辩证法变成客观辩证法，亦即把运动本身了解为客观的东西。……这是必然的进步，这也就是赫拉克利特所做出的进步。‘有’是‘一’，是第一者；第二者是‘变’—赫拉克利特进行了‘变’这个范畴。这是第一个具体者，是统一对立者在自身中的‘绝对’。因此，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哲学的理念第一次以它的思辩形式出现了。”<sup>⑪</sup>

黑格尔认为，芝诺的有是一，它排斥多，它否认同一性内部的差别。这种方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与一般的变对立起来。在黑格尔看来变是有是一，是更高的更全面的逻辑范畴，它把有和无，一和多的对立统一起来了，从抽象同一达到了具体同一，亦即从抽象的存在到具体的存在，从抽象的纯有到具体的实有的过程。这段话用公式表示出来就是：有一无—变，这是黑格尔逻辑学一系列否定之否定中的第一个否定之否定。“所以除变自身而外，一切以后的逻辑规定，如实有、质等，总之，一切哲学的概念，都是这个统一的例证。”<sup>⑫</sup>黑格尔认为在每一个事例中，即在每一个现实事物或思想中，都不难指出这种有与无的统一。但是人们往

往用一种简单的判断形式，即形式逻辑来表达这种思辩的真理。例如，有与无是统一的这个命题，虽然是正确的，但它并不完全，因为它否定了有与无之间的区别的意义，这就需要加上一个有与无不是统一的命题来补充，把正题和反题结合起来的命题就是变，就是两者的对立统一，赫拉克利特就作到了这一点。当然，实际上作到这一点的并不是赫拉克利特，而是黑格尔，他所说的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哲学的理念第一次以它的思辩的形式出现了。显然是他把赫拉克利特黑格尔化了。

以上所述，黑格尔把芝诺的抽象同一和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一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而继承和发展了斯宾诺莎的“规定性是被视为肯定的否定”，这一深刻而正确的哲学观点；又在批判康德哲学的基础上采取了康德的“三一形式”；此后他又运用了费希特以“正、反、合”的形式进行的范畴自我推演的方法；吸收了谢林关于“自我设定自身”、“自我设定非我”、“自我与非我的统一”的精神自我发展的思想，从而创立了否定之否定规律。

### 否定之否定的实质

在许多事情上，往往使人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哲学史上也是如此。黑格尔则不然，他把两种片面的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完整的哲学思想，就避免了再犯极端的错误。但是，黑格尔并不是机械地把抽象同一和对立统一并凑到一起的，而是用对立统一作为基本原则有机地把它们结合起来的。就是说，他是把两种极端片面的哲学思想作为肯定（正）和否定（反）两个对立面，然后把它们统一（合）起来，构成否定之否定

的。所以整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实际上就是肯定（正）否定（反）两个阶段的对立统一。

黑格尔把抽象同一这种思维形式纳入对立统一的思维形式之中，构成了对立统一的一个有机部分，这样以来既保留了原来的形式逻辑的特点又改变了它原来的形而上学的性质。例如芝诺的抽象同一和纯有是排斥差别和无的，它们之间是对立的、矛盾的。黑格尔则把这种抽象同一经过差别这个中间环节，转化为具体同一，也就是使抽象同一重建其自身的同一性，把纯有和无的对立统一起来，使抽象的纯有经过无这个中间环节，转化为具体的实有，也就是变。这样就彻底打破了形而上学的是即是，否即否，除此而外都是鬼话的片面性。所以黑格尔不是简单地把抽象同一纳入对立统一之中，而是用对立统一这个基本原则对它本身加以改造的结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④

在黑格尔看来，纯粹的抽象同一和纯有本身也不是绝对纯的，也是对立的统一。纯有就是什么也没有，就是无，“纯存在和纯无是……同一个东西。”⑤他认为抽象同一即 $A = A$ 是空洞的同语反复，一切事物都是有差别的。 $A$ 不是 $A$ ，彼此完全等同的两物是没有的。在同一中包含着差别，在有中包含着无，否则同一就不能转化为差别，有就不能转化为无。黑格尔还进一步指出，每一个规定在其本身的概念中都包含着他物；不认识这一点，在哲学中就寸步难行，同样，第一次否定即简单的否定，在黑格尔的公式中也经过了上述改造，只保留了它的形式，而它的性质却完全变了，

它不仅具有了辩证否定的特性，而且还是构成辩证否定的一部分。所以第一次否定既具有简单否定的特点，又具有辩证否定的实质。

总之，对立统一不仅是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基础，而且也是他构成整个否定之否定的基本原则。

如果我们比较全面地研究一下赫拉克利特关于对立统一的论述，将会发现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只不过是“对立统一”这种思想形式的变型而已。因为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都是从一物向他物的转化，是从分离到统一并从统一到分离的转化”。⑥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公式化为“分离—统一—分离”。为了在用语上同否定之否定的公式相一致，可以把分离改为对立，把统一改为同一，即把公式改写为“对立—同一—对立”，这样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两个公式的差别仅仅在于顺序的颠倒，即对立统一的公式是“对立—同一—对立”，否定之否定的公式是“肯定（同一）—否定（对立）—否定之否定（同一）”。由于事物的确立不是从对立而是从统一开始的，所以应该把从分离到统一并从统一到分离，改为从统一到分离并从分离到统一，那么这个公式就成为“同一—对立—同一”，这样一来两个公式就完全一致了，都说明了一物向他物的转化过程。

当然尽管如此，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和对立统一也还是有区别的，它们不能互相代替。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古老形式，否定之否定是辩证法的现代形式和最高成就。对立统一只是“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



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sup>①</sup>这就是说，对立统一只能指出世界上一切现象都是统一的，事物的对立和统一是无限发展的，但是却不能进一步指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是怎样统一的，即统一是通过什么途径、道路实现的，而这又正是辩证法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这个任务是黑格尔完成的，是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之中，并试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在黑格尔看来，否定之否定比对立同一更能反映事物自我运动、不断运动的特性。因为否定是扬弃，是批判与继承，是向对立面的转化，否定之否定是由同一到对立再到新的同一，这是一个事物完整的发展过程，事物经过两次向对立面的转化，矛盾的双方都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在克服消极因素，继承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出一个新的事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称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辩证法。列宁也把否定之否定看作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特征和本质的东西。

综上所述归结到一点，我们认为矛盾辩证法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它既是否定之否定的基础，又是构成否定之否定的基本原则。否定辩证法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特征，正是由于黑格尔对辩证法这一特征的揭示，使得辩证法由古老形式发展到现代形式，获得了“最高成就”。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8页
- ② 黑格尔：《小逻辑》第182页
- ③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378页
- ④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11页
- ⑤ 列宁：《哲学笔记》第214页
- ⑥ 黑格尔：《逻辑学》上册，第72页
- ⑦ 列宁：《哲学笔记》第320-321页
- ⑧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272页
- ⑨ 黑格尔：《逻辑学》上册，第71页
- ⑩ 黑格尔：《小逻辑》第245页
- ⑪ 同⑩第135页
- ⑫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295页
- ⑬ 黑格尔：《逻辑学》上册，第73页
- ⑭ 列宁：《哲学笔记》第73页
- ⑮ 同⑭第81页
- ⑯ 同⑭第267页
- 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3页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社科部

责任编辑：范英

## 也谈宇宙概念的哲学思考

卢幸青

张剑瑛同志发表在《松辽学刊》(社) 1989年第1期的《对宇宙概念的哲学思考》一文指出:宇宙概念最初确立的科学含义是指时间与空间的统一。而现代科学证明,不存在完全虚空的空间,也不存在脱离物质的永远相同的、自身流逝的时间。所以宇宙就是指所有具体宇宙形态(如基本粒子、天体星系等等宇宙的表现形态)的总和,是它们的共同本质;就是指以时间和空间为存在方式的运动着的物质;就是指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一句话,就是指包罗无数具体事物整体无遗的作为广义自然界的物质绝对整体(往下简称为绝对整体)。而笔者却试图在本文对宇宙概念的界定作点新的探索工作。

我们知道,绝对整体既是无限的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它的运动、变化与发展一方面只能通过无数具体事物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而表现出来,或者说无数具体事物过程只是它的间接表现(往下简称为表现)。这一方面相应着绝对整体的具体性、历史性。是具体事物的相对性的标志。这里的前提是,无数具体事物作为加和性总和是绝对整体的依托。另一方面,无数具体事

物的运动、变化与发展又不过是绝对整体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的体现。这一方面相应着它的无限性。是具体事物的绝对性的标志。在这里的前提是,绝对整体作为无数具体事物的非加和性总和高于其加和性总和。尔具体事物的从无到有的最初实质都是从大有(绝对整体)到小有(具体事物自身),其从有到无的最终实质都是从小有到大有也证明着具体事物过程不过是绝对整体过程的体现。而具体事物过程作为绝对整体过程的表现标志着它遵循着自身过程及其趋势。而具体事物过程作为绝对整体过程的体现则标志着它遵循着绝对整体过程及其趋势。

恩格斯说过,无限时间内宇宙的永远重复的连续更替,不过是无限空间内无数宇宙同时并存的逻辑的补充。在这里,恩格斯认为宇宙作为以时间和空间为存在方式的运动着的物质是有生有灭的,有限的;但又与无限有着本质的联系。这段话的前支是从事物的群体方面来界定宇宙的,〔现存〕宇宙群体〔总体〕只有唯一的一个。而后支则是从事物的个体方面来界定宇宙的,宇宙个体数目是无数的(这

是宇宙与无限相联系处之一)。张晋斌同志发表在《晋阳学刊》1985年第5期的《无限宇宙也是有生有灭的》一文对于宇宙是有生有灭的给予了论证。到此,笔者首先界定宇宙群体是指作为绝对整体的最大本质的对立面即最大现象,它毫无疑问是有生有灭的,只能暂时占有绝对整体不生不灭的、永存的最大本质(这是宇宙与无限的内在式联系)。绝对整体不生不灭的最大本质通过无数宇宙群体的生生灭灭而体现与表现出来(这是宇宙与无限相联系处之一),从而不断经受到锤炼,生命力从而日益强盛。在这里,笔者不赞成说事物的本质与现象的区分是人为了认识需要而外加到客观事物身上去的。因为本质作为较稳定方面与现象作为较易逝方面是一切客观事物都固有着的两个方面。

所谓绝对整体的最大现象就是指作为其无数大小现象的具体事物的总和。由于它具体的历史的占有了全部物质,所以又可以叫作群体绝对性整体有限过程。这是笔者界定的宇宙概念的具体化。所谓绝对整体的最大本质是指其无数大小现象的本质总和即其最大现象的本质的本质。其最大现象的本质是其最大本质的第一级现象,其最大现象的本质的现象即无数具体事物的本质总和的现象总和是其最大本质的第二级现象。生物全息律的发现及其哲学分析表明,无数具体事物作为绝对整体的部分原则上各各都是绝对整体的缩影,且都具有无限层次,且都是无限可分的。所以都完全可以看作是宇宙个体。此外,凡是其绝对性居于矛盾主要地位的宇宙个体都是显在宇宙个体,即是对绝对整体过程的体现程度达到乃至超过

一定阈值的个体绝对性整体有限过程。凡是其绝对性居于矛盾次要地位的宇宙个体都是潜在宇宙个体,即是对绝对整体过程的表现程度达到乃至超过一定阈值的个体相对性整体有限过程。凡是其绝对性与相对性同居于矛盾均衡或中间地位的宇宙个体都是中间宇宙个体,即是对绝对整体过程的体现程度与表现程度不相上下大小多少强弱的个体中性整体有限过程。尔相对作为绝对整体的部分而言,任何宇宙都可以看作是相对整体。而宇宙群体作为具体的历史的绝对整体即是最大相对整体。在这里它作为绝对整体独一无二且包罗无遗的最大部分是相对绝对整体的纵向性而言的。

到此可以总结一下。这就是:笔者进一步阐发了事物的群体与个体范畴同样可运用于并适用于考察宇宙。一切具体事物群体都各各不过是宇宙个体群(宇宙群体的部分数量个体)。尔任何宇宙即使是宇宙群体都不过是绝对整体的缩影,宇宙群体不能再等同于绝对整体。其次,宇宙不是无限空间与无限时间的统一了。即使是宇宙群体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在时间上则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了。再者,宇宙作为整体有限过程,以绝对性为标志着。而宇宙作为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在这里的一个重要体现与表现是其暂时全体的或部分的占有着绝对整体不生不灭的最大本质。尔任何宇宙作为有限都不过是局限性形式下存在的无限的局限性形式不过是有限的体现与表现。所以任何宇宙都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这一点没变。它们使无限的绝对整体经受到的锻炼具有永恒的意义。

当我们说宇宙群体是群体绝对性整体

有限过程，处在显在状态。这是说的一些显在宇宙个体群代表绝对整体成功统摄其余显在潜在中间宇宙个体群的结果。当我们说宇宙群体是群体相对性整体有限过程，处在潜在状态。这是说的一些潜在宇宙个体群代表绝对整体成功统摄其余显在潜在中间宇宙个体群的结果。当我们说宇宙群体是群体中性整体有限过程，处在中间状态。这是说的一些中间宇宙个体群代表绝对整体成功统摄其余显在潜在中间宇宙个体群的结果。显而易见，由于所处情况的无限错综复杂，宇宙的所有个体都绝对不能是清一色的显在或潜在或中间宇宙个体，而是三者并存的。这就决定了上述情况不能不是如此了。

最后，人类社会的一门古老而又常新的科学——宇宙学，其研究对象迄今为止仍不过是宇宙个体群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特殊性的一般方面罢了。不过其时空尺度由肉眼可直观的尺度扩大到目前不能由肉眼直观而必须凭借仪器来观察的以亿光年为单位的大尺度罢了。它的个体数目的无限是部分性的，而宇宙群体个体数目的无限则是总体性的。就某种意义而言，哲学可说是以宇宙群体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普遍性方面为研究对象的宇宙学原理或曰普通宇宙学。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社科部

责任编辑：范英

（接66页）

承包合同手续，以避免社员自发转包而出现的各种弊端。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除加强集体土地管理外，还要加强承包合同管理和集体财务管理。特别是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各种契约关系的增多，集体收入的增加，更需

要加强承包合同管理和集体财务管理。这样，才能使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得以正常运转。

作者单位：广东省政府农业委员会

责任编辑：谭湛明



## 论接受与自性

丁 宁

在心理学的视野里，自性<sup>①</sup>问题是一种人格或个性的问题，它甚至比文化的问题更加困扰人。引人注目的一极是弗洛伊德从变态心理学方面提出的关于自我人格的动力模型，另一极则是以艾森克和凯特尔(Eysenck and Cattell)为代表的有关常态人格的研究。就前一极而言，尽管弗洛伊德的理论以从未有过的深刻性反映了人格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作用机制，但是这一动力模型的构制却主要是一种假定性质的描述结果，而且即使是精神分析的理论本身也时时要否认自性并不仅仅只限于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三重阶梯。因而，这一模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印合人格自身还是一个尚属争议的对象。就后一极而言，也有颇多不明之处。艾森克设想人格只要从三个特定方面考察就可以得到颇为全面的描述，但凯特尔却认为至少要有十六个方面才能全面地说明自我人格究竟为何物。阿尔波特和奥达布特(Allport and Odbert, 1936)曾经作过一项很有意义的耐心统计，发现至少可以有18000多个词语适合描述自我人格，即使努力缩小其范围，也还有5000多个词可以专门地描述人格的性状。对此，凯特尔也曾继而为之，但他仍发现至少应保留160个左右的词语。这一事实使人感到人格是一个令人几乎无从下手的研究领域。<sup>②</sup>

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已经使人格的研究有了一些定量手段，比如对场依存性和场独立性(FD-I)，“认知风格”变量，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的内外向(I-E)等的测定，都为传统的概念提供了大量有效的数据。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定量研究还仍然属于单一品质

(Single-trait)的估计，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可能使人全面地把握自性的整体意义。因而，在这一意义上说，定性的研究仍然是我们权宜地借以观察人格的主要手段或依据。不过，在定性研究的领域里，多层品质论尽管都是以同样的题材为研究对象，但是各自提出的人格模型，其差距之大也实在令人惊讶，不仅在神学、哲学和社会学中人格有不同的含义，而且在心理学也至少已有50多种界定。这里选定的定义出自I·L·查尔德，人格指的是在可比拟的情境中所表明的那些使一个人的行为时时一致，并且有别于他人的多多少少有稳定性的内在因素”。<sup>③</sup>这一定义——正如汉普逊所说——反映了时下流行的人格定义的综合。从这一较为简洁的厘定里，我们可以引出人格的四个方面：

### (1) 稳定性方面

在心理学的立场上看，人格的力量并不直接等同于一般的反应，而是作为诸反应的准备动力而内在作用着，因而特定的人格决定了人对环境与对象的特定反应倾向。主题统觉测验(TAT)和生活史的分析表明，受测者总有其特定的态度及其价值观，并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但是，稳定性的品质是相对而言的。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变化的可能体现在a.人格自身的长期发展；b.短期的波动。有意思的是，变化前和变化后的品质依然含有相通的脉息。因此，变化仍然是与稳定性相关的东西。

### (2) 内在性方面

由于人格总是个体内部因素的一种特殊综合，因而直接的观察或是外部的研究只有间接的意义。品质测定(Traits Test)所显示的总是

一种相对性的估测而已，人格内在的整合性未必能从中反映出来。由此也可见出人格结构事实上的复杂性。

#### (3) 一致性方面

人之所以能够在不同的场合里，其行为或反应有内在的连贯性，这与人格的相当稳定性直接联系在一起。主体的行为或反应方式取决于人格的动力组织，而这种组织使新的行为反应和旧的行为反应时时对应。心理学家注意到，一个喜爱莫扎特音乐的人，虽然不曾听过莫扎特的某一段作品，但仍然可以正确辨别出这一段正是莫扎特所作。所以说，“人格是一个内在力量的持久组织，人格的持久力量帮助一个人决定各种情境下的反应，因而形成行为的一致性（不管是口头的或外显的行为）”。④

#### (4) 个体差异方面

人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对情境事件作出反应，从而形成互相之间的人格差异。这种差异既与遗传有关，更与相应的社会化有关。正是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个体时常可以在别人身上找寻到参照意义。人格的差异方面可以说是人格研究的焦点。

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推测艺术接受与自性或人格的变动关系。首先，人格的稳定性方面暗示了一种变化的可能，尽管这一可能是困难重重的；其次，人格的内在性方面要求变化的动力是来自心灵深处的东西，否则影响力只会是浮光掠影，过后一切如故；其三，人格的一致性方面预示了这样一种可能：如果某些心理势态真正被内化，那么它就会在既定的方向延伸出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加强；最后，人格的个体差异方面反映了人总是有意或无意地以别人为参照，艺术所显示的参照性世界尽管不宜也不可能替代现实世界的参照，但是艺术所提供的参照也是一种独特的参照，是主体可能必须投入的独特世界。因而，无论在人格的哪一方面，艺术都可能有其相应的作用位置。

在大量的文献中，这样的接受反应关系是可以屡屡证同的。譬如法国学者乔治·普莱曾经这样详尽地描述过文学阅读：“当我看到展现在我面前的那件物体涌现出大量我能领会的意义时……由于另一个人的思想奇特地闯入我的脑子，我成为这样一个自我，被允许用异己的思想来进行思想，我成为那些不是我自己的思想的主体。我的

意识似乎是以另一个人的意识的方式那样活动”。⑤在这里，普莱的观感或描述尽管尚未很具体地指明自性究竟改变了什么和它是如何改变的，但是他至少从阅读感受出发揭示了来自作品的意识转换了接受者现实自性的事实。对此，W·伊塞尔也试图这样证明：“假如阅读能够消除组成一切知觉的主观和客观的界限，那么随之而来的是，读者会被作者的思想所‘占有’，而这反过来又会造成新的‘界限’的形成……我们所阅读的每一文本会在我们的人格中形成不同的界限，这样，实际的背景（真正的‘我’）会依据文本本身的主题而呈现不同的形式。”⑥与普莱的观点相比，伊塞尔不但承认了文学接受可以使人格走出通常持有的那种我的意识同对象之间的互不相容状态，而且并不在两种“我”之间夹入异己或相互对立的性质。但是文学阅读对于人格的塑造效应（formative effect），并不是现象学所能辩解清楚的，塑造效应更是心理学的份内事。也许，无论是普莱的那种感受式的描述还是伊塞尔的现象学论证，它们都表明了这样的内涵：接受过程不仅使接受者的自性或人格产生了自然而然的挪移，而且这种挪移确实是以一种不同一般的自性改变的形式实现的。如果说，自性或人格的改变是以行为方式的改变为主要标志，那么主体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上首先要经历智性而后是态度的转换过程。⑦比较起来，自性或人格在艺术活动中变为一种整体的动态呈现，时间似乎大为缩短。这其中的心理学依据也许就是：（1）在艺术接受的环境条件之内，心理刺激的强度与人格的塑造效应可能形成一种正比例关系，换言之，心理刺激的强度越大，自性再塑造的可能也就越大。因为，存在一种基本的心理学事实：主体由于刺激愈是变得兴奋，其心理内容也就愈易变动。这在古代艺术和现代艺术的接受效果的比较上就显得很突出；⑧（2）对于艺术接受来说，其中情绪、情感的作用是显要的。可以说，接受的参与也即情感的参与，当主体的情感幅度趋大时，心理的深刻化的可能也趋于大。这同样是自性在艺术中的提升和变化的一种契机。

尽管艺术接受不一定能使自性的挪移和变化势态成为持续的行为方式的一个有机部分，但是至少它在进入自性内部并且使之异样地活跃起来这方面构成了一种最有力的手段。正是在这意义上，艺术接受和自性的关系成为心理诗学的一个

有特别意义的命题。

## 二

一般的精神分析理论大致同意这样的观点：艺术总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宣泄的体验。这种体验的特殊性在于它可以使接受者既掩饰了那些源自本我、自我和超我的种种幻想又从中得到愿望的满足。弗洛伊德就这样解释道：“由于诗人的解释暴露了俄狄甫斯王的罪恶，他就促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内在的那种同样的冲动就是被压抑也依然固在的自性”。<sup>⑥</sup>尽管艺术无力使人充分地意识到自性中受压抑的冲动，但是都可以神秘而无意识地解放这种冲动。在《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中，弗洛伊德还指出，我们阅读文学作品，目的就在于消除我们内心的紧张状态。总之，艺术总是会改变我们内心某些深层的东西。然而，N·霍兰却越出了这种立场。虽然，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其他大多数学者一样，霍兰也把艺术接受的最大益处归结为一种幼稚的幻想的满足，但是在此基础上，他又认为，一部艺术作品从不强迫地改变接受者的自性，它所提供的是接受者可以顺应自体主题（Identity Theme）材料。由于自体主题是由一些特殊的心理防御和幻想所组成，因而每一个读者都可以通过认同使作品变得适合于自身的独特愿望和心理防御。在这一意义上，阅读所意味的只是重现或复制自性，换一句话说，自体本身在阅读中并无任何改变。但是，霍兰在此显然是歪曲了认同的本义，以为一切认同都几乎是投射性的，读者不内摄或内化在文本中所会遇到的一切疏异性特征。心理学的研究却恰恰说明并不是一切投射都始终是投射性的，它同样包含着内摄的时机，因为投射还经常以一种变换了的形式自外而内地反射回来，而这种变换了的形式常常是更易为人所接受的形式。西方有学者还这样加以辩证：霍兰所强调的显然是文学阅读中人的幻想或愿望的满足（fulfillment），然而这种满足由于其虚拟的意味或心理幻觉性，基本上有别于一般情境中的幻想或愿望的满足。因此，文学接受中的幻想或愿望与其说是趋向于满足和实现，还不如说走向一种成形、规约或强化，换言之，文学接受不可能不是对接受者内在的自性的一种导向和塑造。至于由于自恋倾向而产生的对于文本的认同，它也不是接受的唯我（solipsistic）倾向的充足根据。因为，人的自恋倾向总是包含着志向和抱负等，总是强化着自

性的感受，希图自性获得一种更为有力的形式。如果文学阅读真如霍兰所称千篇一律地复制自体，重复旧材料，岂不是太乏味了吗？而且形形色色的作品是否都能恰如其分地提供复制和重复自性的自体主题，也实在令人生疑。显然，在否认接受对于自性的影响和作用这一点上，霍兰并无太多令人信服的论据。

不过，困难并不在于确认接受对于自性或人格的塑造效应，而在于如何阐释其中的过程或程序。

事实上，在精神分析理论里，自性概念本身也可见出变易的可能性。因为，自性作为有序总体，其各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并不是以一种孤立或纯净的状态存在，而是彼此影响、牵制，实际上容纳着内化对象（如一个人在过去的任何有意味的交往经验的积淀物）。在人的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不广泛地有时甚至无选择地仿习环境中的有意义的对象，否则人格的建立和发展是无法想象的。当人在艺术接受中再次进行内摄或原内摄的转换时，他其实就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和发展着自性。因此，内摄总是指明自性改变的重要迹象。一方面它是以其内化程度所决定的能量成为占据人的内在世界的重现力量；另一方面它又成为改变自性的内部因素（一种构建能量）。

具体而言，内摄还意味着感知和行为之间的认知性格局。正如精神分析专家所认定的那样，艺术的接受也可能首先通过认知的途径改变这种格局从而影响接受者的自性。以文学为例，它与其它类型的话语（discourse）一样也能通过对现实的再现扩展读者对外在世界的认知，使其迈入先前未知的领域，从而触动其内在世界。在这里，文学显然优于其它话语的地方在于它可以显示对象新颖、具体而生动的意象轮廓，凸现被忽略或者被压抑的事物的重要而鲜明的特征。

当然，内摄的变化不只是和认知有关。事实表明，如果一种阅读使接受者把握了一种从未意识到或者只能朦朦胧胧地感受到的情绪或情感，那么阅读就有可能有助于他更清醒地了解自己的情感世界，使他更为有效地在复杂而又变幻的现实中去追寻和应验这种情绪或情感。正是在这里，艺术的感召、诱发和升华力有了落实之处。不过，接受活动对人的情感内摄的意义还不止于此，由于艺术中的情绪、情感往往具有不断变动和转化可能性的特点，艺术在情感的多样和丰富

上远远超过了个体摄入的相对狭窄的情感图谱。在某种意义上,艺术中的情感的涵义愈是复杂,接受者内在世界中情感的界限(如爱与恨的界限),被改变的可能性也愈大。因此,艺术追求重重交织、“欲说还休”式的矛盾情感,追求意味深长的、百感交集的体验。

至此,我们又自然地回到了心理学所设定的人格改变的一般步骤:首先是不断加深的客观化所对应的认知的改变,接着是不断丰富的主观化(情绪、情感的内摄)所对应的态度的转换与提高。这不开始意味着行为方式(从而也是人格本身)的真正改变的可能性了吗?

站在精神分析理论的立场上看,既然艺术接受可以通过内摄改变人的认知和情感的图谱,那么它也同时影响了人应对情境问题的策略(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策略),而这种策略事实上恰恰就是自我(ego)的有序组织,因为自我在本我和超我之间时时起着调节和过渡的作用,它是自性处理自身与现实关系的第一步骤。举例来说,在阅读、阐释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接受者之所以能够提高顺应各种不同的、常常又可能是对峙的认知和情感因素并且把它们作为一种统一而连贯的事件的能力,不能不与伊塞尔所说的文学阅读的基本心理环节——预想和反省(anticipation and retrospection)有关。在伊塞尔看来,预想和反省意味着对未来的展望和对过去的回忆。这使得它们“与我们积累生活经验的方式极相类似”,<sup>⑩</sup>就是说,预想和反省可以组成自我(ego)的基本性质,其结果必然是自我(ego)对整个自性的外在现实作出新的应对,而且对似乎不那么重要但最后显得越来越重要的内在现实也作出调整反应。在这一点上,艺术接受即便不可能即时地改变自性,也一定是影响着它。

### 三

毫无疑问,艺术接受促成自性的内在方面经历了种种有力的冲击,而这种冲击无论在认识还是情感上都只是引起自性在程度上的某些变化。但是,自性程度上的变化在长期的影响中又不可能不形成自性结构上的某些变化,而一旦结构有所变化与发展,艺术接受就在自性的最根本的意义上呈现了自身的力量。然而,问题依然存在,因为在我们还不可能确切地解剖自性结构的同时,其结构变化是难以谈论的。

因而,还得暂时认可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

说,并且去寻求可以类比的启示。对此,对象关系理论(object-relation theory)的晚近研究表明,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文学接受与精神分析过程之间具有相似性。M·A·斯库拉明确地说:“一切文学文本发挥和引起对意识作用的关注的复杂方式与(心理)分析对[幻想和梦]的处理方式具有并行性”。<sup>⑪</sup>如果说精神分析可能调动自性内化了的、并且由此改变其结果,那么文学接受也有同样意义。

在精神分析中,精神分析对象(即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在诱导中讲述自己或与己有关的他人所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事件;精神分析家对此进行阐释,并且在阐释的过程中复述对象所讲述的内容,但是复述的用意尤在于渐渐地、令人不自觉地影响对象的叙述内容和叙述方式。因此,复述实际上已是确立和发展一种新的叙述可能性的过程,复述和阐释的并用也就有可能把对象有意识地叙述的那个充满困惑与不确定性的自性矫正或转换为一种在结构上连贯一致的自性。这里的关键——正如精神分析专家所强调过的那样——是自性结构上的变化不能不以调动沉积于无意识的愿望、幻想的能量为起点。因为,正是这些能量在冥冥中无形地规定,操纵着主体的特有反应或行为方式。但是,尤应注意的是,被调动起来的愿望和幻想等既不能以强制的方式使之转移或消失,也不能引向童稚式的满足(即倒退,Regression)。因为,前者又有可能酿成新生的压抑,而后者导向的也可能是变态的心理操作。

与之相应,艺术接受确实也有可能经历精神分析的大致过程,尽管这种过程不是艺术接受所能展示的全部过程。诚如萨特所言,在阅读时,“如果我的要求得到满足,我继续往下读,这引起我对作者提出更多的要求,那就是说要求作者对我提出更高的要求。反过来也如此”,所以“一方面文学客体除了读者的主观化以外没有其它实质”,另一方面,“每一个词都是一条超验之道;它使我们的感情成形,为感情命名,并把感情归属于一个想象的人……使感情成为客体,使其各组成部分具有适当的比例,并给感情以希望……”<sup>⑫</sup>这几乎容纳了精神分析的一般程序,最后所说的“给感情以希望”,恰恰是精神分析理论所认定的艺术对自性深层因素的一种最好的改变方式。确实,关于艺术接受对自性深层因素的调整、重组和推动的探究已经触及了自性在结构上

的变化。

如果前面谈及的内摄是一种从外至里的心理活动方向，那么投射则主要是由里及外，也同样可能调动和转换自性的深层因素。比如，童年愿望或幻想的改变就与投射有关。心理学表明，一方面，人的童年愿望或幻想的形成与其童年时和有影响的人的生活经历有关，他所体验了的情感及其行为方式为了对应于特定的人物往往产生不自觉的移位，而正是在这一移位的无意识过程里产生了一种在不同的情境中体验和态度等的重复或回避的倾向；另一方面，这种重复或回避倾向又常常会遇阻力或障碍，久而久之，也就使同化和顺应造成不平衡。对此，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如果在主体可能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egocentric perspective）对待世界（即强迫外在世界与自己的预想相一致）的时候把他由于内摄而无意识地积存的愿望和幻想引向投射，那末主体自性的深层因素就有可能获得一种转换。在艺术接受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理出这样两种过程：主体将艺术对象改造成一致于他的愿望和幻想的对象；在无意识的状态中开始把自性的某些深层因素顺畅地投射到艺术对象中。在现实中，这种投射或许较为困难，因为人在现实中暂时悬搁或丢开自性的机会并不完整，即使是梦有时也不能例外。然而，在艺术接受中，由于认同具有更大的可能和深度，艺术可能创造一种使自性几乎不再坚执于自身的特殊体验，最充分的投射也就会成为事实。

然而，艺术怎么象一位老练的精神分析专家那样，既不被动地介入对象的童年愿望或幻想，又恰到好处地指示投射对象和真实事件的差别呢？显然，大部分的艺术（也许戏剧活动可以是一个例外）都不可能随时对接受者的某些投射因素作出明快的反应，但是，真正的艺术又毕竟是一种普遍而具体的意义系统，它阻断或引导接受者的某些投射活动具有更深入和更有效的方式。在艺术接受中，接受者如果是处于全神贯注或心旌摇曳的状态中，他就不可能只是同化，同时还不由自主地顺应艺术的特征内容。伊塞尔以文学阅读为例阐释了这一情状：“文学文本的效验产生于对熟识之物的公然激发与否认。……文学文本使读者形成幻觉而又以自然形成的方式使特定幻觉显得没有意义……一旦读者投入文本，他自身的诸种预想就接连地被超越，因此，特定文本成了

他的‘现在’，而他自己的观念却向‘过去’深入”。<sup>①</sup>文学阅读好时，比有即时反馈可能的戏剧活动更有可能使接受者明瞭作品的客观意蕴和受投射性幻想影响的意蕴之间的差别。布莱希特倡导的“间离效果”无疑是最突出的的手段。在其它艺术中，“间离”也是渗透着的，变形、夸张、淡化或时空主观化等即是当然的角色。因而，艺术的客观化内容已不只是与接受者认知的机敏有关，而且在情绪意义上与应对那些来自自性深层的各种投射挑战的灵活性有关。如果艺术的情感内容大于接受者的，那末接受者正视艺术与自身投射倾向的冲突也有了一种自甘情愿的态度，而且即使是面对他人评价与自己无关的投射方式，接受者也会参照着自己关心投射的价值，从而有意识地改变无意识地拥有的态度和体验，也就是通过改变内摄完形重新塑造自性。

在这里还应提到，虽然艺术接受不可能象精神分析那样具有直接性（分析者和分析对象直接对话）和个人性（不会走向个人所不愿的公开局面），但是由于不是和真实的人打交道，接受者有可能更加自在地改变某种精神分析也未必能顺利解决的自性问题。正如精神分析学者S·M·海姆所承认的那样，当个人在面对艺术而不是面对自己深度心理的错觉时，他可能“无痛苦地放弃防御姿态，展开能够修正自性然而又被压抑了的东西”。<sup>②</sup>这种情形在接受者从作者那里获得了信赖感之后更是如此。他在认同被作者所赞许的特征时，其显示自身与外在世界关系的不适当情感也随之减少或消失了，与自己相疏异的自性因素就溶入自己的自性，或者在两种自性差异过大的情况下借助可以亲近的角色形成摄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艺术接受对于自性的改变不但有可能并行于精神分析，而且还有可能超越或大于精神分析。

不过，就如所有精神分析工作都未必能以富有成效或积极的形式有助于每一个自性的变化和发展一样，艺术接受也是如此。而且艺术接受促成的深层因素的变化如何连接为长期有效的影响，也还是一个充满了未知的过程。

① 本文所用的“自性”相同于“自我”（self）或



- 人格，以别于弗洛伊德的“自我”(ego)概念。
- ② 见S. E. Hampson "The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ity: An Introduction" P. 52, Routledge & Keganpaul, 1982.
- ③ 见I. L. Child "Personality in Culture", E.F.Borgatta et al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Chicago, 1968.
- ④ 维特·巴诺《心理人类学》第9页，黎明文化专业公司，1979年。
- ⑤ George Powlet, Criticism and the Experience of Interior,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 ⑥ Wolfgang Iser, The Reading Process: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New Literary History 3 (1972), P. 298—299.
- ⑦ 传统理论认为净化是艺术改变人的行为方式的开端。
- ⑧ 这里不包括由于应激和心境等引起的非审美性的兴奋反应。
- ⑨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 Freud, Vol. 4.P.263, the standard edition.
- ⑩⑬见W. Iser: The Reading Process: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 ⑪ Meredith Anne Skura: The Literary Use of the Psychoanalytic Process, P. 11—12, New Haven, 1981.
- ⑫ Jean-Paul Sartre: Why Write. H. Adams (ed.):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 ⑭ 见Sharon M. Hymer: Therapeutic Nature of Art in Self-reparation, Psychoanalytic Review 70 (1983)。

作者单位：杭州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陶原珂



## 新剑桥学派的利润决定理论及评价

张凤林

新剑桥学派是在从战后50年代起罗宾逊等人就如何将凯恩斯经济学长期化和动态化而同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派展开理论论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们沿着凯恩斯—哈罗德—卡莱斯基的思想线索构筑起来的现代增长理论的基本特征在于，将分配与增长结合起来，集中考察经济增长过程中利润的决定与变动规律。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对新剑桥利润决定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作一系统的介绍和分析评价。

### 一、罗宾逊的利润决定理论

最先论述新剑桥利润理论的是罗宾逊，她于50年代中期系统地提出了一种新的利润理论。这一理论的显著特点是，借助于卡莱斯基的理论模式将古典的剩余原理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结合起来。

卡莱斯基曾借鉴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提出一种净收入决定与收入分配于一炉的理论，其要点是，国民收入中的利润份额决定于资本家总支出，当总供求平衡时，资本家支出通过部门间比例制约性，成为决定利润与工资分配的基本因素。

据此并结合凯恩斯的投资—储蓄分析原理，罗宾逊用一个两部门模型来说明利润决定问题。<sup>①</sup>假设存在一个封闭经济，其生产划分为消费品与资本品两大部门，国民收入分为工资与利润两部分，工资无储蓄。令C和I分别代表各部门总产品， $P_c$ 和 $P_m$ 代表各自总利润， $P_c^c$ 和 $P_m^c$ 代表用于消费的利润， $P_c^s$ 和 $P_m^s$ 代表储蓄的利润， $W_c$ 和 $W_m$ 代表各部门总工资，于是有：

$$C = W_c + P_c^c + P_c^s, \quad I = W_m + P_m^c + P_m^s$$

其中 $P_c^s$ 代表消费部门资本家的储蓄，它要用于投资；而 $W_m$ 和 $P_m^c$ 代表资本品部门工人与资本家消费基金，它们要用于消费。因此有 $P_c^s = W_m + P_m^c$ ，进而有 $I = P_c^s + P_m^c$ ，或 $I = P^s$ ，其所隐含的因果关系为 $I \rightarrow P^s$ 。若令利润储蓄倾向为 $s_p$ ，则有： $s_p = P^s/P$ ，从而有 $I/s_p \rightarrow P$ ，写成等式则为：

$$P = I/s_p \quad (1)$$

这便是新剑桥利润量决定的基本公式。在这一属于短期理论的公式中，引入资本变量即

可推导出长期的利润率决定公式。具体来说，设资本量为 $K$ ，用 $K$ 去除(1)式两端，便得到 $P/K = (I/K)/s_p$ ，其中 $I/K$ 为投资增长率，在稳定均衡的增长状态下它恒等于经济增长率 $G_n$ ，故而若令 $r$ 代表利润率，则其最终公式可写成：

$$r = G_n/s_p \quad (2)$$

这是新剑桥利润率决定的基本公式，也是新剑桥分配理论的最基本命题，它表明投资增长率和利润储蓄倾向乃是决定利润率的基本变量。

在经济内生变量（主要是投资和投资增长率）分析的基础上，罗宾逊接着考察了某些外生变量（主要是制度因素）如何与投资变量相交织而对利润与工资相对份额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她指出，在现实中，厂商的定价政策（即垄断程度）和工会力量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说，罗宾逊是分别从技术经济与社会经济两个方面，将有效需求、部门再生产的比例性以及不完全竞争等因素综合起来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她的利润理论既从整个经济运行的角度阐释了分配的生产基础，又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所体现的利益冲突，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有机统一。②

## 二、卡尔多的宏观分配模型

凯恩斯认为，如果企业家将利润的一部分用于消费支出，那么消费品的销售利润将增加一个相同的量，因此，利润作为企业家资本增量的源泉，这时就像一个“寡妇的罐子”，永远也用不完；相反，若企业家减少消费，增加储蓄，那么这个罐子将变成一只“达奈德的瓶子”，它永远也装不满。③ 这个论述的实质是强调资本家支出对于利润创造的决定作用。

依据凯恩斯这一思想，卡尔多建立起他的宏观分配模型。④ 设经济处于充分就业，总收入分为工薪与利润两部分，故有 $Y = W + P$ 。再令 $s_w$ 和 $s_p$ 分别代表两种收入的储蓄倾向（设 $s_p > s_w$ ）， $S_w$ 和 $S_p$ 为各自总储蓄， $I$ 为自主投资量。便有：

$$I = S = S_p + S_w = s_p \cdot P + s_w \cdot W \quad (1)$$

用 $Y-P$ 代替 $W$ ，有：

$$I = s_p \cdot P + s_w(Y - P) = (s_p - s_w) \cdot P + s_w \cdot Y$$

两端同被 $Y$ 除，得：

$$\frac{P}{Y} = \frac{1}{s_p - s_w} \cdot \frac{I}{Y} - \frac{s_w}{s_p - s_w} \quad (2)$$

(2)式表明，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由投资和两大收入的储蓄倾向决定，而当储蓄倾向给定时，利润便唯一地成为投资的函数。这时有两种情况：第一， $s_w > 0$ ，则 $P/Y$ 按照 $1/(s_p - s_w)$ 的倍数与 $I/Y$ 按同方向变化；第二， $s_w = 0$ ，这时有：

$$P/Y = (I/Y)/s_p \quad (3)$$

由上式又可十分容易地推演出利润率决定公式，用 $G_n \cdot (K/Y)$ 代替 $I/Y$ ，代入(2)式便得：

$$r = \frac{P}{K} = \frac{G_n}{s_p - s_w} - \frac{s_w}{s_p - s_w} \cdot \frac{Y}{K} \quad (4)$$

当假设  $s_w = 0$  时，上式变成：

$$r = G_n / s_p \quad (5)$$

显然，卡尔多通过不同的途径得出了与罗宾逊的完全一致的利润决定模型，不同的是，卡尔多不是根据部门比例性，而是诉诸于“卡尔多效应”。其具体含义是：工人消费是工资的增函数，而资本家支出则不依赖于利润。这样，当  $s_w < s_p$  时，任何工资提高和利润下降都将导致总需求从而价格上升，反之则刚好相反。因此，通过总供求关系和价格运动便总能够使实际利润或工资份额趋向于由投资所决定的分配格局。

不仅如此，卡尔多还分析了投资决定利润和收入分配的限制条件。他指出，投资决定利润的机制只有在劳动生产力高到使产品能够提供充足的剩余以用于积累的条件下才生效。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生产力较低，产品剩余不能满足积累需要，经济面临资金约束，故那时的分配机制是最低生存费用。古典理论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到了现代阶段，由于劳动生产力提高导致剩余大幅度增加，经济主要面临资源约束，故投资决定利润的机制起支配作用。凯恩斯的理论阐明了这种情况。因此，古典的与凯恩斯的分配论虽然分析的起点不同，但从历史的角度却可以相互补充而统一起来。

### 三、帕西内蒂定理及新剑桥模型的一般化发展

60年代以后，新剑桥利润理论又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这集中地表现在一些经济学家试图通过改善关于储蓄的假定条件来使利润率公式  $r = G_n / s_p$  一般化上。由前面所述可知，剑桥公式隐含着一个重要假定，这就是  $s_w = 0$ ，即工人无储蓄，这一假定显然不尽合理。那么，如果放弃这一假定，剑桥公式还会有效吗？这显然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帕西内蒂在1962年通过对卡尔多的扩充，首先对此提供了肯定的答案，从而将新剑桥利润理论一般化了。<sup>⑤</sup>

帕西内蒂指出，工人也有储蓄，这种储蓄将导致他们的金融资本积累并且会带来利息收入（在均衡时它等于利润）。因此，工人的收入包括工资与利息两部分。分配模型应当反映这种情况，为此先需要确立两个新的假定条件：（1） $s_w < I/Y$ ；（2） $s_p > I/Y$ 。前者保证了利润非负，后者则保证了工资大于零，两个条件合起来便构成所谓“帕西内蒂不等式”：

$$s_w < \frac{I}{Y} < s_p \quad (1)$$

根据上述假定，令  $P_P$  和  $P_W$  分别代表资本家与工人各自的利润，便有：

$$P \equiv P_P + P_W, \quad S_P = s_p \cdot P_P, \quad S_W = s_w \cdot (W + P_W)$$

从而有：

$$I = s_w(W + P_W) + s_p \cdot P_P = s_w Y + (s_p - s_w) P_P \quad (2)$$

再将  $P_P$  代入前面卡尔多的（2）式和（4）式，便得到：

$$\frac{P_P}{Y} = \frac{1}{s_p - s_w} \cdot \frac{I}{Y} - \frac{s_w}{s_p - s_w} \quad \text{和} \quad \frac{P_P}{K} = \frac{1}{s_p - s_w} \cdot \frac{I}{K} - \frac{s_w}{s_p - s_w} \cdot \frac{Y}{K} \quad (3)(4)$$

它们分别表示资本家的利润占总收入的份额及与总资本的比例。

若令  $K_w$  代表归工人所有的资本， $i$  为一般利率（一般利润率），则有：

$$\frac{P_w}{Y} = \frac{i \cdot K_w}{Y} \quad \text{和} \quad \frac{P_w}{K} = \frac{i \cdot K_w}{K} \quad (5)$$

它们分别表示工人所有的利润与总收入和总资本的比例。在均衡增长条件下，工人拥有的资本在总资本中的份额是不变的，因此有：

$$\frac{K_w}{K} = \frac{S_w}{S} = \frac{s_w(Y - P_P)}{I} = \frac{s_w \cdot s_p}{s_p - s_w} \cdot \frac{Y}{I} - \frac{s_w}{s_p - s_w} \quad (6)$$

又因为

$$\frac{P}{Y} = \frac{P_P}{Y} + \frac{P_w}{Y} \quad \text{和} \quad \frac{P}{K} = \frac{P_P}{K} + \frac{P_w}{K}$$

所以有：

$$\frac{P}{K} = \frac{1}{s_p - s_w} \cdot \frac{I}{K} - \frac{s_w}{s_p - s_w} \cdot \frac{Y}{K} + \frac{P}{K} \left( \frac{s_w \cdot s_p}{s_p - s_w} \cdot \frac{Y}{I} - \frac{s_w}{s_p - s_w} \right) \quad (7)$$

和

$$\frac{P}{Y} = \frac{1}{s_p - s_w} \cdot \frac{I}{Y} - \frac{s_w}{s_p - s_w} + \frac{P}{Y} \left( \frac{s_w \cdot s_p}{s_p - s_w} \cdot \frac{Y}{I} - \frac{s_w}{s_p - s_w} \right) \quad (8)$$

化简（7）式，有：

$$\frac{P}{K} \cdot \left( 1 - \frac{s_w \cdot s_p}{s_p - s_w} \cdot \frac{Y}{I} + \frac{s_w}{s_p - s_w} \right) = \frac{1}{s_p - s_w} \cdot \frac{I}{K} - \frac{s_w}{s_p - s_w} \cdot \frac{Y}{K}$$

或

$$\frac{P}{K} \cdot \frac{s_p(I - s_w \cdot Y)}{I} = \frac{I - s_w \cdot Y}{K}$$

根据帕西内蒂不等式， $I - s_w Y \neq 0$ ，所以有：

$$\frac{P}{K} = \frac{I}{K} \cdot \frac{1}{s_p} = \frac{G_n}{s_p} \quad (9)$$

同理，化简（8）式可得：

$$\frac{P}{Y} = \frac{I}{Y} \cdot \frac{1}{s_p} \quad (10)$$

据此，帕西内蒂断言，新剑桥利润理论的一般性并不因工人储蓄因素而受到影响。原因在于工人储蓄并未改变社会的总储蓄量。

经过上述方法论论证的新剑桥利润公式通常被称为“帕西内蒂定理”。它不久就引起了争论，焦点集中在帕西内蒂不等式是否具有一般性的问题上。新古典综合的萨缪尔森



等人认为,这一不等式并非具有一般性,它仅仅是各种可能情况中的一种。一旦实际情况超出了它的范围,帕西内蒂定理将不再有效,取而代之的将是所谓“反帕西内蒂定理”。<sup>⑥</sup>对于这种质疑,卡尔多等新剑桥学者进行了反驳。

卡尔多指出,关键在于弄清楚 $s_p$ 和 $s_w$ 的内涵。实际上,在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社会,总利润分解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归企业家支配的留成利润,其二是归食利者所有的利息收入, $s_p$ 应当是指企业利润留成的比例,至于资本家利息收入的储蓄倾向则与一般工薪收入没什么差别。另一方面, $s_w$ 作为一般个人收入(工薪及利息)的储蓄倾向,其计算应当严格地限于直接被用于企业投资的储蓄量。经过这样的界定, $s_w$ 必然相当地低,因而帕西内蒂不等式完全可以成立。

在此基础上,卡尔多进而提出一个“新帕西内蒂定理”,<sup>⑦</sup>其实质是通过金融市场的供求均衡来推导剑桥利润决定公式。具体作法是,设 $s_p$ 为公司利润留成比例, $s_w$ 为工薪及利息收入的储蓄倾向, $G$ 为资本所得, $i$ 为企业外部融资占总投资的比例。则全社会工薪净储蓄为 $s_w \cdot W$ ,因消费超支造成的个人负储蓄为 $c \cdot G$ ( $c = 1 - s_w$ ),企业外部融资产生的负储蓄为 $i \cdot g \cdot K$ 。净储蓄代表对证券的需求,净负储蓄代表对证券的供给,于是在金融市场均衡条件下便有:

$$s_w \cdot W = c \cdot G + i \cdot g \cdot K \quad (1)$$

式中的 $G$ 代表股票市场价格的变化,它受到股票价格 $P_T$ 、股票数量 $N$ 、估价率 $V$ 等因素的影响,一般有 $G = N \cdot \Delta P_T = V \cdot \Delta K - P_T \cdot \Delta N$ 。又因为 $\Delta K = g \cdot K$ ( $g$ 为增长率), $P_T \cdot \Delta N = i \cdot g \cdot K$ ,所以 $G = V \cdot g \cdot K - i \cdot g \cdot K$ 。将其代入(1)式,得:

$$s_w \cdot W - c(V \cdot g \cdot K - i \cdot g \cdot K) = i \cdot g \cdot K \quad (2)$$

若引进利润留成因素,则有下列投资—储蓄方程:

$$s_w \cdot W - c(V \cdot g \cdot K - i \cdot g \cdot K) + s_p \cdot P = g \cdot K \quad (3)$$

根据 $W = Y - P$ 和 $P = r \cdot K$ , (2)、(3)式可写成

$$s_w Y - s_w \cdot r \cdot K - c \cdot V \cdot g \cdot K + c \cdot i \cdot g \cdot K = i \cdot g \cdot K$$

和

$$s_w Y + (s_p - s_w) r \cdot K - c \cdot V \cdot g \cdot K + c \cdot i \cdot g \cdot K = g \cdot K$$

整理得:

$$\frac{s_w}{g} \cdot \frac{Y}{K} - \frac{s_w \cdot r}{g} - c \cdot V + c \cdot i = i$$

$$\frac{s_w}{g} \cdot \frac{Y}{K} + \left( \frac{s_p - s_w}{g} \right) \cdot r - c \cdot V + c \cdot i = 1$$

最终解得:

$$V = \frac{1}{c} \cdot \left[ \frac{s_w}{g} \cdot \frac{Y}{K} - \frac{s_w}{s_p} (1 - i) - i(1 - c) \right] \quad (4)$$

和

$$r = \frac{g(1-i)}{s_p} \quad (5)$$

上面(5)式表明, 利润率 $r$ 仅仅依赖于 $g$ 、 $s_p$ 、 $i$ 三个变量, 而与 $s_w$ 不发生关系。当 $i \rightarrow 0$ 时, 即外部融资为零时,  $r = g/s_p$ , 这又回到了帕西内蒂定理。由此, 卡尔多便通过不同方式(证券市场供求平衡)维护了帕西内蒂定理的一般性。

沿着卡尔多的思路, 克列格尔在70年代初力图使剑桥模型更加一般化。<sup>⑩</sup>他强调指出, 新剑桥利润模型的真谛乃在于投资是决定利润的关键变量, 而并不依赖于两类储蓄倾向的假定。为此, 他以所谓“财产所有民主化”的社会作为分析前提。其简要内容是: 设 $W$ 为工资,  $D$ 为红利,  $P$ 为利润,  $s$ 为社会成员一般储蓄倾向,  $\lambda$ 为公司利润留成, 则可建立下列投资—储蓄方程:

$$I = s \cdot W + s(1-\lambda) \cdot P + \lambda P \quad (1)$$

用资本量 $K$ 去除上式两端, 并经过整理, 可得到利润率决定公式:

$$r = \frac{g - s(W/K)}{s(1-\lambda) + \lambda} \quad (2)$$

上式中的分子实际上是由利润融资的投资占总资本的比例, 分母则为利润的总储蓄倾向, 所以二者之比恒等于利润率。该式表明, 一旦公司利润留成和公众支出决策给定, 投资便成为决定利润率的唯一变量。这个结论与帕西内蒂定理本质上完全一样, 却并未使用关于两类收入或两大阶级具有不同储蓄倾向的假定。因此, 所谓反帕西内蒂定理并不能否定剑桥模型的普遍有效性。

近几年来, 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在坚持两类储蓄倾向假定的前提下来试图证明帕西内蒂定理的一般性,<sup>⑪</sup>其具体方法是运用巴兰志尼(Baranzini)在1975年提出的关于利润率的二次方程, 将帕西内蒂定理与反帕西内蒂定理作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意义上, 帕西内蒂定理都具有一般性, 而反帕西内蒂定理则至多也不过是帕西内蒂定理的一个特例而已。

综合所述可见, 剑桥公式作为一种利润决定模型, 其一般性在逻辑上是毋庸置疑的。

#### 四、关于新剑桥利润理论的评价

作为“后凯恩斯经济学”一个重要分支的新剑桥学派, 其利润决定理论是在“反边际主义革命”的理论论战中作为新古典分配理论的对立物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 与后者相比, 它具有一系列的显著特点:

第一, 在方法论上, 这一理论摆脱了自“边际革命”以来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所盛行的盲目追求理论完美性与精巧性的简单化倾向, 更加注重理论的现实性品格。它把经济分析的重心从短期静态条件下的资源配置转向长期动态条件下的发展与增长, 从完全竞争条件下原子式的理性经济人转向垄断条件下的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 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这种方法论的转变与更新显然更加适合于现今西方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 由此所形成的分配理论自然也就比较实际地反映了现今西方国家决定利润和收入分配的机制。

第二，从理论基础方面看，这一理论抛弃了边际主义思想体系，而将古典学派的剩余原理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相结合，作为其立论的基础。由此使得它一方面将利润植根于产品减工资后的剩余，并从生产的物质基础特别是部门比例性方面考察其量的决定；另一方面又将利润的决定与有效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联系起来，从而把收入分配与收入决定联系起来。这样便改变了新古典综合派那种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板块式”结合，在新的分配理论基础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有机统一。

第三，这一理论实际上是把分配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来分析，不仅考察投资等内生经济变量对于利润的决定作用，而且也致力于探讨各种外生的非经济变量诸如垄断程度等等社会的、制度的因素对于利润和收入分配的制约与影响，不回避并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这与热衷于描述均衡和谐和最优化的新古典分配论形成了鲜明对照。

第四，从收入分配在整个经济理论体系中所占地位来看，新剑桥利润理论始终坚持把利润决定与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具体来说，他们一方面注重从生产与实现、微观与宏观、技术经济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等方面来综合考察决定利润及收入分配的机制；另一方面又注意研究收入分配在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中所具有的职能，即分配变动对于生产、实现、增长及至阶级关系等方面所产生的效应，例如，将剑桥公式 $r = G/S_P$ 变形为 $g = r \cdot S_P$ ，便可以立即显示利润率从而收入分配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和调节作用。而新剑桥学派也正是藉此将分配与增长溶为一体的。这表明，新剑桥学派是将分配问题置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大系统中来加以认识和考察的，从而根本改变了由于新古典学派长期以来将分配问题严格地禁锢于交换一般均衡体系，而使得分配理论在实际上被取消了的局面。

新剑桥的利润理论对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他们在古典传统被人们淡忘了一个多世纪以后重又复兴了古典学派的分配思想，并赋之以现代的气息，据此建立起一种比新古典的分配理论更具有现实性的分配理论，这就填补了现代宏观动态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空白，从而推动和促进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代的进一步发展。其次，这一利润理论就其逻辑论证过程和最终结论而言，批判并否定了若干传统的庸俗分配理论。例如，它的利润决定公式表明，投资量及其增长率是决定利润量及利润率的基本变量，这样便割裂了利润或利润率与资本的生产力之间的联系，从而否定了长期以来在西方一直被奉若圣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同时，该公式还表明，利润量或利润率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成反方向变化，这意味着资本家“节欲”越多、“等待”越久、“时差”越大，利润反倒越少，由此又有力地否定了关于利润来源于“节欲”、“等待”或“时差”等等古老的分配命题。这种情况对于刺激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曾经被与万有引力定律相媲美的边际主义经济原理及其他传统命题一旦被否定，就势必会开阔人们观察经济现象的新视野，启发人们分析经济问题的新思路，从而将导致新的理论变革与创新。

新剑桥利润理论的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从这一理论中可以得出通过改善收入分配来维持和调节总需求进而保证和促进经济健康增长的政策含义。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前提下，可以借鉴这一理论去考察现今西方国家的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也可以借鉴它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分配的有关方面问题，特别是分配在整个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与职能问题等等。

当然，必须指出，新剑桥利润理论也具有一系列的缺陷，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它缺乏对于经济范畴与经济变量的性质分析。例如，它的利润决定公式在本质上乃是属于一种定量分析，而未能涉及到利润的性质与起源问题。他们虽然也谈到社会经济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分析毕竟还是限于浅层次上，尚未能触及到根本的社会经济制度问题，以至于最终不能真正揭示利润所体现的阶级剥削关系。这显然是一个带根本性的缺陷。此外，他们虽然强调理论的现实性，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所包含的各种抽象假定，可是在他们自己的理论分析中却不时也出现一些同样的假定，象关于稳定均衡增长的假定等等。

### 参 考 文 献

- ① 琼·罗宾逊：《现代经济学导论》，1982年中译本，第二篇三章。
- ② G·C·哈考特：《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1985年英文版，第135～136页。
- ③ J·M·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全集》第五卷，1971年英文版，第110～135页。
- ④ N·卡尔多：《价值与分配论文集》，1962年英文版，第209～236页。
- ⑤ L·帕西内蒂：《增长与收入分配经济理论论文集》，1974年英文版，第五章。
- ⑥ 保罗·A·萨缪尔森：《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第三卷，1972年英文版，第187～198页。
- ⑦ N·卡尔多：《资本与增长，经济学读物》，1973年英文版，第307～311页。
- ⑧ J·A·克列格尔：《利润率，分配与增长，两种观点》，1971年英文版，第179～197页。
- ⑨ 参见S·艾哈迈德：《关于反帕西内蒂情况的帕西内蒂相对利润份额理论》，载于《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1980年第1号，第149～158页；琼·奥坎内尔：《未分利润与帕西内蒂定理及其诸定理》，载于《客观经济学杂志》，1985年第1号，第115～119页。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西方经济学研究室

责任编辑：郑英隆

## 关于我国企业集团发展的几个问题

孙志强

### 一、我国企业集团发展的原因与模式

企业集团是企业为谋求自身生存、发展,通过合资、合并、参股、联营等方式形成的企业联合体。作为一种经济范畴,企业集团具有如下特征:

1. 企业集团的出现,是企业受商品竞争机制的引导,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所进行的自然组合。因此,企业集团所产生的效益是以往单个企业无法相比的。2. 集团的核心企业以较少的资本推动着更大资本的共同运动,开拓市场,不断扩大和提高商品的市场占有率,从而提高竞争能力。3. 企业集团具有适应市场环境变化所要求的组织弹性。4. 企业集团内部的经营方式是多元化的,有契约股份式,企业合并式等各种方式。因此,在经营结构上呈现出纵向经营系列化和横向经营多角化的趋势。

以上这些特征,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企业集团经济属性的基本依据。我国企业集团出现和发展的时间不长,不过是近三四年来的事,但它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据初步统计,经地市政府部门批准并在工商部门注册的企业集团已达1630个。我国企业集团迅速发展的原因有如下几方面:

1. 企业的效益动机。我国企业的效益动机来自对社会主义利润的追求。对单个企业来说,由于受自身实力的限制,难以形成一种规模效益和行业优势,对多元化的市场的适应能力亦是有限的。而集团作为一种企业群体,它是多个或多种企业实力的聚合,它不仅能够接受市场的导向,同时也能够反作用于市场,以获取集团的整体效益。另外,相互联系的企业之间在企业集团内形成稳定关系,会增强集团各个成员企业抗衡市场影响的能力。因此,企业集团不仅有利于提高整

体效益,而且有利于提高成员企业的效益。

2. 市场竞争规则的强制。在我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被置于求生存、谋发展的地位,企业总是希望以最小的风险,获得最大的效益。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并保持稳定的市场,企业集团正好顺应了这一要求。

3. 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更多的资本共同运动,要求更多的资产存量能够聚积和统一使用。由于单个企业受制于自身的能力,因而无法承担这一使命。但是,企业集团可以通过其主导企业以相对少的资本而推动整个集团资本的运转,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

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肯定了企业集团在我国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必然性。从宏观上看,企业集团是介于单个企业与整个大系统之间的一个特殊的经济系统;从微观上看,企业集团体现了若干个独立企业之间的结合。

我国企业集团的发展模式大体可划分为下列四种:

1. 以产品为纽带的企业集团。这类企业集团分布最广、数量最多。主要表现为产品扩散,同时向两翼延伸——进行新产品开发和产品的深加工,在组织形态上,表现为以主导厂为“塔顶”,以产品扩散厂、协作配套厂为第二、第三层次的金字塔形结构。

2. 以工程项目承包作为纽带的企业集团。这类企业集团是以工程链为组织依据,以集团为依托,进行工程项目承包。包含了从技术设计到组织成套设备供应、安装、调试等项目工程系统。实行封闭式、交钥匙式的系统服务,其组织形态



表现为以主导厂（单位）为中心的向心结构。

3. 以技术开发为纽带的企业集团。这类企业集团主要出现在新技术和高科技领域。它以技术开发为核心，以迅速推广新技术、新工艺为目的。在这类性质的集团中，科技开发能力强的企业居于核心层，在组织形态上，表现为以核心层为中心的向外辐射式结构。

4. 以资金为纽带形成的企业集团。在这类性质的企业集团之中，资金雄厚的企业通过兼并、合并、参股、控股以及资产一体化等各种手段，达到对其他企业的控制，从而实施企业集团的多角化经营战略。在组织形态上，它表现为母公司一分公司一子公司的公司结构。

各种模式的企业集团在优化企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冲破条块限制、弱化行政干预、加快技术向生产转化、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形成拳头产品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从整体上来看，企业集团毕竟处在初始阶段，在专业化生产协作或经济联合方面并未发生质的变化，一般都停留在隶属关系、财税渠道和所有制“三不变”的前提下，是运用协议、契约等方式联结起来的联合体。

## 二、企业集团的发展趋势及主要做法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目前我国企业集团正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相当多的企业集团改变了初建阶段主要靠行政权力纽带连结成员企业的状态，出现了企业兼并和互相参股的情况，资产的联结纽带在日益加强。在所有制形式上，它正向着一种新型的所有制关系转化。结构上的多元化、行业分布上的立体化、集团形态的公司化、企业的股份化的集团格局正在形成。

1. 企业集团股份化。企业联合经营集团化是建立在独立于部门所有制和地区所有制以外的新的集团所有制，把分属于不同所有者或者利益主体的生产要素，用合资、投资、换股、控股等方式凝结起来，使所有权体现在整个企业集团之中，构成多层次、多元化所有者的集团化企业，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产要素新格局，使各个企业的利益主体，把眼光从单一的企业转向整个集团，增加整个集团的凝聚力，形成一个共存共荣的经济体系。

2. 企业集团合并化。企业集团内的成员企业顺应规模经济的要求，通过合并，一方面改组了集团内部的构成，改变松散、契约式的关系，

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紧密联合；另一方面促使生产要素在集团内得以流动和重新组合。

3. 结构多元化。随着企业集团构造单元的多元化出现，将改变目前企业集团只包含生产经营企业单一主体的格局，形成有企业、银行、外贸、商业以及科研机构等组成的全功能、多元化的集团构造体系。

4. 行业分布立体化。由于发展生产提高效益的要求和群体优势的存在，企业集团势必在各行业中大量涌现。单行业性集团与多行业性集团的纵横交错，构造出一个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主导性作用的集团网络体系。

企业集团的发展趋势与现状之间的差异，决定了我国企业集团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是：集中力量在经营机制和产权关系两个方面深化企业体制改革。比较现实的做法是：

1. 承包体制与股份制并举。股份制与承包体制的结合含意是：以企业集团为承包单元对国家进行承包，一面“包”，一面“股”，或是先“股”后“包”，推进集团经营股份化。由于集团是承包单元，这样既强化了企业集团的实体性质，促进集团由松散型向紧密型过渡和有利于整个企业集团行为的协调统一，又能推进两权进一步分离，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

2. 集团发展与调整产业结构相结合。这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有利于重点企业集团的发展，集团的发展又必须具有优化产业结构的功能。企业集团将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柱，因此，必须用政策倾斜调整产业结构，扶持企业集团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是需求拉动的结果，是供给对需求的追踪，因此，集团的发展应该具有增加供给的职能，在市场引导下，形成能够追踪需求变动的机能。

3. 集团发展与社会资产流动相结合。社会资产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发展的速度直接取决于资产的流动效益，取决于资产的增值效果。企业集团向资产联合发展，是以社会资产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流动为前提的，它要求彻底地突破“三不变”政策的束缚。实行资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企业为行为主体通过股份化、合并、兼并的方式，完成资产的积蓄与重组。

4. 集团的发展与集团内要素流动相结合。企业集团内生产要素流动是集团成员企业相互参

股、相互持股的前提，也是改组企业集团、形成实体性的企业集团的前提。由于集团内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企业集团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来随时调整生产要素的布局，保证集团内的生产要素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发挥资产存量的效益。

总的来说，集团体制改革的重点，逐渐由企业联合体向集团公司化过渡，由低层次的经营机制和产权关系的改革向高层次的经营机制和产权关系的改革过渡。企业集团的进一步发展将是一种多层次多元化构成的组织形态。在资产关系方面，国有企业的产权所有者是国家各级政府的产权机构，它代表不同层次国家所有制的所有者，负责监督对国有资产的维护、保管；同时，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以独立平等的民事主体身份参与市场活动，形成竞争性的资产经营市场的主体。

### 三、企业集团发展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企业集团的最终发展趋势是公司化的集团体制。在结构形态上表现为母公司一分公司一子公司的多层结构。集团内各企业之间的联系以资产联系为主，其他联系为辅的多渠道联系体系。核心层对紧密层的控制手段是资产的控制。因此，为了有效地实施上述具体做法，促使企业集团向目标模式发展，需要从多方面理顺关系，调整政策。

1. 在产权关系方面，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与明确资产管理方式。产权模糊是企业集团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障碍。产权模糊使企业不能作为行为主体来促使资产有效流动，企业集团的股份化也无法展开。同时，任何一个部门都可以代表资产所有者实施对资产的管理，都可以插手企业集团的事务，因此，免不了行政体系的多头干预。明确产权包括明确国有资产代表与明确企业用自有资金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的产权关系，明确资产管理首要的是明确资产管理部门对集团资产的管理关系与管理方式。从而避免多头干预，为企业集团股份化的发展创造前提。

2. 在投资体制方面，要解决投资主体的归位问题。企业集团的发展首先应该是经营权的完整化，因此，就必须解决投资主体的归口问题。

首先要赋予企业集团完整的自主建设权，保证企业集团能够在国家政策的界定内按需调节；其次对企业集团按国际惯例办事、多渠道筹集的资金有使用的自主权。

3. 在财税体制方面，改造财税体制，突破“三不变”。“三不变”原则的基础是财税体制。在“三不变”原则下，集团内部难以统一规划与协调，生产要素在集团内也难以自由流转和优化组合。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加速政企分离和税制改革，用税利分流的方式，使企业集团作为行为主体承担义务，而政府部门则退出对经济活动的参与。

4. 在对外贸易权限方面，扩大集团的对外贸易权限，促进集团向开放型、外向型发展。企业集团要有国际市场接受的名牌产品，形成产品系列和规模经济，不断开发和翻新产品的能力和较强的销售服务能力，就要享受充分的对外自主权，按照国际惯例来发展开放型经济，就必须扩大企业集团直接对外权限。

5. 在集团财务制度方面，拓宽资金融通渠道，强化企业集团的资金运用能力。目前，企业集团的发展已显示出财力不足，对此，企业集团建立财务公司，有利于在集团内部实现资金融通和提供控股资金，增强财力。财务公司可根据集团发展需要，向社会筹集资金，向成员企业或其他企业投资入股。银行应改变对企业集团各成员企业分别贷款的做法。

6. 在物资供应方面，要理顺对集团的原材料供应渠道。目前物资供应渠道不畅，已成为企业集团发展的一大障碍。在原材料市场还未正常发育、产销还不能直接见面的前提下，政府的调控职能应该以充分保证重点企业集团的物资供应为基础，扶持企业集团的发展，并逐步使现行物资配置方式向企业集团单元配置转化，促进物资市场的发育，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珠海市体委

责任编辑：谭湛明

## 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深化改革

马恩成

### (一)

广东农村十年来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使全省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农村社会总产值来看，从1978年到1988年，十年增长3.2倍，年递增15.6%；从农业总产值看，十年增长97.7%，年递增7.1%。全国有人把十年改革分成两段，第一段是从1979年到1984年的前六年，认为这一段改革的效果是明显的，各方面的生产蓬勃发展；从1985年到1988年的后四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段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生产出现了徘徊，改革的效果不明显，甚至呈现出萎缩的态势。从广东来看，第二段的粮食、甘蔗也出现一些徘徊，但从农村社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也就是从农村经济总体来看，仍然是持续、稳定发展的。如农村社会总产值前六年每年递增11%，后四年每年递增22.6%；农业总产值前六年年递增6.6%，后四年每年递增7.6%，都是后四年快于前六年。1989年，农业更是全面增产，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7.8%。从大农业内部来看，除种植业外，林、牧、副、渔各业的增长速

度都比较快，十年递增分别为8.4%、9.8%、13.8%、18.4%；而且后四年的增长速度都比前六年快。

为什么广东十年来农业从总体来看能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归结起来有四方面的原因：1. 广东地处亚热带，四季常青，雨量充沛，生产门路多，产值高，增长快。2. 地处沿海，毗邻港澳，容易引进技术、信息、资金，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3. 改革、开放比较早，经济搞得比较活，比较充分地调动了广大生产者的积极性。我省比较早地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发达地区注意了保存和发展村、社的集体经济，比较充分地显示了双层经营的优越性；我省比较早地放开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农村的流通渠道，使农民比较多地取得了流通领域的自主权，并按照市场需求和经济效益调整农业的生产布局和产业结构。农业的增产增加了对城市的副食品供应；农民购买力明显提高，并为工业品下乡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这些虽然是初步的，但比起改革前的产品经济时期，效果十分明显。4. 我省从1985年起，注意了

一手抓常规农业，一手抓山区、沿海的开发性农业和开放地区的创汇农业，进一步发挥了我省地处亚热带和毗邻港澳的优势。

和全国一样，我省近几年在粮、蔗等大田作物方面，也存在着生产的徘徊。1988年粮食产量是327亿斤，比1978年增长8.4%；1989年连续三造丰收，共增产36亿斤，刚刚接近1984年363.8亿斤的历史最高水平。我省糖蔗的最高产量为1985年的1831万担。1986年起由于收购价格不合理、经济效益低，连续两年减面积、减产量，1988年起调整了收购价格，连续两年增产，1989年产量1681万担，同样未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粮、蔗生产的徘徊，虽然不等于整个农业的徘徊，但由于它们是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这里特别对粮食的徘徊，作一些具体分析：

1. 粮食徘徊，一个重要原因是调整生产布局的影响。十年来调减粮食播种面积2000万亩，其中水稻播种面积1100万亩。调整使粮田与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比例，由1978年的76.3比23.7，改变为1988年的69.4比30.6。

2. 粮食徘徊的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粮食收购价格不合理，种粮的经济效益不高，不能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近年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是在缩小，而是有所扩大。从长远看，为了调动农民生产商品粮的积极性，必须逐步解决粮食收购的合理比价问题。

3. 粮食等大田作物出现徘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一度过于乐观，实际工作中有失误。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一是看到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作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认为“一包就灵”，可以不必多管，因而放松了对农业的领导。近几年不仅不少县、市一级，而且不少乡、镇基层的领导干部都很少过问农业，而是热衷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二是对前六年农业的增产，没有看清很大程度上带有恢复性，而且是建国30年来农业基本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结果。因而大幅度的减少了对农业的投入。全国如此，广东也不例外，如广东农业基建投资占全部基建投资的比重，由“五五”时期的22%下降到“六五”时期的9.2%，1986年下降到5.7%，1987年下降到4.3%。三是对1984年全国粮食、棉花等大丰收估计过高，认为出现了“供给过剩”，因而不适当地出台了一些限制措施，包括制定的粮食合同收购价低于超购粮的收购价，并取消了奖售化肥的优惠供应等。我省根据上述情况，近年来已采取发展粮食的一些措施，如稳定并适当扩大粮田面积，增加农田水利建设投入，推广杂优良种，扩大冬种旱粮作物生产，开展水稻创高产活动等，从而使粮食生产的局面有所改观，粮食单产和总产均有所增长。

## (二)

在治理整顿时期，农村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除确保粮食等农产品的稳定增长，促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外，还必须进一步稳定、完善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是农村十年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成果，也是农村深化改革的一条主线。举凡农村购销体制的放开，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专业化、社会化的发展等，都是以家庭联

产承包制这一主线而展开的。

广东农村十年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包、放、调”。“包”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在生产领域取得自主权。但只有生产自主权，没有处理自己产品的自主权，还是不能自主经营，这个自主权仍然是不完整的。还必须“放”，放开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放开农村单一经营的流通渠道，也就是改革农村的统派购体制，使农民在流通领域取得经营自主权。可以说，“放”是“包”的改革的继续。“调”即调整农业的生产布局和农村的产业结构。也就是改变过去的“以粮为纲”、“以农唯一”，处理好大农业内部和农村第一产业和二、三产业的关系。农民只有在生产、流通领域取得自主权，才能够按照市场需求和经济效益进行调整。通过调整进一步优化农村资源的合理配置，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可见，没有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这个调整也是不可能出现的。当然，我们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调整既要按照市场需求，又要符合国家的计划要求，协调好乡村与城市、当前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广东对巩固、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方面，是做了不少工作的。早在1982年，就提出了要“一完善、两整顿”，即整顿原来生产队的财务关系，清理各方面的债权债务，整顿基层经济组织的领导班子。1983年召开全省农村部长集训班、1984年召开地区性合作经济研讨会，进一步明确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是走中国特色的互助合作的道路，不是分田单干。1985年召开全省农村经营管理会议，进一步明确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本质特征是“土地公有、联产承包、户为基

础、双层经营”。明确“统分结合”，是家庭的分散经营与集体的统一经营相结合，既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又发挥集体的优越性。至于如何“统分结合”，各地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实行宜统则统，宜分则分。集体经济发达地区可以多统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可以少统一些。“统”，不是恢复过去的集中统一，更不是再吃“大锅饭”，而是为了加强协调管理，更重要的是为家庭经营提供有效的服务。在这一期间还分别介绍了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农村，实行统分结合，提供服务的经验。

但是，人们对家庭联产承包制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本质特征也有一个显示的过程。刚开始实行包产到户，一些人认为家庭承包很灵，实际上把家庭经营与家庭承包完全混同，认为不需要搞什么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有的甚至认为双层经营是人为地恢复过去的“集中统一”、“吃大锅饭”，“助长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加上一些贫困落后地区，集体经济薄弱，存在大量的“空壳”社、队，增加了发展集体经济、完善双层经营的难度。由于这些认识上的片面性，加上工作上的放任自流，使不少地方原来的集体经济受到削弱；有条件发展新集体经济的，也耽误时机，未发展起来。

实践证明，家庭经营如果脱离双层经营，孤立地发展，愈益显露了规模狭小、经营分散、力量薄弱的局限性。一家一户的生产，无论在资金、信息、科技方面都不适应扩大再生产的要求，在抗击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中会遇到多种困难。农民的心情是“要致富、盼服务”。产前、产中、产后的系列化服务，是多层次、多形式



的。但农民在大田作业方面最需要的是良种、科技、排灌、植保、机耕等方面的服务。这种服务不但数量大，而且许多是无偿或低偿的，只能主要依靠与家庭承包关系最密切最直接的统分结合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进行。大量事实证明：凡是家庭承包制比较健全，双层经营完善的地方，都能提供卓有成效的服务、补充家庭经营的不足，从而促进商品生产的更快发展。

有一种看法认为家庭承包制“已完成了历史使命”，认为只有规模经营才适应农业专业化、现代化的要求。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家庭经营当然有一个由小而全到小而专，到大而专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主要取决于客观条件。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适度的规模经营，不具备条件的不能勉强推行。实行规模经营的，也应以家庭承包为基础，而不能以此来否定家庭联产承包制。对于多数地区、特别是大田作物地区来说，家庭承包与多层次、多形式服务的社会化服务相结合，同样能够发挥规模效益，能够适应农业专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这不仅为我省许多地方所证明，也为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农业所证明。否认家庭联产承包制，就会否定农村十年改革的主要成果，势必引起亿万农民的恐慌，带来对农业生产的破坏。

### (三)

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亟需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1. 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为家庭承包经营提供社会化服务创造物质条件。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能依赖自发地协作，而应自觉地建立多层次、多

形式的联合、合作的服务体系。前面提到的为大田作业提供的“五统一、五服务”，是微利的，甚至是无利的，需要通过“以工补农”的形式进行补贴。这样的服务是其它专业性服务组织难以做到的，必须积极发展壮大统一经营层次的集体经济。否则集体经济两手空空，不仅不能为下面办事，还要向下面摊派，增加家庭经营的负担。

近年来一些地方比较早地注意扶持困难村、社发展集体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效。如江门市从1985年以来采取多种措施，重点支持穷队穷社，三年来经济联社一级经济的产值翻了一番。山区的条件比较差，但也出现了一些发展快的典型。如连县1985年建立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时，空壳社占47.2%。全省山区工作会议后，该县结合开发山区、造林种果，大力发展村一级经济。经过两个冬春办起一批林场、果园和小厂矿，空壳社下降到1987年的22.8%和1989年的6%。连县的经验说明集体经济办绿色企业大有潜力。只有县、镇加强领导，重点扶持，有的还可采取经济部门与贫困社队挂钩的办法，坚持几年，就可以出现成效。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了，不仅加强了对家庭经营的支援，也改善了基层干部的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相应地加强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

2. 加强集体土地管理、承包合同管理、集体财务管理。

首先要加强对集体土地的管理。这是我国土地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是一个人口多、资源少的国家。资源少首先表现在耕地上。世界人均耕地5.5亩，我国人均只有1.3亩。我省资源更少，人均只

有0.64亩。耕地少，需要珍惜，千方百计地保护，并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但是这些年多征乱占、破坏荒芜土地的现象却十分严重，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加强对集体土地的管理，保护原有耕地，开发利用新的土地资源，千方百计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加强农村集体土地管理的内容很多，从当前存在的问题来看，主要解决以下几点：

(1) 保护农田不受侵占和破坏。过去农田屡受侵占，有些来自本地的社员，在承包地上建房、建坟、建仓库、打泥砖；有的是来自村合作经济组织本身，以及村以外的全民、集体单位。为了发展第二、三产业而适当占用一些耕地是必要的，但违法多征乱占，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很大。必须严格控制耕地变为非耕地；必须对带头破坏耕地的人给以法纪制裁。在这方面，只是集体土地所有者、承包者维护还不够，还要有县、镇政府以及国土、城建等部门共同维护，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2) 解决土地丢荒、半丢荒的问题。在沿海经济发达、而且粮食收购任务比较重的地区，这个问题比较多。原因是有些社员外出从事第二、三产业，或由于华侨、港澳关系出了国。原来承包耕地的人走了，没有人再愿意承包；或有人愿意承包但不愿承担比较重的公购粮任务。加上乡村领导管理不严，就出现越来越多的丢荒、半丢荒田。如开平县从1985年以来退出的7000多亩承包田中，就丢荒了1000亩，而且落空了1.5万多担公购粮任务。开平县通过加强领导、集中时间，采取由新添人口、耕田能手、四邻农户承包等多种方法，进行了小调整，比较好地解

决了这个问题。

(3) 解决土地承包过于零碎分散的问题。这是由于实行包产到户时缺乏经验，农民又有平均主义思想，采取好田、坏田人人搭配的办法，致使每户土地承包得过于零碎，有的竟达十几块之多，不利于耕作，不利改善农田环境，社员甚感不便。这几年许多地方已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普遍采取的面积不变位置变的办法；有的采取重新划定地块、确定等级、公开投标的办法，在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下，有领导有计划地加以解决。

(4) 土地的无偿承包改为有偿承包。上交承包款是承包社员对集体应尽的义务；也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在经济上的体现。我省的经济作物地区大多是上交承包款的；但水稻地区，由于经济效益不高，大多实行的是无偿承包。现在看来弊端较多，一方面削弱了集体经济收入，也影响了对土地的再投入；另一方面削弱了社员的集体观念，产生分包就是“分田单干”的错觉，冲淡了对集体承担义务的观念。经济作物区因经济效益较高，通过达标投包，引入竞争机制，对于巩固集体、提高土地产出率的效果更明显。对于土地承包款应加强管理，专款专用，以堵塞漏洞。

(5) 土地的无偿转包改为有偿转包。土地的无偿转包，不利于土地的合理流动。土地的高偿转包，可以鼓励一部分已谋它业的农民，更乐于把土地转让出来。这样有利于搞活土地的使用权，使土地更快地向耕田能手集中，促进土地的规模经营与集约经营。土地的高偿转包，一定要通过合作经济组织统一安排，并履行

(下转第44页)

#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建设的构想

高 波

## 一、判断与思考：土地家庭承包经营问题

农业危机的问题决非农业超常规增长与常规增长之说所能解释得了的，恰恰是新的农业发展障碍引致农业由超常规增长急转直下而步入负常规增长。<sup>①</sup> 农业发展障碍的排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从改革与建设土地制度上寻找突破口，也许是一种理性选择。

近年来，学术界的倾向性意见是把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作为土地制度建设的基点；也有一些人极力主张土地国有化；激进派人士则大胆提出了土地私有化的设想。各种可供选择的土地制度构造方案层出不穷，并在一定范围内展开了局部的实践。我们认为，完善和发展家庭承包经营制是解决当前土地问题的现实手段，是制度建设不可逾越的阶段，但并非土地制度建设的长期目标和终极目标。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基于以下判断和思考：

(1) 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是我国农民的创造，相信农民对土地制度的自我选

择，尊重和保护他们自我选择的权利，这是我国农村制度建设的一项基本原则。但如果一味强求让农民选择，过分迁就农民，而忽略农民选择的局限性，则会加大选择的交易成本，造成整个社会的重大损失。因为，农民的选择往往带有倾向于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偏好，而且我国农民素质差，生存空间狭小，农民自身的弱点是会影响他们对土地制度作出科学选择的。因此，在事关全局的土地制度的选择中，要由政府把农民的意愿与全民族的利益结合起来，从整体上把握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

(2) 从总体上说，农民对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和经营方式是比较满意的，他们所期望的不是对土地的重新调整，而是家庭承包政策能够真正反映农民自己的要求，以获得对承包土地的稳定预期。许多调查资料都证实了这一点。1988年对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3200个农户样本调查表明：有72.4%的农户对目前的土地承包愿维持现状。<sup>②</sup> 农民不愿意调整土地，一方面是由于根深蒂固的求稳心理，另一方面是害怕已经得到的好处会重新丧失。而作

为农业生产要素的土地，则要求实现与其他要素的优化组合，发挥适度的规模效益，所以土地调整与流转的要求是客观的必然。鉴于上述情况，目前应在原有改革的基础上，在兼顾农民要求土地政策稳定的心态和对土地浓厚的眷恋心理的同时，积极开辟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逐步培育土地商品化机制，从而为土地的自由流动提供一种较好的社会形式，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利用。

(8) 现行土地制度的完善仍无法解决制度本身的矛盾，蕴藏着被新的制度所取代的客观必然性。目前，全国大多数地区只能由村民委员会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法人代表，土地资产所有权由农村行政组织代行，这必然造成新的“政企不分”。而土地所有权行政组织名义上的占有，还为行政组织侵犯农户的独立经营权洞开方便之门。其次，这种农村土地的社区所有制本身限制了土地流转的空间，制约着土地流转的顺畅进行。农民作为集体土地共同所有者中的合法一员，对其所有的土地具有强烈的占有心理，直接阻碍跨越社区界限的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对土地所有者来讲，土地既是一种生产要素，又是一种资产。在级差地租 I 上升趋势的作用下，土地所有者看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土地集体所有者也不会轻易承包给社区以外的经营者，以便待价而沽。这种行为无疑会影响社区间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直接损害土地的利用效率。再次，家庭承包经营制采取平均分配、期限占有土地使用权的政策，不利于农村微观基础的构造，农民种的是“保险田”（生活和就业保障），土地经营规模狭小，地块分割零

碎，生产设施和农业技术效能不能正常发挥，严重影响商品化农业或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4) 在土地制度的选择上，学术界围绕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命运展开的争论，主要是两大派，即完善派和替代派。完善派认为家庭承包制是我国土地制度建设的根本方向，现行土地制度的缺陷可以通过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来弥补。替代派则极力主张通过变革土地所有制来实行土地制度创新，替代亟应退出历史舞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其片面性。完善派从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实际状况出发来设计完善方案，而忽略了这一制度本身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而替代派的设计方案或者漠视实证分析，陷入逻辑怪圈；或者理论推演成熟，实际操作困难，目前实用价值不大。土地制度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变迁的逻辑顺序应是：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完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完全符合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土地制度出台—新制度发育直至成熟。土地制度的建设拟从完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取得突破，以明晰土地产权引进市场机制、促进土地流转、刺激竞争经营为改革内容，为制度转换准备条件。

总之，现行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某些制约农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经济滞胀、农业萎缩、经济环境恶劣、经济秩序混乱的情况下，完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仍不失为一种应急之策和过渡性措施，但并不是我国土地制度建设的根本方向。完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又是建设新的土地制度的前奏，是利用新旧制度转换的时间差来弥补政策断层必要阶段，其后

续步骤必然是构建与高度发达的农村商品经济相匹配的土地制度。

## 二、公平兼效率：土地产权制度 判断与选择的准则

1. 土地产权制度是土地制度的核心内容，土地制度的其他方面都是土地产权制度的引伸和产权结构及其现实运行的具体化。所以说，土地产权结构及其流转机制的差异构成了不同的土地制度格局。

土地制度建设的目的，在于为农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稳定机制和激励机制。而公平和效率的权衡与抉择，则始终是土地产权制度选择与构建的首要课题。单纯强调某一方面而舍弃另一方面的抉择都是有害的，是不足取的。唯一正确的判断与选择准则是两方面兼顾，既要效率，又要公平，在促进土地开发利用中的效率长足提高的同时，体现土地的社会公平原则。

2. 对于土地产权制度选择的公平原则，应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以“公平”名义所推行的土地与土地收入的平均分配政策，是一种原始的小农意识的公平标准的体现，切不可当作土地产权制度判断和选择的准则。事实上，土地分配的平均化并不能带来经营者的收入平等。作为土地产权制度判断和选择的“公平”原则，当然是相对于“效率”原则而言的，任何忽视“效率”而追求的所谓“公平”是必须坚决摒弃的。真正的公平只能是规则平等，也即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取得成功的机会平等。

3. 效率原则是土地产权制度选择的经济学标准。效率判断侧重于在一定的资源技术条件和财产收入分配关系下，对土地是否最大限度地发挥作为生产要素

的生产潜力并获得最有效的资源保护和地力培植、是否为充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提供激励机制、是否为精心保护和永续利用土地资源提供约束机制、土地资源配量是否合理、配量是否符合社会需要等等作出权衡。土地这一生产要素是全社会范围的资源，社会范围土地产出率的提高，应是土地优化配置所追求的目标，亦是效率原则的重要内涵。

4. 公平与效率兼得的土地政策意识是土地产权制度选择与构建的准则。由此出发，实行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就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节约交易费用。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可以根据如下构思来体现公平兼效率的准则：在土地产权分离（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前提下，明晰产权界区，界定产权职能；通过强化土地所有权的职能来实现社会公平原则；通过充分发挥土地使用权的效用来促进效率的提高。土地处分权在土地所有权主体与土地使用权主体两者之间规范分配，各司其职；通过有效的土地处分权的实现，将公平与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形成理想的土地产权结构和完美的土地制度体系。

## 三、资本化和社会化：土地所有制结构改革

土地产权制度的判断和选择以公平兼效率为准则是适应土地职能（社会福利和经济资源）的要求，符合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权衡再三，实现公平与效率兼得的政策目标的捷径应是推行土地的资本化运营和社会化占有策略。土地所有制改革，顺理成章地要为土地的资本化运营和社会化占有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



动力。

毫无疑问，无论是理论推演，还是实际操作，都排斥土地私有制。土地私有制绝难作到公平与效率兼得。我们推行的土地所有制改革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土地所有制结构的改革，而不是重建土地私有制。新建的土地所有制结构，以土地的社会化平等占有为前提。资本化高效运营为基础，为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稳定的动力机制。

改革土地所有制结构就是对土地产权关系的重新调整和界定，目的是为土地的社会化占有和资本化运营铺平道路。改革后的土地所有制结构表现为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化”，土地使用权的“多元化”和土地处分权的“规范化”。

在现阶段，农村土地制度优化的策略大致是：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保障集体行使土地的完全所有权，强化农户经营承包权，辟建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并促其发育。但随着农业生产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的高度发展，土地社会化平等占有的趋势将日益显著，必然会对现行的“国家土地资本的社区分割制”提出挑战，取而代之的将是土地所有权“国有化”和土地使用权“多元化”的土地制度格局。

实行土地所有权国有，国家可委托一个非行政性的土地资产机构——土地资产公司来代行土地所有权。国家土地资产公司行使土地所有权的过程，也是土地国有权在经济上得以实现的过程。土地资产公司根据系列化的行为规范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其中涉及产权界区的行为规则具有法律效应。

由于土地使用主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

性，尤其在我国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并存的条件下，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必须实行多元化竞争性经营，搞活土地使用权，达到土地使用权的有效流转的目的从而在土地所有制结构中实现土地使用权的“多元化”。农业的发展必须走农业企业化的道路。在一定时期内，农业企业化经营的组织形式仍然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具体组织形式可以是农户家庭农场、由农户联合组成土地合作农场、土地经营公司、农业联合社、农工商联合公司和少数经营效果好的集体农场以及国营农业企业等各种农业企业组织应在市场竞争中以多种方式有偿取得土地使用权。

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和使用权主体并规定各自的权职范围是理顺土地产权关系的重要内容，而其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是土地处分权的规范行使。原来意义的土地处分权是指土地所有者具有将自己的土地作出售卖、馈赠、出租、抵押及遗赠等各种处置的权力，在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已经分离的条件下，可以根据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对土地处分权的内涵作适当变更。

综上，构建土地“国有资本化，经营商品化”制度的基本思路是：国家把作为国有资产的土按社会公平原则以土地资本化的形式将其使用权让渡给具有土地经营资格的农业企业；企业在取得了较长时期的土地使用权以后，则按效率原则对所占有的土地实行商品化经营。国有土地的资本化主要通过地租、地价等经济杠杆来实现。企业的土地商品化经营只限于对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化，依据地租、地价标准，实现等价交换。国有土地资产公司与

企业之间的关系受法律制约。

合理确定地租的分配，是土地所有制创新的重要内容。地租是土地产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占有土地的农业企业享有充分的土地产权，因而有权获得地租收益。地租的分配政策一般是：(1)级差地租Ⅰ应收归土地资产公司。级差地租Ⅰ的形成一般取决于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地理环境质量和公共设施，因而必须收归社会所有，专用于土地建设事业。(2)级差地租Ⅱ由土地经营者获得。级差地租Ⅱ是土地经营者对土地追加投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投入）而形成的土地收益，应稳定地由投资者获得。在涉及土地权属转换时，要对这部分地租进行社会评估。(3)绝对地租的归属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很强的政策性。仅从土地所有权考虑，绝对地租似应收归国有，用以改善生产条件；或租税合一，部分地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但由于农业的比较利益低下，农业处于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国家应以绝对地租当作政策调整的工具；企业则以绝对地租为利益导向，开展土地的竞争性经营。占有土地使用权的企业在经营土地时，直接获得绝对地租，当发生土地权属转换时，绝对地租的资本化则构成地价的一部分。

可以预言，重建土地所有制，必将为圆满地解决土地问题上的难点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动力，重新启动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牵引整个农村制度体系的创新，从而在制度上满足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以促进农业和农村的稳定协调发展。

#### 四、市场+金融：土地使用权商品化运行机制

土地“国有资本化，经营商品化”制度的重要思想是：明确划分和界定国家的土地所有权与企业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明晰土地产权职能，通过土地国家所有权的实现来体现社会公平原则，同时为提高土地经营的效率提供制度创新的机会和条件。因而，培育土地使用权商品化运行机制，创建土地流转制度，是土地“国有资本化，经营商品化”制度构建的关键。

在土地制度的建设中，开辟规范化的土地市场，开办土地银行，通过土地市场机制与土地金融机制的融合来构造土地使用权运行机制，这一思路的基本内容包括土地资产机构、土地市场和土地金融的制度创新与组织创新。

土地资产公司 是由国家设立用于行使土地国家所有权的经营性机构，一般自上而下直至乡级建制。土地资产公司对土地使用权的让渡具有重要的社会规范约束和监督职能，在制度上体现为参与或组织对土地经营企业的考核和对土地价值的评估。(1)考核土地经营企业是对其土地经营的资格审查和企业素质的考评。企业要在经营能力、经营范围、经营方向、技术水平、经营规模、经营条件和经营效益（包括环境经济效益和生态社会效益）等方面符合考核标准，方可获得土地使用资格的确认。持有证书者才有权进入土地市场从事土地交易活动。(2)牵头组织有关专业机构制定土地价值评估技术规程，按规定严格地进行定期与不定期、定点与不定点的土地价值评估。

土地市场 土地使用权有偿占有与转让和土地使用权商品化经营的机制—

般通过地租、地价等经济杠杆来实现。土地使用权的让渡也可通过金融中介的参与来完成。土地使用权买卖的交易价格要在社会评估的基础上由买卖双方认可来确定。当土地资产公司一次性将土地使用权向企业让渡时，定价的依据是“级差地租Ⅰ+调节性的国有绝对地租”。在实际操作中，考虑到农业企业的资金紧缺状况，土地使用权的让渡并不采用一次性价格售卖的方式，而是采取按年度偿还地租的形式。企业之间土地使用权的买卖，亦不必采取完全的土地价格，而以“级差地租Ⅰ+归土地经营者所有的绝对地租”的资本化价格当作交易的参照价格，土地价格未实现的部分，仍采取土地经营者向土地资产公司支付年度地租的形式来进行。

**土地金融组织** 土地金融组织一般把经营土地的中长期信用业务与执行政府的土地和农业政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目前世界各国和地区普遍采用这一灵活而有效的政策性金融组织来参与土地的商品经营活动。从农村经济改革的趋势看，土地商品将逐步进入流通领域，土地使用权商品化势在必行。引进土地金融机制，必然会推动我国土地使用权运行机制的培植。在发展初期，土地金融组织的形式可以多样，如试建土地金融公司、土地信用合作社、土地银行等。根据我国的实际，参考国际经验，我国农村土地金融组织的一般形式宜采用银行体制与合作社体制合二为一的组织形式，建立土地银行。土地银行的运作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信贷资金的储备阶段。主要通过如下渠道储备信贷资金：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性拨款；二是吸收储蓄存款；三是发行股票、

债券；银行回笼货币亦是正常的资金储备。(2)以放款为特征的土地使用权抵押与收购阶段。土地银行采用土地抵押方式发放中长期贷款，用于支持农业企业购买土地使用权、机械设备等生产资料，扩大农场经营规模，支持农业企业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等农场中长期投资与建设。在资金允许的条件下土地银行可适量收购土地，以便直接执行政府的土地与农业政策。(3)以回笼货币为特征的土地使用权复归和出售阶段。以抵押土地取得贷款的企业必须在限期内按契约进行还本付息，到期后即可重新获得原有的土地使用权。若债务者到期不能按契约清偿债务，银行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直至最终收回土地使用权。为合理而有效地利用土地，土地银行应及时将所拥有的土地出售给土地经营者。土地银行在实际操作中，要使三个阶段在时间上继起，在空间上并存，从而实现土地金融机制的正常运转。

考虑到土地商品的特殊性尤其是位置固定性，可以借助于有关证券来代表土地商品进入流通领域，促进土地使用权商品化经营。土地资产公司发行“土地有价使用证券”，土地银行对所抵押或拥有的“土地有价使用证券”实行债券化，制成“土地抵押债券”，向市场销售。贷款企业只要在限期内在市场上购买到足以支付抵押贷款本息的“土地抵押债券”，即可到土地银行进行结算，兑回“土地有价使用证券”或重新取得贷款。通过“土地有价使用证券”和“土地抵押债券”的有序运动，就可把土地市场机制和土地金融机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建成一个完善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

土地制度的建设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长期任务。当前宜以完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为突破口，为新旧土地制度的转换作好环境准备，后续任务是构建土地“国有资本化，经营商品化”制度，培育土地使用权商品化经营机制，从而实现土地问题上公平兼效率的政策目标，达到对土地的合理配置及有效利用。

① 事实上，自1935年以来，农业连常规增长也未能保持，而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况且这亦非农业的周期性波动所能解释的，如果障碍不排除，农业将每况愈下。

② 傅刚、胡荫升：《多数农民拥护现行土地经营政策》，《农民日报》1988年7月27日。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经贸学院

责任编辑：郑英隆



## 教育史上学校起源问题的商榷

林柱育

学校产生于统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和培养统治者的需要，这一理论来源于对苏联关于学校起源理论的认同。50年代，翻译过来影响比较大的苏联教育史学著作主要有麦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康斯坦丁诺夫等的《教育史》和杰普利茨卡娅的《教育史讲义》、沙巴也娃著的《教育史》等。其中学校产生于统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和培养统治者的需要的理论，就是以麦丁斯基和康斯坦丁诺夫为代表的一种观点。麦丁斯基在他编著的《世界教育史》中说：“学校最初是在蓄奴制社会形成时期，在古代东方各国发生的……这些学校和科学还在阶级社会发生的黎明期就已不但成了满足社会需要的武器，而且成了祭司阶级为自身创造社会中特权地位和统治地位的工具。”<sup>①</sup>康斯坦丁诺夫在和麦丁斯基、沙巴也娃三人合著的《教育史》中说：“当私有制、奴隶制、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出现的时候，原始社会就开始瓦解了……人民的统治集团（祭司、首领、长老）划分出来了；有些知识（田地的测量、河流泛滥的预告、病人的诊治等）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智力教育跟儿童学各种需要体力劳动

的工作分开，并变为祭司的特权。为了讲授这些知识，建立了特殊的机关（学校），这些机关是用来巩固剥削者统治的。”<sup>②</sup>麦丁斯基和康斯坦丁诺夫的理论可以归纳为这么两点：一、学校产生于统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二、学校产生于培养统治者的需要。这种理论在我国教育史学界影响很大。外国教育史方面的老前辈曹孚先生首先表示认同，他编的《外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5月出版）直接采用了康斯坦丁诺夫等著的《教育史》和麦丁斯基著的《世界教育史》的说法。中国教育史方面的老前辈毛礼锐先生也说：“在奴隶社会制时期，出现了‘学校’这种专门场所，这是由于这时期农工业日益发展，在经济方面，有可能使奴隶主阶级脱离生产，专门办教育和受教育；国家机器的产生，需要专门教育机关培养官吏和知识分子；文字的产生，文化知识的日益丰富，有了更便利的学习工具和更丰富的学习内容，这样有组织有计划来传授这些文化知识便有了必要和可能，学校就产生了。奴隶主垄断着知识，学校教育成为奴隶主阶级的特权，学校成为奴隶主国家机器的一部



分。”<sup>③</sup>毛礼锐先生的理论除认为学校产生于社会分工和文字的产生外，其他观点无疑也是与麦丁斯基及康斯坦丁诺夫的理论一致的。曹、毛二先生的理论犹如一棵树上的两大枝丫，且都枝繁叶茂：外国教育史方面，有滕大春、王天一等赞从；中国教育史方面，则有王炳照、梅汝莉等相随。可以说，苏联以麦丁斯基和康斯坦丁诺夫为代表的学校起源理论在我国影响之大，以至我们在本国编著的教育史著作中难以找出一套与此观点相悖的理论。

我认为，学校产生于统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和培养统治者的需要的理论问题，实际上就是教育与政治经济关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三种：一、经济结构即现实基础；二、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三、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sup>④</sup>决定教育的因素也至少有上面所说的三种。而且，教育的发展（包括学校的起源）与政治经济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具有不平衡性；教育（包括学校教育且主要是学校的教育）会超前或落后于政治经济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它要受到许多因素，诸如环境、历史、伦理、道德、宗教迷信、图腾与禁忌等等的影 响，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基础作为必然的东西要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sup>⑤</sup>而起交互作用。各个国家、民族的学校起源具有其不同特点，就是受这些方面的“偶然事件”（即特殊性）的影响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古希伯来的学校起源于“巴比伦之囚”之后的犹太会堂。对上帝耶和华的虔诚和担心上帝降罪于民族的恐怖感带来了古希伯来教育的特殊景观。《申命记》告诫人们：“你们应

当把教育勤恳地传给子女，当你们在房屋里静坐的时候，当你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当你们在床上躺卧的时候和起床的时候，都要随时和他们谈论这些教育”。<sup>⑥</sup>这里并不存在统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教育也不是只培养少数的统治者，相反，必须人人受教育，人人都必须培养成为“上帝优越的子民”，不受教育者剥夺一切权利，放逐域外。在这种意识指导下，古希伯来的学校从公元前2世纪产生到公元1世纪实行了初具规模的普及教育。<sup>⑦</sup>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这方面的例子。古希腊斯巴达的学校起源原因比较复杂，它有为维护统治阶级自身统治，镇压奴隶反抗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使自己的城邦立于不败之地而实行全民皆兵，全体公民的子弟七八岁开始便得进入“军校”（斯巴达最早的学校）里接受训练。如果硬说古希腊斯巴达的学校起源于统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和培养少数统治者的需要这是十分牵强的。除此之外，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澳洲的一些原始民族学校也不是起源于培养统治者的需要，而是为了考察氏族成员的“青年礼”的需要而设置学校。有些民族的学校还分为男校和女校，形式多样，比较丰富多彩。这些学校往往都由部落酋长亲自管，目的是把人人都培养成为体格健全，具有一定的劳动技能，还兼有本民族起码的礼仪道德（有些民族的礼仪道德还十分复杂，需经专门的学习和训练）和知识的合格的氏族成员。在这种学校受教育的是全体氏族成员的子弟，也不存在统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在中国，相传最早的学校是五帝时候的“成均”，而比较可信的是虞舜时的“庠”。据古籍的记载：“有虞氏

始设上庠为大学，下庠为小学”，<sup>⑥</sup>虞舜时实行“禅让制”，还是原始社会；这时，虽然产品有了剩余但还不是私有，粮仓是公家的，是氏族养老和藏米的地方。当时没有阶级，氏族内部实行民主，谁都有可能被选为部落酋长——只要他有才能。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想，当时的教育并不存在垄断，学校也不是为满足培养少数统治者的需要而设的。

学校起源于培养统治者的需要的理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违反历史事实的。用这种理论去撰写学校产生的历史会造成许多混乱。麦丁斯基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举了“东方专制国家（埃及、巴比伦、亚述等）”的“祭司学校”、“书记学校”、“官庭学校”（见麦丁斯基著《世界教育史》第一部第一章）等例子，至于这些学校是否是东方国家最早的学校，这些学校又能不能代表所有国家、民族学校的起源，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的一切学校起源是否都如此等等具体问题，麦丁斯基都没作任何具体的说明。康斯坦丁诺夫则引证说：“古代中国在纪元前几千年就有学校存在。在这些学校里，居民中的统治集团的儿童学习阅读和书写复杂的象形文字”（见康斯坦丁诺夫等著《教育史》第1编第2章），这“纪元前几千年”的说法极其含糊，难以判断所指时代的社会性质。在中国，与其一脉相承的理论的贫困也是显而易见的。研究外国教育史的滕大春先生，一方面认为古代学校产生的历史基础是“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必须把一系列统治办法传给他们的后代”，<sup>⑦</sup>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不存在垄断，“古代学校的来源”，不是为满足培养统治者的需要，而是为满足考

察氏族成员的“青年礼”的需要。他甚至提到了苏联杰普莉茨卡娅在《教育史讲义》中说过的，很多教育家都认为是学校最初起源的母系氏族繁荣时期的“青年之家”，而且说，“类似中亚地区的‘青年之家’，大洋洲的若干岛屿、南非、美洲、南亚、欧洲等地都曾有过”，<sup>⑧</sup>还充分地肯定了古希伯来的学校起源和普及教育在教育史上的意义。因此，滕先生的结论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中国教育史方面，毛礼锐先生干脆把学校的起源定在奴隶社会。因为不这样，他所说的“国家机器的产生”便无法落实，“官吏”便无从产生，对学校起源于“需要专门教育机关培养官吏和知识分子”、“奴隶主垄断着知识”等理论也无法说明。王炳照先生一方面接受了毛先生的理论，另一方面又无法解决该理论与历史事实的矛盾。因而他虽然认为学校是起源于培养“进行管理”的“专门人员”的需要，但不再武断地把学校的产生定在奴隶社会，而是承认了中国学校起源于虞的事实。<sup>⑨</sup>他还根据所谓的“上庠”和“下庠”断定中国当时的教育已有等级性。至于统治阶级怎样垄断教育，又怎样为满足培养少数“进行管理”的“专门人员”的需要而产生学校等等实质性问题，因为没有相应的历史事实，所以只能避而不谈。尽管毛、王二先生都曾谈及西周的“学在官府”，“官守学业”的教育现象，但因西周离学校起源的时间相去太远，其实已不能用作论证学校起源与统治阶级对早期学校教育垄断的论据。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归根到底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没有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文字的出现，学校便无从产生。但假如我们承认意识形态是决定教育的因

素之一，承认教育的民族性、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教育的发展与政治经济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就不应该把学校看作是统治阶级对教育垄断的产物，不应该把学校看作是满足培养少数统治者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古代，政治上层建筑还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因素，这时起主要作用的是意识形态。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曾说：“仅从意识形态的范围看，如果说在西方古代是政治起着主要的作用，在中世纪是宗教起着主要作用，那么在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以至封建社会中则是伦理道德起着主要作用。”<sup>②</sup>这是很有见地的。所以，如果说古希伯来学校的起源应主要从宗教角度去考察，而古希腊斯巴达应从民族安全需要方面去考察的话，那么，中国则应该从小农经济、血缘伦理等方面去考察。虞舜时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所谓“五常之教”，氏族社会中养老敬老的传统、古籍记载中的“序者，射也，射以观德，有先后之次焉”等等，都应该从血缘伦理、礼仪道德观念方面去找寻解释，而不能简单地给“垄断”、培养统治者等理论作牵强附会的例证。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把传统的学校起源的理论改造过来，把学校产生的历史条件表述为：社会生产日益发展，有可能使一部分人脱离生产劳动专门办教育和受教育；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人的智力和

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些智力和能力必须通过创办学校进行训练和培养；文化知识的丰富，学习内容的扩大，特别是文字的产生，有了贮存和传递知识的工具，这就有必要和可能建立有组织有计划的专门教育机关，于是产生了学校。

- ① 麦丁斯基著，叶文雄译《世界教育史》（增订本）第5至第6页。五十年代出版社1930年10月第5版。
- ② 康斯坦丁诺夫等著，李子卓等译《教育史》第1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37年12月第1版。
- ③ 毛礼锐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第23至24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
- ④ 参见《朱光潜美学文集》第4卷《序论》中的“迷惑之二”。
-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 ⑥ 见《圣经·旧约·申命记》。
- ⑦ 资料来源主要是曹孚、滕大春等编《外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和〔英〕博伊德·金合著，任宝祥、吴元训主译的《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等。
- ⑧ 《古今图书集成》学校部汇考总则。
- ⑨ 《外国古代教育史》第13页。版本同⑦。
- ⑩ 《外国古代教育史》第3页。版本同⑦。
- ⑪ 参见《简明中国教育史》第一章第一节。北师大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
- ⑫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22至23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陶原珂

## 文明的进步与思想的逆流

——西方二十世纪学术思潮之一

黄卓越

汤因比曾指出，当古代世界曾经存在的所有文明都在时间之轮的运转中停滞、衰微之时，唯独西方文明这座“上帝之城”幸运地留存下来，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在19世纪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维多利亚的诗人们更是以热烈的情怀来讴歌它的富庶、幸福、荣耀和长存。这种乐观向上的情绪在整整一代西方学术研究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其中最能代表其基本倾向的便是各种“进化”的思想。“文明”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它所具有的鲜明的历史特征，促使人们要求以一种进化的方向上来证实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虽然任何一种理论的端倪都可以不断地往前追溯，但就19世纪以来的学术而论，在哲学上对进化思想作出明确阐述的是孔多塞、杜尔哥、孔德、黑格尔等人。黑格尔将理式演变、辩证否定等概念引入了他的“宇宙结构”，在深层构制上动摇了长期统治哲学、思想领域的亚里士多德的同一逻辑论、古典主义的人性不变论和基督教的静止世界观。在博物学和民族志方面，普利杰德、瓦茨、拉马克通过对淹没已久的历史陈迹的发掘，在一个更具体的背景上

证实了人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逻辑。到19世纪中叶，进化的思想已开始普及人心，达尔文、华莱士在生物学方面所投入的大量和坚实的实践更是将它推到了一个高峰。而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里，即1861年，斯宾塞、巴霍芬、梅恩在社会学上对进化论进行阐释的著作，也适时而出。进化思想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所有的领域，并成为19世纪学术思想的一个最明显的标记。

不管进化是一种观念还是事实，它首先是与时代的生存状况及其认同体验密切相关的，人们正是出于对文明的仰慕，才将它看作是一种进化，并用事实来证实它。因此，当生存的条件和体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文明的弊端逐渐从繁荣的背后进入前景的时候，文明的幻想便很自然地受到怀疑、责难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看，如果说19世纪是以推崇文明为标志的世纪，那么20世纪最主要、最广泛的学术思潮，便是以反文明为其起点、目标及深层内含的，进化或进步便第一个受到打击。

## 一、进化思想的泛化与否定

除了对事实的引用之外，进化论思想的形成，至少建立在两个基本的逻辑起点上，第一，技术和经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们不仅促成了文明的进步，而且也是衡量文化之优劣的统一性标准；第二，西方文化是至今为止最优越也是最发达的文化，从这个种族论的制高点上来俯瞰、比较其它民族的文化，据此描摹出一条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轨迹，并造成一种单一演进的绝对论体系。

首先是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中，从泰勒开始，在19世纪末承续了早期的进化论思维模式，并成了各种进化思想的一个汇聚点。如果从以上两点出发，文明进化的历史便可以勾勒为是从野蛮时代一到蒙昧时代一到文明时代（摩尔根《古代社会》），或者是从巫术一到宗教一到科学（弗雷泽《金枝》）。这被看作是哪任何民族所无法摆脱的一种必然进程。

最早对这种单一进化模式提出异议的是“莱比锡”学派的格雷布纳、施米特及其同伙，前者将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划分为6至8个独立的文化圈，后者则提出了一个囊括全球的原始文化圈，其中便有中央、南方、北方、飞去来器等不同的文化，尽管他们在分析具体文化的内涵时仍然不时地采用了技术—经济决定论的进化模式，但其学术的主要旨趣却是不同文化的个性特征，并用了新的尺度，即“形态标准”来衡量这些文化的特质。就他们所提供的空间差异模式看，也是与进化论的历时差异模式异趣的。

与之相类似的是以马凌诺夫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等为代表的英国功能主

义，他们显然不满足于那种无限度单一进化的模式，而采用了一种有限度进化的概念，并以为文明既可以造福人类，也能够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应当进一步考察文化的功能及其对人类的意义，并借此来判断文化的性质。这样，它们跟文化圈理论一样，虽然还带有进化论的痕迹，但已从方法上突破了过去进化论的线型模式，形成了向下一代人类学过渡的趋势。

在人类文化学上对进化论构成毁灭性打击的是以博阿斯为首的美国学派。关于博阿斯，美国人甚至认为，整个美国现代人类学都是由他一人创立的。这样的誉词或许并不过分，因为后来长期影响美国及世界的数代人类学家，几乎都出自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指导过的研究生班。其中便有的被奉为“20世纪最伟大人类学家之一”的克鲁伯、心理人类学创始人戈登威兹、文化模式论创始人本尼迪克特（后续米德）、文化人格学创始人萨皮尔、林顿等。虽然博阿斯学派在以后的发展中已分化为诸种流派，但其反进化的总倾向是一致的。大致可以将他们的观点概括如下：

第一，认为文化是相对的，这不仅是指文化的起源、形态，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对后一点的强调在美国学派身上表现得甚为突出，博阿斯认为，非洲黑人、澳大利亚人、爱斯基摩人、中国人的社会理想，与西方人都不一样，因此不能以种族优劣的理论去框架他民族的价值选择。第二，文化是超有机体的，这主要是克鲁伯提出的，因此便无法用达尔文那种生物进化的理论来推演文化，不唯如此，任何生物、地理、政治、经济和技术等单方面的原因都不可能成功地解释文化这种独特



的综合体。第三，后期美国学派将重点移向文化的心理研究，并将它看成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表征，而精神本身又是无法象技术—经济等那样衡量高低的，欧洲人视为“异常的”性格在其它社会则是“正常的”，这种努力与马克思·韦伯将西方近代的发展看成首先是由精神原因所引起的这一观点属于同一种思潮。

反进化的相对主义也与现当代哲学、阐释学、伦理学、历史学等学科形成的观念是一致的。其中，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言论很有代表性：“进化论的历史观在否定个人独创性的无比重要时就显示出，它是一种非科学的极端模糊的观念，也是一种现代科学决定论向最古老的东方宿命论的倒退。”

当然，历史学领域是更易受到重视的。即便在进化论的酝酿期，赫尔德尔就已看到启蒙主义用文明来抹煞个性的弊端，主张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立性，兰克用了一句最简洁的话来表述它：“每个时代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这种转折在20世纪则被纳入到一更广大的图式中加以具体的描绘，斯宾格勒将世界文化分为各自独立的8个区域，汤因比则分为21个区域。更后的法国年鉴派继承了上一辈历史学家的观点，坚持要充分地“理解”每一时代的独特性，但在对待兰克那句格言的态度上则要比德国浪漫派史学家更为认真，就他们对历史构成的地理、社会、心理、经济等要素的综合研究，以及严谨的态度看，的确要比19世纪的各种文化和历史学派更为冷静和更有说服力。

## 二、永恒循环的宿命

在对待文明与进步的态度上，与以上

学派的纯学术研究相比，尼采则更多地是出自切肤的感受，并采取了一种强烈挑衅的姿态。在诸如《痞徒》、《反时代的考察》、《历史对人生的利弊》、《反基督》、《悲剧的诞生》等一系列著作中，他广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文明的科学、教育、文化和宗教，认为就这些方面看来，“人类并不代表一种趋向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意义下所谓更好或更强或更高的东西的发展，‘进步’只是一种现代的观念，那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今天的欧洲远不如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进一步的发展一点也不是基于‘超升’、‘增进’或‘力量’各方面的必然性”（《反基督》）。这与相对主义那种还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文明取保留态度的作法不同，他将文明看成是一种纯然有害的东西，认为应该促使它的“速折”，以便循环到新的、更原始的起点上去，这才是人类的必由之路。

循环的思想对进化论和相对主义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它对后代重新去认识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它也一直是西方认识论的一种典范模式，在最早的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维吉尔及基督教神学中，它被用作基本的阐释体系，并为维柯用于具体的历史考察，继而成了黑格尔演绎人类精神过程的永恒原则。

斯宾格勒是深受尼采影响、并在本世纪初享有巨大声誉的一位历史学家，他虽然运用了早期进化论学者的生物学方法，即把文化看成是类似有机体的东西，但却以为，既然是有机体，就不仅是生长的、也必然有其衰败，由此他将文化分为前文化期、文化早期、文化晚期、文明期四阶段，并将它们与自然界的春、夏、秋、冬

的节奏相比附。他分析了西方文化的现状，以为它已是处于最末的文明期，因此面临的就不仅仅是“危机”，而是“没落”，正是因为历史的演进和自然的盈亏一样神秘而无法制约，唯一的遁途便是服从必朽的宿命。

这种循环在斯宾格勒、克拉格斯、阿尔弗雷德·韦伯等人的末日论里是一种封闭的圆弧，这与黑格尔理念最后胜利的封闭圆弧正好方向相反。而尼采的循环则是没有终端的，存在是一个自转的轮、万物方来、万物方去，“永恒的重现”总会发生，因而在彻底的悲观中闪露出未来的光亮，以后本雅明、艾略特、劳伦斯等对历史和未来的看法，基本上采取后一种态度。

仅以劳伦斯为例，他可以说是本世纪文学中对西方文明及其弊端洞察最深、批评最烈的一位作家，因而造成对他的思想的争议也最大。他几乎把苏格拉底、柏拉图、耶稣、释迦牟尼这些历来的“精神领袖”都看作是人类灾难的转折点，由于理性和精神生活的引入，人的天性才开始丧失，并愈演愈烈。从这一角度看，进化的历史恰恰是退化的历史，时至今日，文明业已腐败，因而他希望有一场圣经中的洪水再次淹没将死的人类，并将这种死亡看成是再生的前提。他后期所有小说的深层结构都旨在证明这种由死而生的循环模式。

20世纪前半期的人类学中的另一支——剑桥学派开始加强了对古代仪式的研究，这种学术倾向表明，对神话、宗教仪式的论证实际上是想表明循环仪式的永恒性和普遍性。哈丽生、康福德、库克、墨雷、威尔斯等人看似纯粹的学术著作反映的却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精神需要，后来

又在50年代的弗赖那里引起了最后的反响。

弗赖曾多次谈及剑桥学派对他的影响，并将自己的批评看作是人类学文艺学，因而虽然表面上是谈文学的过程，实质上却是通过文本分析表明他的历史观念。文本中前后嬗续的神话、传说、写实、讽喻四种形态，一方面与自然的春、夏、秋、冬相一致，另一方面，当模仿引起文明之后，文明也走过了中世纪、文艺复兴、18世纪、当代四个阶段。讽喻反映了当代生活的实质，它写的是地狱的魔幻，把人类死亡期的丑状用调侃的笔调表现出来，并向神话再次过渡，比如卡夫卡、科克托、艾略特等人的作品便是。但弗赖作为一个宗教徒，他的回归目标当然与尼采不同，不是“大地”，而是中世纪的“天堂”。虽然同是循环的模式，却因最终的取向不同而呈现出差异。如此看来，所谓的客观的宿命也只不过是一种主观的选择。

### 三、对宿命的应战

汤因比的研究是在斯宾格勒的启发下开始的，但他并不满足于循环论的解释。他认为重现虽然可能，在时间的织机上出现的图案却始终更新的，于是他提出了一种“挑战与应战”的新模式。在长达12卷的《历史研究》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文明生长与衰亡的诸多因素，以及西方文明当前的困境。他以为文明的衰亡不是“天生要死”，而是“自杀身死”，这最终取决于文明自身的自决心和对危机的应战能力与信念。这样，他便将对文明命运的把握从客观必然性转换到主体身上，并顺理成章地取一种更为乐观的、改进论的态度。而文明本身就不是循环论所认定的绝对之

“恶”，也不是进化论认定的绝对之“善”，而是相对的、二重的。

一战后盛行于欧洲的存在主义对文明的批判和对历史的认识也属于改进论的，但它的理论着眼点却主要是本体论的，而不是历史论的，因此对历史过程的看法更多是与存在的“时间”密切有关的。因为存在总是“欠缺”向“完整”的追求，所以历史不是循环的而是渐趋的；因为存在是一种选择，因而历史是可经由人的“筹划”和“行动”来造就的；文明的进步已经使人的这种存在彻底地“沉沦”，因而需要一种否定的精神加以拯救，等等。

相比之下，雅斯贝斯是这一派中最具历史观念的一位，他在《生存哲学》、《历史的起源和目标》等书中提出的系列看法，也基本上代表了这派的主张。斯宾格勒、汤因比对文明种类划分为各自孤立的部分，雅斯贝斯则将世界历史看成是不断走向统一的过程，在约公元前800—200年间，三个轴心文明即中国、印度、希腊已在精神上统一了它们周围的文化，形成了独立完成的文明区域，然后是漫长的间歇期，前两个文明在此过程中停滞或衰微了，唯独西方文明仍在继续发展之中，并且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全球，造成了新的、也是最后的统一格局。但雅斯贝斯反对把统一看成简单上升的运动，反对历史有终极目标，认为人的生命与历史在本质上无进化可言，创造与毁灭是同存的，统一的完成也就是衰亡的降临。就这些看来，雅斯贝斯的确是宿命论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希望人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自己必亡的命运，于是便提出了精神“信仰”的问题。他认为，信仰虽是无法确切

地界定的，但只要以此为力量，就有可能改变人类的命运。

当然，存在主义神学派，如克尔凯郭尔、马塞尔、巴尔特、蒂利希等人对文明的批判也是殚精竭思的，它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国内对之所作的估计，尽管它把最后救世的希望寄托在上帝与信仰之中，但仍然是一种改进论的主观选择。除此之外，胡塞尔的批判虽在某种程度上受了他的学生海德格尔的影响，却能独立地将文明的危机置于自希腊以来的历史运动中加以考察，他与其它存在主义者的差异是进一步强调“理性”的救赎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倾向最初由霍光海姆的观点表现出来，他认为历来学术的总特征是解释现存的世界，因而也是维护既定的秩序，属于“传统理论”的范畴，与之相反，他们则是属于怀疑与否定的，可称为“批判理论”。这种规定决定了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激烈批判性。

由于时代的原因，几乎这一派的所有成员都接受了心理分析的影响，先验地将本性、本能等作为理想的范式。同时，又将社会的教育、制度、科技等的发展看作是另一种与之消长的对立力量，这些文明的成果原是人们创造的，但在现代社会中却成了异己的东西，“压抑”了人的正常本能。因而，批判文明与解放本能是一组相关的理论行为。但他们的批判仍是留有余地的，正如马尔库塞所看到的，尽管文明是人性的死敌，但它带来的科技进步却又为人性的解放准备了条件，比如通过缩短工作时间，便能为人们提供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来实现生命的闲暇。因此，他们对宿

命的论调是持怀疑与否定态度的，“决定全在于人”（弗洛姆），而不在于文明已经在何种程度上支配了人。虽然整个改进派在贡献他们的未来方案时，都带有空想的色彩，但仍是反文明思潮中最积极的一支。

#### 四、历史的同一

在反文明与进化的逆流中，“同一”论的隐晦和引人瞩目之处是兼而有之的。同一便是历史的一致性，因而便取消了文明设立的隔绝，无差别地回到人所共具的本质之中。

同一思想自基督教始，便是反文明的一个最重要概念，西方近现代的许多重要思潮，如人性论、德国浪漫哲学与文学、甚至于存在主义，都与之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循环论者也往往是个同一论者，譬如尼采，一方面认为历史是循环的，另一方面又认为是同一的，弗赖虽然将循环看成普遍的宇宙法则，但却认为同一是一种更深层的模式。

在当代，同一论主要表现在文艺学、文化学、宗教学所共同探讨的“原型理论”那里。早期文化学中对原型的研究，还主要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探讨，越到后来就越带上了确定的倾向性，成为一种拯救的模式。原型理论否定世界的各种表面形态，将国家、社会、理性看作是外在于人的本质的东西。功利的人、日常的人、个性的人游离于本质之上，而这又正是由文明造成的。从人的本质上讲，并不存在什么进步之类的东西，进步的概念只是通过对表面、外在事物的论证而得出的，并且恰恰是有害于人的内部生存的。因而唯有进入到历史的同一，即亘古不变的原型之中，

才能重新找到生命的源泉。

由此，那种将原型理论作为单纯的学术来看待的思想，实际上是肤浅的。不仅文学艺术中对原型的表现是直接针对文明的时弊密切相关的，原型理论家荣格之研究原型，其实际的意图也是在于根治因理性、焦虑等引起的现代精神病，解救“现代人的灵魂”。正是因为他在价值取向上投合了现代反文明的思潮，所以他后期的影响超过了弗洛伊德。他所肇始的这一运动，由鲍特金、纽曼、费德莱尔、蔡司等人推波助澜，为现代文艺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和新的面貌。

原型理论也直接促成了本世纪神话学的兴起，同一性的探求是它们的共同旨趣。神话是人类之“根”、历史的源头，是一种共时性的结构。早期施莱格尔、尼采、谢林、格林兄弟，及以后的荣格、弗赖等人之标榜神话，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当代神话学代表人物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通过大量的例据来证明古人是生活在神话之中的，现代文明则因为失去了根基而造成人的分裂，因而回归于神话就成了相比之下更具体可行的一种赎救方式。

同样，法国年鉴派在20世纪历史学中一直占据一种无法企及的优越地位，也决不是偶然的。除了它所提供的那套最先进、最完备的解释方法之外，也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普遍的时代精神。在1971年夏的年鉴专号上，它告诫人们不要把“工业化欧洲的价值体系，它对变革和创新的迷信”应用于所有时代和各种文化，而是应该将目光转向“长时段”的深层结构，进入到稳定的、表现出持久不变人

性的共时状态之中，认为这种历史的整体性结构不仅是认识全部人类历史的基础，也对现代文明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在这方面，弗舍尔、布洛赫、布罗代尔等人造成的效果，差不多已使那种线型进化的历史学在欧洲完全无立足之地。

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结构主义虽然是与存在主义针锋相对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即在追求历史和人的同一性的意义上讲，却是与存在主义相一致的。历来一直把俄国和捷克形式主义看作是法国结构主义的基本始因，这显然是很不够完整的，在许多方面，列维—斯特劳斯都受到了他的好友布罗代尔的“年鉴”思想的影响，而他对神话学的研究，则是在前人的思路

引导下，进一步改进了神话学派那种随意性的方式，使同一的理论变得更具严密性、科学性和体系性，并又最后象神话学派一样，将结构的根据重新置于人类本性的无意识心理之中，在结构主义的共时性中，进化的历时性是没有任何地位的。种种对同一性历史的解释都表明了现代人文科学的一种共同倾向，即企图以深邃的整体性来抗拒文明对人性的分裂、瓦解和异化的趋势，从而为现代人在文明的变动不居面前所遭受到的漂零、惶惑等求得解脱的方式、为之建立一个现代的心理基座。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

（上接第95页）

重重，还是想方设法通过自筹和各种贷款渠道，投入822万元，扩建了6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和仓容，增添了一批短线设备。1989年，又继续投入76万元，先后建成了具有80年代先进水平的喷漆、装配（含包装）等两条生产流水线。为产品的升级换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台山机械厂经营之道的一个最成功的经验，就是一切从市场出发，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利用国家产业政策的优势，将本企业的生产推上了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新台阶。

责任编辑 英 隆



## 论唐宋赋的尚理倾向

曹明纲

赋主体物，这在晋代已被充分认识并明确指出了。陆机《文赋》所谓“赋体物而浏亮”，即抓住了汉魏赋在艺术上的这一特色。以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则以“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赋重抒情，是汉末才开始出现的，至魏晋六朝时已蔚然成风。所以刘勰论赋已不能专以“体物”来加以概括，而要以“体物”和“写志”并列了。他对“物”和“情”在赋中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解释：“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这就把赋在汉魏六朝时的主要艺术特色概括出来了。赋尚说理，则始见于唐而终盛于宋。对此，历代论者多加以指责，认为赋的这种创作倾向有悖于传统，破坏了赋的艺术准则。元代祝尧是发难者。他指出唐代杜牧《阿房宫赋》“太半是论体，不复可专目为赋”，又说宋代欧阳修《秋声》、苏轼《赤壁》“以赋论之，恐教坊雷大使舞剑，终非本色”（《古赋辨体》）。

其实，作为唐宋时期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倾向，赋尚说理只是包括诗文在内的众多体裁中的一方面的表象。它的形成和演进都不是或不完全是某几个作家在某一体裁创作中的偶然动作，而是文学创作本身规律和特定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唐宋赋的尚理倾向，也远非前人所表述的那样仅仅体现于文赋这一赋的新品种的创作中，相反，它已完全渗透了唐宋赋的两种最主要的体式——律赋和文赋。

从表面看，律赋与文赋是两种创作要求迥然有别的体裁。前者讲究破题、限韵、字数、用典、排偶等，有必须遵循的比较严格的格律；后者则追求兴到笔至，韵散兼施，行文、篇幅都很自由，不受约束。然而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赋，在唐宋时

几乎都出现了崇尚说理的创作倾向。前人对文赋创作的尚理较为注意，多予批评，对同时存在的律赋创作的尚理却往往忽视，很少置论。其结果必然是执其一端，就事论事，未能从更高、更广的角度来认识唐宋赋尚理的历史现象，对此作出客观的、中肯的分析和估价。

如果仔细考察唐宋赋尚理倾向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它的初露端倪，不在多为后人非议的文赋，而在当时为文人学士所共趋同骛的律赋；它出现的时间，也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在杜牧所处的晚唐，而是在李程、白居易所处的中唐；它的直接起因，不是个别赋家的天才兴至、有意变革，而是考官甚至是皇帝在科举考试中的亲自命题。

据史载，唐贞元十二年博学宏词科试《披沙拣金赋》，以“求宝之道，同乎选才”为韵，显然是要求应试者用律赋的形式，来论述求宝选才的道理；又元稹《白居易集序》：“贞元末，进士尚驰竞，高郢始用经艺为进退。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其《性习相近远》等赋“新进士竞相传于都下矣”。在白居易所作律赋中，《性习相近远》、《动静交相养》等作都以说理为主。《旧唐书》谓其《性习相近远》为“新进士竞相传于都下”，《唐摭言》记李逢吉读其赋“大奇之，遂写二十余本，其日十七本都出”，可见说理在唐贞元末已成了律赋的重要内容，而以说理为主的律赋名篇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此外，在今存唐代历年律赋试题中，像《梓材赋》（开元二十二年，以“理材为器，如政之术”为韵）、《平权衡赋》（贞元九年，以“昼夜平分，铢钩取则”为韵）、《乐理心赋》（贞元十五年，“易直子谅，油然而生”为韵）、《乐德教胄子赋》（贞元十七年，以“育材

训人之本”为韵)等,显然都以说理议论为主,时间则都在杜牧宝历元年(825)作《阿房宫赋》之前。至于其后《册府元龟》载文宗于开成元年向奏事宰臣夸耀“从来文格非格,昨试进士题目是朕自出,所见诗赋似胜去年”,虽所出赋题今已不可知,但按文宗出题目的和一般常理推断,其性质当非体物和抒情,而属说理一类无疑。

以上仅举唐代律赋试题中明显带有说理性质的一些例子,那些题内有体物、抒情色彩而文中以说理为主的还不包括在内。即便如此,已足见唐代自中期以后,律赋已出现了明显的尚理倾向。这种倾向初显于律赋,继又见于文赋,而杜牧《阿房宫赋》的“大半是论体”即是后者的揭橥。

宋赋的尚理又显而易见地超过了唐代,达到了非常突出的地步。其律体由于历朝皇帝的亲自倡导而最终导致“专尚理趣”(李调元《赋话》),不仅题多撮自经文,而且“以策论手段施之帖括”,直“以议论胜人”(同上);其文体也浸淫滋蔓,既有体物、抒情、说理三者并施之作,又有通篇议论有如疏策之构。说理一时成了赋体作品的主要崇尚对象。据魏泰《东轩笔录》载,早在宋太宗淳化年间,太宗以为“比来举子浮薄不求义理,务以敏速相尚”,故从《庄子·寓言》中取出“卮言日出”四字为赋试题,“使研穷意义,庶浇薄之风可渐革”。另据欧阳修《归田录》所记,宋真宗在以文取士时,除“必视其器识”外,还“或取其所试文辞有理趣者”。这就对律赋尚理倾向的发展起了极大的鼓励作用。不仅如此,宋景德二年(1005)御试《天道犹张弓赋》,“以正经命题”;至景祐元年(1034),更“始诏御药院御试日,进士题目具经史所出”(见《放翁题跋》)。因此宋代所试律赋,多以经史语命题,使尚理之风得以相扇而炽。如宋代律赋中,《天道益谦》本自《周易》,《铸鼎象物》出于《左传》,《司空掌舆地之图》取诸《周礼》,《天子之堂九尺》摘自《礼记》,《严父莫大于配天》题本《孝经》,《闵雨有志于民》出于《谷梁》,……这些只是宋代历年进士试赋中题取正经的极少部分,至于取史书及子书语为题者,更比比皆是。其中绝大部分作品都以说理透彻、议论剀切重于时。宋初律赋虽被指为犹存唐贤矩矱,然已有范仲淹《金在鎔》、《用天下心为心》、《铸剑戟为农器》、《天道益谦》,张咏《声赋》诸作,以善运经子、议论明切和“豪迈有理致”(《儒林公议》)为世推崇。至被王铎、李调元等

人称作转变风气的宋庠、宋祁兄弟,则“一变山川草木、人情物态,归于礼乐刑政,典章文物,发为朝廷气象”(王铎《四六话》序),以至使宋代律赋自“天圣、明道以来,专尚理趣”(李调元《赋话》),说理由此堂而皇之地成了律赋创作的主要手段。其后欧阳修、苏轼又以一代文学宗匠的身份,作有大量以议论见长的律赋,从而更加巩固了说理在宋赋中的地位。欧公省试《司空掌舆地之图赋》,以满场举子中独得主司晏殊之意而名列榜元(《默记》);殿试《藏珠于渊赋》又因“疏畅之中,时露剀切”而为人所称(《赋话》)。它如《鲁乘周礼所以本》、《畏天者保其国》等赋,也议论清切,不事藻绘,以至被李调元目为“制诰体”而“未敢为法”。东坡于嘉祐二年(1057)试考官欧阳修所出《通其变使民不倦赋》,深得赏识。此赋与他的《三法求民情》、《六事廉为本》二赋均“以策论手段施之帖括,纵横排奰,仍以议论胜人”,而《浊醪有妙理赋》“通篇豪爽,而有隽致”、《明君可与为忠言赋》“横说竖说,透快绝伦,抵一篇史论”(《赋话》),皆为擅场之作。南宋律赋大多湮没无闻,然从由北入南的李纲“律赋专仿坡公”,以及一些笔记杂录中散见的律赋试题如《天子以德为车》、《贤人国家之利器》等名来看,律赋的说理倾向仍有增无减。

与宋赋律体的尚理相适应,宋代文赋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沾上了这种与赋的传统手法不同的习气。以往论者大多以为宋代文赋的尚理沿自杜牧《阿房》所倡之体,如祝尧就说“宋朝诸家之赋,大抵皆用此格”(《古赋辨体》),从体式特点的传承来看,这个看法并不错,但不全面。因为任何一种文体的某些风格特点的形成,固然有赖于前代同类作品的影响,可是它形成的同时期的各种因素往往起着更为直捷的作用。对于宋代文赋尚理倾向的形成和发展来说,当时整个赋坛乃至包括诗文创作为在内的整个文坛的普遍风尚则是最为主要的。而这一点过去是往往被忽视的。不难看到,宋代文赋“以论理为体”的最典型的作家,恰恰同时又是在律赋和诗文创作为中崇尚理趣的高手。欧阳修的《秋声》与苏轼的《赤壁》,向被视为宋代文赋的杰构,是文赋尚理的代表,然而正是这两位大家不仅在赋的以文为体的创作中运用了这一手段,而且更在律赋、诗歌以及散文创作中大量说理,直接议论,他们所作的文赋,不过仅仅是品类繁多的创作体式中的一种。

而已。其实，就宋代文赋的尚理程度而言，尽管两者都有对人生意义探讨究寻的哲理，但它们远非“专尚于理”，也并未“略于辞”。在这方面走得更远的是邵雍和陆游。邵雍《洛阳怀古赋》一反以往描写都邑大赋的常态，通篇议政得失，仅以洛阳帝王之居作陪衬，俨然一篇疏奏；陆游《丰城剑赋》驳张华、雷焕剑气干天之说，设论辨难，无异翻案文字。二赋可视为宋赋文体尚理的极则。

用赋来说理，发表议论，原不自唐宋始。汉代大赋“曲终奏雅”，即于大肆铺张之后，以议论收结振起全文，而扬雄的《长杨赋》则“纯用议论说理”（《古赋辨体》），指出成帝不顾农时、荒于政事，沉溺于猎取捕获的危害。然而魏晋以降，文学创作中虽有以说理为主的玄言诗出现，赋却未受波及，继续沿着体物、抒情一路发展，少有说理之作。为什么时至唐、宋，说理又重新闯入并占据了赋坛呢？寻其究竟，大约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帝王利用仕途的进退加以有意的提倡，这种情况直接表现于对律赋的命题和评价中。正如上文所言，唐代贞元末高郢知贡举用经艺为进退，开成元年文宗自出试题以纠文格之非，对律赋的尚理都是一种有意识的引导。而宋太宗命题的故出渊奥，也是为了革除以往的“浇薄之风”；宋真宗的“取其所试文辞有理趣者”，更以自己的偏好对律赋的尚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下诏定进士试题均须出经史，则进一步从制度上保证了这种倾向的继续发展。这些现象不仅对赋的创作倾向有着重大的导向意义，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也是宋代包括诗文创作为在内的整个文坛的尚理重理的一种诱发因素。二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重大影响。在唐代韩、柳提倡古文的种种主张中，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是反对六朝浮靡文风的一面大旗。而他们所谓的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韩愈《重答张籍书》）。到了宋代欧阳修领导新古文运动，也提出了“师经”和“道纯”的问题（见《答祖择之书》）。显然，唐宋古文运动的这种努力与唐文宗、宋太宗和宋真宗等皇帝以经史命题试进士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在提倡文章要解说、阐述儒家经义方面殊途同归，成了推动唐宋赋说理倾向不断加强的双重力量。而且宋代古文运动对道的认识还包括了文章的社会功用，孙复所谓文章要“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洞书》），更在理论上为杜牧赋的论秦亡

之由、邵雍赋的述天下之弊的必要作了论证。同时，唐宋古文家都提倡师法先秦两汉作家，而先秦盛行和著名的文章大都以说理见长，这就在无形中使说理议论的传统得以继承并发扬。这种迹象在唐宋文赋中表露得十分明显。杜牧《河房宫》所谓“族秦者，秦也”；欧阳修《秋声》径取《礼记》等书中语，论秋为刑官、兵象、主西方之音；苏轼《赤壁》则大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庄子·齐物论》中的道理；黄庭坚《枯木道士》亦“深得《庄》《列》旨趣”（刘勰《隐居通议》）。三是文学创作本身规律的作用，就赋而言，先秦两汉以体物为主要手段，描摹形态、刻画声色的技巧得以充分的发展；魏晋六朝则渐转入抒情，传写情感、吐露心曲的方法也日臻成熟，从而出现了一大批体物抒情兼施并用的佳作；时至唐、宋，赋的艺术手段在前人的基础上要有所增加，风格要有所创新，在客观上当时可走的，仅留下了说理这一路。所以文学创作发展的本身，也向唐宋赋家指出了这一条道路。同时，这种倾向的形成和发展在与赋体的变革上，也呈现出一种吻合的轨迹。这就是赋体形式的散文化有利于内容的说理议论，而说理议论的内容加入也促使赋体形式的散文化。因此唐宋文赋的出现，一开始就具有内容说理、形式散化的双重特征，而形式散化的结果，也必然推动内容说理的增生。就唐宋整个文坛而言，说理也是一股方兴未艾的力量。前文已有所言，议论文在唐宋古文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宋诗一变唐诗的轻盈飘逸，说理议论在所可见。在这种风尚中，赋的创作自然难以不受浸染。

对于唐宋赋的尚理倾向，论者大多取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说理议论作为一种创作手段是散文的专利，不该闯入以体物写志为特色的赋的世袭领地，赋尚说理，必然会减弱、抵销它原有的在体物和抒情方面的独特功能。祝尧在论述宋代文体赋时指出，“至于赋，若以文体为之，则专尚理而遂略于辞、昧于情矣。俳、律卑浅固可去，议论俊发亦可尚，而风之优柔、比兴之假托、雅颂之形容，皆不复兼矣。非特此也，赋之本义，当直述其事，何尝专以论理为体邪？”（《古赋辨体》）李调元论宋代律体赋也说，“天圣、明道以来，专尚理趣，文采不赡。衷诸两制之旨，固当俯让唐贤”，“永叔而降，皆横骛别趋，而循唐人之规矩者矣”（《赋话》）。综括前人对唐宋赋尚理倾向

的不满，大略有这样几点：一、违背了赋的传统手法；二、助长了赋体的散文化；三、偏离了赋一向讲究文采的特性。这三点又集中地反映了一个应如何看待赋的创作在唐宋时所出现的这种新变的问题。其实前人提出所谓“唐无赋”（李梦阳《潜虬山人记》）、“唐以后无赋”（程廷祚《骚赋论》），关键也在于此。

如前所言，赋在战国末期诞生之后，经过秦汉、魏晋和六朝近千年的发展，不仅体式迭变，而且体物、抒情等主要艺术手法也日臻成熟和完备。在此情况下，赋如何再向前发展？我们看到，唐宋时出现的赋的尚理倾向，正是赋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学环境中谋求进一步发展的标志；因此它在吸取当时高度发展了的散文创作的某些重要手段的同时，呈现出对固有传统的偏离和改变，完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况且从创作的实践来看，赋在体物、抒情的基础上引入说理，也并没有改变赋的铺陈特点，相反却为铺陈增添了一种新的手段，从而使赋在表现手段上变得更加丰富多采，不拘一格。作为一种表现手段，说理与体物和抒情也并不相互矛盾和排斥。且不说在唐宋的诗、文作品中，这三种手段早已彼此配合，共同使用，即使历史上论体与赋体之间也存在许多可通之处。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谓“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其“弥纶群言”即类似于赋的多方铺陈，而“研精一理”又略同于赋的“曲终而奏雅”。因此，在赋的创作中引入说理的手段，原是有条件和有可能的事。

自然，在以形象思维为特征的文学创作中过多地说理，必然会影响它本质功能的独特效应，降低它的艺术性。在这一点上，祝尧和李调元的意见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怎样把握尺度，既不因为赋注重体物和抒情而排拒说理，同时也不因为崇尚说理而忽视赋的文学特性。这个尺度不独横在历代论者的面前，同样也是当时的赋作家们所无法回避的。今天我们看他们的作品，即是他们对此作出的回答。以杜牧、欧阳修和苏轼的文赋名作而论，它们都兼具体物、抒情和说理之妙，达到了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尤其是欧阳修

的《秋声》和苏轼的《赤壁》，既有对自然景观物的精湛描写。有作家触物即景时的情感抒发，同时又有对人生意义、对时光流逝的富有哲理的阐述和议论。在这里优美感人的景色是触发人物感情的契机，而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与思考则成了感秋伤时情怀的理性升华，使人读后能在领略自然景观物的情韵、感受作家情感的同时，获得一种意义隽永的哲理性的启迪。而这后一点往往是以往赋作在散发其艺术效应时所不具备的。这类作品给人以感官和精神多方面的享受，怎么能说它们“风之优柔、比兴之假托，雅颂之形容，皆不复兼矣”呢？然而如果以邵雍《洛阳怀古》和陆游《丰城剑》诸赋而论，它们确实“专尚于理而遂略于辞、昧于情”，前者论为政得失，举凡德、政、力、随宽、明察、水旱六事，言辞朴实，类于政论；后者辨疑析难，也无文学性可言。可见赋之是否能保持它固有的艺术特质，关键并不在于是否运用说理这种表现手段，而是在于运用时必须掌握一定的分寸。如果运用适当，说理无疑能成为赋在铺陈时的一个重要手段。增加作品在思想理性方面的意蕴；但反之，它也可能成为一种损害文学作品艺术性的因素，最终导致抹煞实用文章与文学创作之间的本质区别。因此，不作分析地一概否认说理在唐宋赋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凡是说理必然会损害赋的文学性的见解，是片面的。

综上所述，说理继体物、抒情之后逐渐成为赋的一种主要表现手段的过程，与唐宋时代的试赋情况、古文运动和整个文坛风气的演变呈同步进行的势态。它对赋的传统手法和形式都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冲击。引起了持旧守陈的论者的不满。然而从创作实践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它沟通了诗、文和赋之间的创作手段，在创作中显现出思想和艺术方面更大的蕴含，是一次有意义、有成果的尝试；尽管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一些难以避免的失败。

作者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斯翰

## 江淹才尽与永明文风的关系

周 锋

最早记载江淹才尽的是梁代钟嵘的《诗品》。《诗品》记了这么一个传说：“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南史》也记载了这一传说，并有另一种传说：“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患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顿矣。”《梁书·江淹传》也称“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时人皆谓之才尽。”可见早在江淹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他晚年才尽的说法了。

江淹的才尽据钟嵘记载是“罢宣城郡”后，《南史》也这么说。据《梁书》的记载，江淹于齐明帝建武元年出为宣城太守，四年自宣城还为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照这么说，江淹才尽是建武四年以后的事了。但钟嵘评沈约时说“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逝，江淹才尽”，曹道衡先生据此推断江淹才尽是永明中的事，因为才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他在永明中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到罢宣城郡后则彻底才尽了。①这个结论是可信的。

江淹才尽是当时人就普遍持有的观点，才尽的年代也大致可以确定。但才尽的原因是什么呢？

明代王世贞对于江淹的才尽有过一段论述：“文通裂锦还笔入梦以来，便无佳句，人谓之才尽，鲍照亦谓才尽，殆非也。昔人闻歌渭城甚佳，质明述之，乃一小民佣酒馆者。捐百缗予使鬻酒，久之不复能歌渭城矣。近一江右贵人，

强仕之始，诗颇清淡。既涉贵显，虽篇什日繁，而恶道全出。人怪其故，予曰：此不能歌渭城也。”②清姚鼐也说：“江诗之佳，实在宋齐之间，仕宦未盛之时。及名位益登，尘务经心，清思旋乏，岂才尽之过哉。”③两人对于江淹才尽的原因作了探讨，认为是因为社会地位的变化导致了文学创作走了下坡路。这样分析结合了他的生平经历，因而显得言之有据。在《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江淹评传》（曹道衡作）中更进一步提出江淹的才尽恐怕与当时文风的变化也有关系，因为江淹才尽在永明中，而此时正是永明体兴起的时候。我认为这种看法很有道理。只是曹先生在那篇文章中未展开论述。

江淹才尽同他的生平经历和一贯的人生观有关，但也不仅仅同这些因素有关。一个作家创作成就自然要受到他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很大影响，但人生活在社会中不是孤立的，尤其是江淹这样一度较活跃的文人，他的创作还无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文学风气的影响，当时文学风气对于作家的评价也同样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有时甚至会决定一个作家在当时文学界的地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陶渊明就是著名的一例。陶诗在当时的诗歌创作界是很与众不同的，和当时的潮流有些不合。因此，在当时不受人重视。他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变迁，正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风气转变的结果。从这方面说，江淹虽被史家看作是齐梁诗人中成就最高的代表之一，在以后某些文人看来甚至是这一时期第一流的诗人，但在当时却不见得如何受人推崇，晚年还被认为才尽，这恐怕同当时文学创作风气和批评标准的转变确实有关。他的才尽，可能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生活与人生观的缘故。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状况大致说来是渐趋华美。文学的形式技巧随着时代的推移而越来越讲究。正如刘勰所说的，“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sup>④</sup>晋宋以后文学创作包括诗歌创作风气确实有所变化。裴子野曾在《雕虫论》中指出宋明帝博好文章，“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嫫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而无功，无被乎管弦，非止乎礼义。”<sup>⑤</sup>他对宋末以来文坛上出现的这种现象颇为不满。据史书记载：裴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靡丽，制多法古，与今文体异”。<sup>⑥</sup>所谓“今文体”即指齐梁时代华丽的文风。对于裴子野的文学观和创作实践，梁代萧纲是很不满的。他批评裴子野“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sup>⑦</sup>这种文学观上的对立究竟是谁非难以一概而论，本文不作专门讨论。这准要说明的是，《雕虫论》是《宋略》中的文字，《宋略》作于南齐末，<sup>⑧</sup>裴子野所指责的那种文学风气自然在南齐时就已存在，到梁代萧纲时影响就更大了。这种风气是从宋末开始逐渐萌芽的，到南齐末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了，此时整个文学界的风气。文学作品的总体风貌同以前的文学相比已有了不小的差别了，因此才会有所谓“今”与“古”的不同，有“制多法古，与今文体异”的说法。而所谓古，即指汉魏晋，所谓今，则指绮丽文风大为盛行的齐梁时代，宋末齐初正是这种“古”与“今”交替的时期。

较为古奥的文风向新丽的今文转变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即是永明声律论的出现。随着声律论的出现，诗歌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声律论的倡导者不是别人，正是沈约等人。

《南史·陆厥传》：“（永明）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微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诗品序》云：“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惟颜延之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辨，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虽

然钟嵘论及声律论时持否定态度，但也可见声律论在当时影响极大。《南史·庾肩吾传》也说：“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逾往时。”可见其风至梁仍很兴盛。

陈寅恪先生认为四声说的发明同当时转读佛经之声有关。四声说出现在永明年间，沈约、周颙等人以前则已经有许多人对此很有研究了。只是到了永明年间经沈约等人进一步归纳总结而最终成立。<sup>⑨</sup>看来，永明声律论并不是沈约等人的独得之秘，而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总结整理，不过，在文学创作上有意识地依据四声法则来进行创作这也不能不说是沈约等人大力提倡的结果。

声律论的积极倡导与实践者、永明体的作家们在当时几乎都是齐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学士。《南史·齐武帝诸子传》说：“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梁书·武帝纪》说：“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这就是著名的竟陵八友，声律论的倡导者大多在其中。他们在当时文学界影响很大，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永明体诗歌在诗坛上风行起来了。诗歌创作自此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诗歌批评也出现了新的动向。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闾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虽然永明以前文论中也有论及创作语言的宫商清浊之类的音韵问题的，如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但到了永明声律论出现以后，永明体诗人们才真正用当时出现的四声理论来衡量作家作品。在沈约看来，前人的一些优秀诗篇即使在音律上符合他们提出的音律法则也纯属偶然，不是有意识追求的结果。这里也可见沈约等永明声律论的提倡者对此颇为自负的态度。他在这里已经在用四声法则来评判前人的作品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在他自己看来是部指导写作的著作，当然在今天看来更是一部批评方面的巨著。在这部书中有专门的《声律》篇讨论声律问题，其中对于声律的态度也大致和沈约等人的观点差不多。于此可见声律论在当时确实已

经被不少文人接受并用于创作和批评中去了。象梁武帝萧衍那样不识四声、象钟嵘那样对声律说持否定态度的作家、批评家恐怕已不多。

永明声律论的出现使诗歌的形式、技巧、体制方面同前代相比有了些不同，因此对于诗歌的批评标准也相应会有变化。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已经在用四声法则来评价前人的作品了，如果说前人尚未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还能宽容，还能以此来说明是自己“独得之秘”，那么到四声法则已经建立起来、永明体诗开始盛行的时候，如依然不遵用声律论，他就肯定得不到沈约的赞赏了。永明体诗人把声律论看作是创作的一个重要条件，所谓“妙达此旨，始可言文”。由于沈约等永明体诗人在当时文坛上享有较高的地位，因此他们对于创作的主张也必然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风气与批评标准往往和这个时期在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作家的文学好尚有密切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文坛领袖和以他们为首的文人集团的作用往往很大。他们的文学主张常常左右着文学发展的方向。这种作用在建安文学中就很明显，齐永明时，竟陵王萧子良周围聚集着大批文士，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文人集团，而其中的沈约、任昉、王融、谢朓又是这批文士中最得宠的文人，他们在当时都有较高的地位，又都重视声律论，因此，他们的一些文学主张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整个诗歌创作中的潮流。

从史书的记载看，沈约、任昉是很乐意奖掖后进的。据《梁书·刘勰传》，刘勰写成《文心雕龙》后，“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结果得到沈约的赞赏。另据《梁书·钟嵘传》，钟嵘也“尝求誉于沈约”，虽然未能如愿，但也可见沈约在一般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并且有相当的权威性。任昉也是如此。《南史·任昉传》说“一代辞宗”沈约对他很钦佩，而“昉好交结，奖进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称述，得其延誉者多见升擢，故衣冠贵游莫不多与交好，坐上客恒有数十。”《南史·到溉传》：“（任昉）为御史中丞，后进皆宗之，时有彭城刘孝绰、刘苞、刘孺，吴郡陆倕，张率，陈郡殷芸，沛国刘显及溉、洽，车轨日至，号曰兰台聚。”《南史·裴子野传》：“乐安任昉有盛名，为后进所慕，游其门者昉必推荐。子野于昉为从表弟，独不至，昉亦恨焉，故不之善。”《南史·陆倕

传》：“及昉为中丞，譬据辐辳。预其宴者，殷芸、到溉、刘苞、刘孺、刘显、刘孝绰及倕而已，号曰龙门游，虽贵公子孙不得预也。”六朝时代，名位高的人对于名位低的人的一两句表示赞赏的话很可能使此人身价陡增，这也是汉末以来人物品评风气的继续。对于一个文人的文学才能的评价也是当时人物品评的一个重要方面。况且齐梁君主宗室爱好文学的颇多，许多人大力提倡文学。身居要职的官僚也有不少是文人，因此评论后进之士时自然注意他们的文学才能，《诗品序》说当时的“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这正可说明这点。正因为这样，那些游于贵显者之门的人也就必然要迎合他们所投靠的人的文学好尚，以博取他们的好评。游于沈约、任昉门下的文人大多为他们所推荐，这就必然使当时文学界的创作风气与批评标准以沈约等人的主张为正宗了。这种现象对于当时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巨大影响不可忽视。当时文坛上曾有“任笔沈诗”之说。<sup>⑩</sup>不仅南方如此，即如北方文学界也极推崇沈、任二位。颜之推记载：“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宴，辞色以之，鄙下纷纭，各有朋党。”<sup>⑪</sup>可见沈约与任昉声名之显赫，几乎左右了当时的整个文坛。虽然最终形成这么大的声势时已是入梁以后了，但应该说早在齐永明中年就已经有这种趋势了，沈约、任昉的文学地位恐怕还是在竟陵王开西邸时奠定的，而那时正是声律说发明的时候。

我们分析了沈约和任昉之所以为人推崇的原因后，再来看看江淹的情况。江淹的政治地位也很高，但却远不如沈约和任昉在文坛上影响大。这恐怕与江淹同他们在文学风格上有差别有关，这种差别不是一般的差别，而是在当时文学风气转变的情况下，在文学好尚、文学趣味方面的差别。沈约、任昉等人的风格也有不同，但这种不同和江淹与他们的不同又有些不一样，沈、任二位应该说在文学主张、文学好尚方面是大致相同的，他们的风格都代表着齐梁时代的某种文学倾向。他们也凭着政治上的地位来扩大自己在文学领域内的影响，并逐步取得了文坛领袖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又自然而然地使他们的文学主张成了文学主张的正宗，并引导了文学发展的潮流。而江淹则不同，他是个“重以学不为人，交不苟合”<sup>⑫</sup>的人，从史传来看，他的交游也远不

及沈约和任昉，也不见他举荐过什么人，只是称赏过刘昭、谢览、谢举。<sup>⑩</sup>竟陵王萧子良大集文士时也不见记载江淹曾参与过西邸学士的文学活动，这就和沈约等很不同了。所以，当时的文学之士恐怕更乐意交接沈约、任昉，而对于江淹，人们也就不那么重视了。再加上他的风格特征更接近于元嘉时期的风格，同魏晋作家有时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而同沈约等永明体诗人的风格有些不同。如果说他以前受人称赏是因为还没有出现声律说，文学风气同元嘉时期差别不大的话，那么永明中年沈约等永明体诗人提倡声律论，使文学风气转变以后，人们不再欣赏他原有的风格，加上他也没有利用政治地位来扩大自己的文学影响，故相对说来不为人重视，甚至于被讥为“才尽”了。

在现存江淹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风格同后来齐梁以后的诗歌有不一样的地方。清冯班说：“齐时江文通诗不用声病，梁武帝不知四声，其诗仍是太康、元嘉旧体。”<sup>⑪</sup>清乔亿也说：“萧梁一代，新城公谓江淹、何逊足为两雄，以余观之，文通格调尚古，仲言音韵似律，未宜并论也。”<sup>⑫</sup>这都是颇有见地的。江淹虽然是生活在齐梁时代的诗人，一般也把他看作是齐梁诗人，但他诗歌的风格和大多数齐梁诗人风格不同，例如沈约，他的风格就近于齐梁时代的轻靡华艳的风格，而且是声律论的倡导者。江淹虽然也有清丽的特点，但和齐梁时许多诗人的华丽又有不同，他更接近于晋宋时期的文学风格。另外，史书中未见记载江淹和声律论有什么关系，声律论在当时文坛上也是件大事，影响很大，而江淹却从未有过赞赏声律论的言论，创作也不依声律法则，这是耐人寻味的事。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推测，江淹永明以后被认为才尽恐怕同声律论的出现和兴盛有关。

江淹擅长的风格同永明体诗歌风格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声律论大行于世的时候，他的这种风格完全可能被认为不合潮流。江淹对此持什么态度已不得而知。据《隋书·经籍志》，江淹的集子在当时有两种，一种是前集，另一种是后集。现存《江文通集》中多数诗歌作于宋末齐初，因此现存集子可能主要是前集。永明以后的诗作可能收在后集中。《江文通后集》在《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中都有著录，但以后就不见著录，失传了。所以江淹永明

以后所作的诗歌究竟如何难说。可能他也有意无意地迎合当时的风气，改变固有的风格与擅长的题材，但这决非易事，因而可能在创作上陷入困境，“为诗不复成语”、“绝无美句”、被人认为“才尽”；也可能不满于当时的风气，不愿迎合，再加上晚年地位、环境的变化已经使他心满意足，不再有所追求，创作上不如早年那样“精意苦力”了，于是也不免被认为“才尽”。由于江淹后期诗歌作品大多数没有留传下来，因此这两种可能都只是推测。但不管事实上属于哪一种情况，他被认为才尽应同永明声律论的出现、当时文学风气的转变有关。

江淹诗歌作品的风格同齐梁时诗歌创作渐趋华靡，竭力追求声律的诗风有一定距离，而在诗歌题材、表现的内容方面，江淹诗歌也有着和不少齐梁诗不同的地方，这也会影响当时人对他的评价。

魏晋时期，甚至宋初，文人诗歌大多数还是较为典雅正统的，文人气息较浓厚。但东晋开始，由于政治、社会等多种原因，士大夫中间逐渐弥漫着一种享乐的风气，统治阶级比以往更加追求声色的满足，并且把文学也当作了追求声色之娱的重要工具。这时期，原先在民间流行的一些乐府民歌得到了统治阶级上层人士的认可与爱好。乐府中的一些大胆的男女情爱的内容引起了文人的兴趣。结果东晋、宋、齐、梁、陈几代文人越来越多地摹仿民间乐府，创作了不少文人乐府，这正是这种享乐风气在文学领域中的一个反映。这种风气的发展结果，是使诗歌作品由原来的较为典雅趋向于轻艳。这不仅是指风格，内容、题材也是如此。宋末文人创作这类作品已有不少，可见宋末已经预示了文学风气的即将转变。《诗品》曾云：“余从祖正员尝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所谓“美文”即指较为绮丽新变的作品，而且似乎也主要就形式技巧而言，虽说这类美文已经引起不少人爱好，但并未控制整个文坛。当时颜延之就对鲍照、汤惠休作品较多地吸收民间作品的特点的做法不满，颜延之与谢灵运在当时号称“江左第一”，影响自然要比鲍照，汤惠休大些。而且鲍照虽然被当时人看作是美文的代表，但这毕竟是指他的部分诗作，且他的美文比起齐梁以后的绮丽文风要刚健得多了。

如果说刘宋时鲍照的美文基本上还只是形

式、技巧上的新变为主的话，那么到齐永明以后，诗歌除了声律辞藻等形式方面更趋精致外，在所表达的情，即题材与内容方面则渐渐流入轻艳了。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已经对谢灵运为代表的雅正的诗歌风格有所不满，称之为“典正可采，酷不入情”，发展到极点，便是梁朝以萧纲为代表的宫体诗的出现。当然，宫体诗在内容上也并非都是轻艳的，不过不少宫体诗在题材、内容上确实显得脂粉气浓厚，这在当时也是极普遍的现象。而在齐梁以前的诗歌中则即使有也只是少数，并没有形成一时兴盛的局面。事实上，诗歌题材、内容趋于轻艳早在永明时就已开始了，沈约、谢朓等永明诗人写的一些诗在内容情感方面缠绵柔弱，香艳气息较浓，开了宫体诗的先河。如沈约的《十咏》、谢朓的一些咏物诗，这种内容题材上的新变同追求声律是一致的。至于宫体诗是否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这里只是要说明，齐梁时代大多数文人的诗歌作品在题材、内容上同汉魏晋宋时的大多数文人诗歌和作品已有很大的不同了。齐梁时期具有香艳意味的诗歌作品在整个诗歌创作中所占的比重已大大超过了前代，在诗歌情感方面和以前相比，男女艳情更多了，描写方面也更细致、浅露，脂粉气更足。

在时代风气影响下诗歌题材、内容上的变化对于江淹也不会没有一点影响。江淹卒于天监四年，宫体之名此时尚未出现。但宫体的滥觞早在永明诗人的诗中就已存在了。沈约、谢朓写过些颇具宫体意味的诗，这些诗在梁代徐陵编的《玉台新咏》中可以看到。《玉台新咏》收沈、谢二位的诗数量不少，而江淹的则少得多，仅四首。而且这四首也全部是《杂体诗》三十首中的作品，也就是说，这四首诗的风格、题材、内容都不是江淹自己的，而且这四首也不过是“词关闺闼”而已，和宫体诗是不同的。另外，明刊本《玉台新咏》中另有江淹诗四首，宋本中没有，可能是明人增加进去的，不是《玉台新咏》的原貌。这新增的四首中，《潘黄门述哀》也是《杂体诗》中的作品，当然也不代表江淹的风格。《西洲曲》是否是江淹作品也可疑。余下二首也见于明刻《江淹集》，宋刻中没有，即使真是江淹作品，也不算轻艳。由此看来，江淹诗歌在体制、风格、题材、内容方面基本上仍属元嘉旧体，同齐梁时期大多数诗歌作品风貌不同，他的诗最擅长的是抒发个

人情感，抒发仕途不如意引起的哀怨愁苦心情。而齐梁时许多诗人除了也写这类题材的作品之外，还热衷于写些抒写男女艳情的诗，风格上也显得柔靡。江淹在写男女之情方面恐怕也不是不能写，他的一些抒情赋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江淹涉及这类题材时表现出的文学趣味与宫体诗和艳诗有所不同，后者常常香艳气息浓厚，比较柔靡甚至萎靡不振，江淹则多少带有些太康、元嘉诗歌的特征，注重的情也是怨情，而不是艳情。

王夫之在评选古诗时说江淹当时“了无知己”，“前有任笔沈诗之俗誉，后有宫体之陋习，故或谓之才尽，彼自不屑尽其才，才岂尽哉？”这种观点注意到了文学风气和江淹才尽的关系，尽管断定江淹“不屑尽其才”并无充足证据，但江淹不管当时持什么态度，他的风格不同于当时流行的风气，这是事实，所以他的才尽不管是由于别人的贬低还是确实如此，总之同当时文学风气的转变有关。

- ① 详见曹道衡《江淹及其作品》、《论江淹诗歌的几个问题》（《中古文学史论文集》）
- ② 《艺苑卮言》卷八
- ③ 《惜抱轩笔记》卷八
- ④ 《文心雕龙·通变》
- ⑤ 《全梁文》卷五十三
- ⑥ 《南史·裴子野传》
- ⑦ 《与湘东王书》（《梁书》卷四十九）
- ⑧ 林田慎之助《裴子野〈雕虫论〉考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六辑）。《建康实录》卷十四也载裴子野自称齐末作《宋略》。
- ⑨ 陈寅恪《四声三问》（《金明馆丛稿初编》）
- ⑩ 《南史·任昉传》
- ⑪ 《颜氏家训·文章》
- ⑫ 《自序传》
- ⑬ 《南史·文学传》、《南史·谢举传》
- ⑭ 吴乔《围炉诗话》卷二引
- ⑮ 《剑溪说诗》卷上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斯翰

# 开拓市场 走出困境 步上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台阶

——广东台山县机械厂的经营之道

本刊记者 湛 明

台山县机械厂是广东省机械行业目前最令人瞩目的出口重点企业之一，在1989年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全省许多工业企业资金短缺，成本上升，加上市场疲软，导致了产品大量积压，而不得不放慢生产速度，甚至停产或半停产。但该厂却异军突起，克服重重困难，渡过难关，走出困境，使企业生产突飞猛进，一跃而成为全省出口创汇的重点企业。1989年，该厂八大类产品中有五大类获得增产或大增产。全年工业总产值达3988.88万元，完成该年国家计划的159%；产品销售3750万元，完成计划的179%；实现利税总额达891万元，完成计划的163%；出口创汇803万美元，完成计划的303%以上。事实证明，他们的探索是成功的。归纳起来，其突出的经营之道是：

## 一、重视拓展市场，加速开发， 搞活营销

在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智慧与信息是发展企业生产经营的桥梁。1989年，该厂就是借助这座桥梁，渡过了严峻的经济

难关。首先，他们注重和加强了对市场的调查和预测，转变和调整营销策略，建立多层次的销售渠道，树立全方位的市场观念，通过拓展市场，带动生产的发展，使生产适应市场供求关系及其变化的环境。例如：在对内销产品方面，及时调整了生产结构，狠抓了畅销产品的增产措施，而且始终保持“货如轮转”产销平衡。据1989年11月份统计，其主要产品之一钢瓶生产了66189个，而同期销售了68348个。销售额占全厂销售收入的33%。其次，对受到市场疲软影响的产品，他们则根据市场供求环境，采取相应的缓产措施，以求达到既保证和满足每个用户的需求，又不致于造成库存积压的目的。例如受冲击较大的印刷机械，到1989年11月统计，共生产了384台，而同期销售了394台。由此，使全厂1989年年底库存产品比年初库存减少了70%，为顺利跨进1990年奠定了基础。

在开拓搞活国内市场的同时，他们也十分重视国际市场。1989年国内市场相对疲弱，但国际市场则比较稳定，自从开拓国际市场后，该厂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



景象。在切实巩固、提高原有产品的基础上，他们加速新产品的开发，经过全厂上下的不懈努力，1989年又成功地推出了4个新产品。使出口滚轮卧式千斤顶增加到8个规格品种系列。新产品的产值达到350万元。产品销售市场，由1988年的18个扩大到24个国家和地区。全年出口产品产值2844万元，占全厂总产值的71.29%。

## 二、重视质量，不断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

市场的优势，最终是产品的优势，提高产品质量，以优质取胜赢得市场是台山机械厂的经营之道之一。1989年，全厂把改进和提高产品质量作为优化产品结构的突破口。从组织机构上进行调整和加强，全厂专职质量管理人员，由原来的34人增加到44人，其中，获得技术职称的人员也由原来的18%提高到55%；在制度、检测手段、措施上，他们切实加强进厂原材料和外协扩散件的质量管理，严格“三检”责任制，积极开展科研攻关，狠抓铸造、焊接、热处理等工艺“突破口”，从而进一步稳定和提高了产品质量。如液化石油气钢瓶，继1988年获得全省行业质量评比第一名之后，1989年又被评升为广东省优质产品。从此，迅速扭转了曾一度出现的销售逆向的局面，使产品在激烈的竞争中，打入了全省38家石油公司或煤气供应站。又如：滚轮卧式液压千斤顶，继1988年经省级鉴定获得一致合格后，1989年5月，又经西德TUV检测中心的复检认证，使之成为目前全国行业中产量最大，出口量最多，并在国际市场上享受到优质优价待遇的名牌产品。

他们在把质量当作企业生命的同时，

又把降耗当作企业的活力。几年来，他们大力开展双增双节活动，降低生产成本。从零件的设计，原材料的采购，到开料切割和加工，都认真进行择优，做到能省的则省，能代的则代，能小的则小。经过反复的摸索和改革，使各项物耗水平均低于全国同行业水平，企业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基本扭转了出口产品亏损的现象。

## 三、重视合同，讲究信用

这是该厂取得成功的经验之一。他们近年来的生产经营，之所以能年年取得新的突破，主要途径就是开拓了国际市场，在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除了树立“优、新、高”的产品形象外，最主要的就是“重合同、守信用”。几年来，尤其是1989年，他们均处于超负荷生产的状态，该厂在技术、管理和物质上，均未达到规模批量生产的配套条件，但为了履行合同，他们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人力、物力全力以赴生产。做到有车来就有货交，而且交好、交足。1987、1988两年，该厂已获得县政府授予的“重合同、守信用”的先进单位称号，1989年的全年出口产品成交额，均没有耽误过一次合同规定的车船期，得到了外商的高度评价。

## 四、强化技术改造，加强管理，提高效益

凡发展出口产品生产，都必须具备大批量、高效率的技术条件。为了加速改变本厂“作坊式”的生产现状，他们眼睛向内，强化各项管理，大力开展“双革双新”，提高企业的技术素质。前两年，尽管困难

(下转第84页)

## 从董仲舒在胶西的年代看元朔五年对策说

于传波

董仲舒的对策年代是一个关系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怎样搞起来的大问题，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传统的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对策说认为，是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我曾论证董仲舒对策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sup>①</sup>证明他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始人。后来一些学者也著文反对建元元年对策说。苏诚鉴反对建元元年对策说，提出了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对策说。<sup>②</sup>这里谈一下我对元朔五年对策说的看法。

### 一

要弄清董仲舒是否在元朔五年对策，只要弄清董仲舒出任胶西相的时间及退休的时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董仲舒是哪一年任胶西相的呢？《史记·儒林列传》讲：“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于是董仲舒被赶到胶西去了。这段话告诉我们：董仲舒被赶到胶西的原因是指责升为公卿的公孙弘“从谀”；指责“从谀”的原因是公孙弘没有

按《春秋》的旨义反对外攘四夷，而是顺应皇帝，阿主求升；时间特点：一是“是时方外攘四夷”；二是公孙弘升为公卿。我们要寻求董仲舒到胶西的年代，只要找出这两条时间资料的共同交点就可以了。“外攘四夷”一语，在整部《史记》里只用了一次。是在严格和准确意义上使用的，即指同时四向外攘。而符合这个意义的“外攘四夷”，只能指西、南通西南夷，北征匈奴，东征戴置苍海郡（在朝鲜半岛中部东海岸），——那个四向并举的时期。通西南夷始于元光五年夏天，北征匈奴始于元光六年（真正大举北攘是在元朔二年卫青收复河南地，置朔方郡才开始的），东置苍海郡始于元朔一年年底。可见“外攘四夷”是始于元朔一年年底。在元朔三年春罢苍海郡秋罢通西南夷后，《史记》就不称“外攘四夷”了。例如《史记·汲郑列传》讲的“征匈奴，招怀四夷”，是指元朔五年汲黯从主爵都尉徙为右内史之时。该《传》写郑当时的时候讲的“汉征匈奴，招四夷”是指郑当时元狩四年从大农令废为庶人之时。“招怀四夷”、“招四夷”不是“外攘”，而是一种主观姿态，不是实力扩张。因为这两个时间是在罢苍海郡、罢通西南夷之后，

东、西、南三个方向已不外攘了。所以《史记》宁肯用两句话讲，也不用“外攘四夷”一语。可见“外攘四夷”确实是指同时四向外攘。时间是从元朔一年年底置苍海郡起，到元朔三年春天罢苍海郡止。《史记·儒林列传》那段话里讲公孙弘“位至公卿”，是指升左内史（卿），还是指升御史大夫（公），还是升丞相（公）？我们说，他升左内史是在元光五年，尚未开始“外攘四夷”，升丞相是在元朔五年，已在“外攘四夷”之后，（如果他升了丞相，就会讲位至丞相，决不会讲“位至公卿”，因为丞相比一般公卿显赫得多）只有升御史大夫是在“外攘四夷”时期。“元朔三年，张敖免，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苍海郡，北筑朔方之郡”。<sup>③</sup>这里恰巧说明，确实是在同时四向外攘时期公孙弘升为公（御史大夫）。《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公孙弘升御史大夫是元朔三年第一个任免事项，时间必是元朔三年年初。《汉书·主父偃传》也能证明公孙弘是在元朔三年年初升御史大夫的。主父偃在元朔二年秋天任齐相去齐。一到齐，因治齐王次昌的坏事太急，齐王自杀，他因此获罪被诛。该《传》讲，是在御史大夫公孙弘的要求下诛的。因为罪是元朔二年秋的，诛主父偃必定在元朔三年年初，其时公孙弘已经是御史大夫了。这表明公孙弘是在元朔三年之最初升任御史大夫的。这样，同时符合两条时间资料的时间就找出来了：从元朔三年之最初公孙弘升御史大夫起，到这年春罢苍海郡结束“外攘四夷”止。董仲舒就是在这段极短的时间内指责公孙弘“从谀”，被赶到胶西去了。

董仲舒是什么时候退休的呢？《史记·

儒林列传》讲：“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汉书·董仲舒传》也讲：“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获罪，病免。”两者都讲，胶西王尚在闻名客气阶段，董仲舒就托病退休了。两者又都用了“恐久”一词，说明董仲舒到胶西不久就退休了。这是因为胶西王刘端为人暴戾、残忍、喜怒无常、屡次杀国相。国相一不顺他的心意，就巫告杀之，或者“诈药杀之”。“故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sup>④</sup>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国王手下任职，谁也不肯久待，何况董仲舒也确实有病：“宿有固疾，体枯，气少”，<sup>⑤</sup>托病退休是很自然的。一般讲是在第二年（元朔四年），至迟也在第三年就退休了。否则《传》内就不能用“恐久”一词。

因为对策是专对未出茅庐或者仅有微职的人设的，而诸侯相是食禄二千石的朝廷大臣，是不能参加对策的。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董仲舒在元朔三年出任胶西相以后，是决不能参加对策的。更何况他到胶西后不久就退休了，在苏诚鉴所说的那个对策时间之前就退休了。所以，元朔五年对策说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 ① 《学术研究》1979年第六期。
- ② 《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三期。
- ③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 ④ 《汉书·景十三王传》。
- ⑤ 《太平御览·方术部·医四》。

作者单位：上海化工机械厂工艺科  
责任编辑：凌峰

## 一个重要的理论探索

——钟阳胜《科学生产力效应理论导论》评介

沐 刃

最近，钟阳胜同志的新著《科学生产力效应理论导论》出版了。

科学生产力效应理论，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理论新课题。科学，作为人类精神生产力，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支配性因素。邓小平同志曾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命题，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确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践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理论课题，需要我们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例如，如何把握科学生产力的性质及其在社会生产力运动、发展中的地位和职能作用，如何把握科学作为精神生产力转化为物质生产力的基础、条件、途径和一般规律，如何把握社会生产力以至人类社会在科学作用下发展的一般趋势，等等。钟阳胜同志敏锐地抓住了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在《科学生产力效应理论导论》一书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迫切的实践意义。

《科学生产力效应理论导论》一书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导论，从理论上系统地探讨了科学生产力的含义，科学在物质生产力发展动力系统中的地位和职能效应，科学生产力效应过程实现的条件、途径以及科学生产力效应规律作用的一般趋势等问题。第二部分是专题论文，可以说，这部分论文是对科学生产力效应理论的实证分析。

《科学生产力效应理论导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探讨科学生产力效应问题时，始终贯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思想红线。同时，把哲学、历史、理论、现实诸方面的考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证逻辑

的统一，其中，不乏创造性的见解。

例如，关于科学，作者不是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知识体系，而是强调，科学是历史地积累起来的进行生产活动的精神力量，即精神生产力。精神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的统一构成为社会生产力。作者在考察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的相互关系时，揭示了精神生产力对于物质生产力的动力作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根源于内部矛盾运动以及它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而且根源于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根源于科学生产力在物质生产力运动中的效应作用。科学的每一次变革，都引起了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一次变革。正因为如此，作者特别重视科学生产力的效应理论问题，即科学作为精神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以及它在物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职能作用。这就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了物质生产力为什么会发展，以及怎么发展这个重大问题。不言而喻，这个方面的研究是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的。

改造劳动对象，应用科学技术发现和利用新的能源，应用科学技术知识改革和完善物质生产过程的管理与组织。无疑，作者的这一系列探讨，为在实践中不断解决科学生产力的效应问题提供了富于启发性的见解。

作者就对科学生产力效应问题的分析，得出了三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其一，科学的发展首先取决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以物质为“中介”，借助于物质生产力，才能参与物质生产过程，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力

量。其二，在科学转化为物质生产力的一般规律的作用下，物质生产力存在按几何级数加速发展的趋势，这就使一个国家有可能通过加速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使物质生产力在短期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也有可能因忽视科学技术的开发应用，在短期内被远远地抛于世界先进水平之后。据此，作者提出第三个结论，一个政党、一个阶级、一个国家不能离开科学的发展、应用，片面地强调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对物质生产力的作用；必须高度重视和加速开发，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同时，要重视调整 and 改革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最大限度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社会生产中的大规模应用。作者的这些精辟结论，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生产力效应理论的科学性与党性的统一，而且也是我们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政策的极为重要的理论依据。

在著作的第二部分，作者就“智力劳动的价值”、“封建主义和我国近代科学的落伍”、“科学与社会分析法和社会管理”、“关于技术引进若干问题的探讨”、“珠江三角洲经济成长新阶段的矛盾与经济技术模式”等问题进行多角度的专题研

究，既是对科学生产力效应理论的实证分析，也是对这种理论的实践应用。

科学生产力效应是一个新的理论课题。钟阳胜同志的《科学生产力效应理论导论》一书，也只是个初步的探索，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例如，如何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更加科学地揭示科学生产力的效应规律，科学对于社会其他方面（如政治、文化、社会关系、思想意识）发展的影响和革命性作用，科学技术开发与应用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科学生产力效应运动的机理和机制等等。但是，钟阳胜同志的新著，至少是比较系统地把问题提出来了，并作出了原则性的理论分析，对科学生产力效应理论的建立，起了奠基性作用。相信在今后，科学生产力效应问题，会为越来越多的富于战略意识的人们所关注，科学生产力效应理论将会逐步发展、完善、成熟，并对我们改造世界的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政改办  
责任编辑：周 华

## · 书 评 ·

# 深化和拓展中国哲学研究的尝试

——评《中国哲学的探索与困惑》（殷商—魏晋）

李文义

几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研究方法上却缺少大的突破。传统的研究方法总有囿于僵化模式的感觉，对各个时期哲学的发展多讲是什么，而少讲为什么，缺乏对认知方式进行深层剖析，从思维结构角度把握各个时期哲学的探索。最近，冯达文编著的《中国哲学的探索与困惑》（殷商—魏晋）（以下简称“冯著”）一书，在研究方法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上述不足。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是直觉型的，它从

体验现实人生出发，通过具体的直观事物，由整体的直观到经验再到直觉。虽然这样，中国哲学的发展和变化却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自己演变的内在逻辑。如何从思维方式上来探讨中国哲学发展的这一逻辑结构，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一个新课题。冯著正是由此出发，着眼于中国哲学的宏观整体，立足于各个时期哲学概念范畴的深层剖析，把中国古代哲人凭直觉把握到的诸多哲学资料加以梳理，还原为知性的形式，从而分析各个时期哲学发展的整体结构，从中揭示出哲



学文化的整体精神、价值取向和演进过程。这种方法，有利于深化研究层次，也有利于拓展研究领域。由此，便形成了如下几个特点。

中国哲学的特点不同于西方哲学。中国古代哲人思考和论证问题，主要是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是从现实事物中，通过对现实人生的感受来提出自己的观点。二是从在他之前的哲学体系存在的问题出发，或是继承发扬，或是对照反驳，另立新议。无论怎样，每个哲学体系都有自己的逻辑起点和贯穿其中的主线，有自己的整体结构，这种整体结构大异于西方哲学。因此冯著对中国古代哲学体系的探索，没有象传统哲学史著作那样，采用西方哲学模式，把它肢解为本体论、认识论、发展观、历史观“四大块”来条分缕析，而是寻找古代哲人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然后以此推演出整个哲学体系，展现其整体特征，并使在此之后的其它哲学体系能够在与前述的对照中更好地展现自己的内容和特色。打破“四大块”模式，使作者所述的每个哲学体系都显得体系完整，线条清楚，而且通过不同学派体系的互相对比，能使它们反差强烈，特点分明。如孔孟儒学与老庄哲学的对比，前者是从现存普遍世俗情理来建构自己的仁学体系，它所强调的是个体的人格追求，而后者则从万物的反面，得出悲观厌世的人生观。两者相较，对比鲜明，若非从整体上把握，而仅局限于本体论、认识论、发展观或历史观上的对比，那显然是不够的，而且把中国哲学体系分为“四大块”来分析，这是否适合它自身的特点，一直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以前的中国哲学思想史著作除了多以“四大块”来划分外，在研究方法上几乎都以归纳为主，即用堆积材料的方法来讨论中国哲学发展变化的规律。冯著则突出地强调了逻辑演绎法，这又是该书的一个特点。用归纳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便于较完整地阐述各个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观点，但是，一味强调堆积材料，却很难把握各个时代哲学思潮的思维结构和认知方式，而且对说明各哲学体系的源与流，对说明各不同学派思想观点的相互影响等，都缺乏较强的说服力。冯著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巧妙地把演绎法和归纳法结合起来，又突出了前者。作者首先对哲学史料进行了广泛搜集和筛选，然后对若干哲学范畴进行深层剖析，顺藤摸瓜，一环扣一环，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出令人信服结论。作者从“有典

有册”有文字记载的殷商开始，从“帝”观念推及“天”与“德”的分离，又从此推及儒学的产生发展和老庄哲学对它的否定，一直推演下去，直至魏晋玄学，给人展现出一幅较完整的哲学脉络，让人信服地随着作者的思路步入中国古代哲人的睿智殿堂，尽情地领略古代哲人的智慧。最后人们会清晰地发现，原来表面上似不相关的各种哲学体系，实际上都是互为因果的，各种哲学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逻辑整体。通过演绎论证，各个时代思潮的思维结构、认知方式，及其所显示的哲学文化的整体精神、价值取向和演进过程都一一被揭示出来。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哲学既然重视直觉的人生体验，缺乏逻辑推理又被认为是它的不足，那么把中国哲人用直觉把握到的东西还原为知性的形式，把直觉体验用逻辑方法推演出来，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哲学重视直觉缺少逻辑这一缺陷的弥补。

冯著的第三个特点是，它除了研究每个哲学观点外，还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结构问题。比如，作者认为殷人的思维具有单一、单向、垂直的结构特征，孔孟儒学在思维方式上具有常规性的特点，老庄哲学则具有反常规性的特点等。这种对思维方式思维结构的探讨，对于揭示各个时代精神的思想脉络，讲清各个时期哲学发展的轨迹，是至关重要不可缺少的。过去的哲学思想史著作，由于过分重视古代哲人的哲学观点，只讲它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而较少讲他们探讨问题的角度。古代哲学家是从何角度捕捉问题的，他在捕捉到素材后又是如何加工的，用什么方法，这些问题在冯著中首次作了剖析。

冯著的探索也不可避免有其不足之处。中国传统思维既然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那么在某些方面它不可避免具有意会性，而直观的、具有意会性的东西往往不易用逻辑表达出来。正由于此，作者在阐述老庄哲学思想时，对老庄那种清静无为思想境界的阐释不是很完善。另一点不足之处是引文太多，一些引文不易读懂，这对许多读者来说阅读困难较大，作者如果把引文编减，再加强一下理论发挥，效果或许更好一些。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范英

# 从一个具体部门研究明代经济史的良好开端

——读《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

蒋祖缘

我高兴地读完了黄启臣著的《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这固然是在此之前，还没有一本专门研究明代钢铁生产的专著问世，而这本著作在比较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对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及其原因、经营管理方式、铁课和铁矿工的反封建斗争等许多重大课题作了有见地的探讨和研究。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这个方面的有价值的历史知识，而且给人以新的启迪。

毫无疑问，研究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是研究明代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不仅仅是明代钢铁生产在整个手工业生产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还因为明代经济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必然要求把整个经济史作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提高明代经济史综合研究的水平和解决明代经济史研究中有待解决的若干重要问题。《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就是从一个具体部门研究明代经济史的良好开端。如果从一个具体部门研究明代经济史的著作多了起来，

就完全可以相信明代经济史的研究会开出比过去更为鲜艳的花朵，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

研究明代的钢铁生产，自然不能回避明代采矿冶炼业和铸铁业有无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这一重要问题，著者对明代的采矿冶炼业和铸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作了多层次的论述，对生产规模和分工以及雇主、矿工的身份作了探讨，且展示出官营与民营铁冶业的共性和不同的特点。进而提出必须以自由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分工和雇主以资本为主要手段对工人进行剥削来判断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而不能仅从商品生产、生产规模和分工来断定明代的冶铁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关系的见解。著者还就一些明代经济史研究者援引《嘉靖徽州府志》的一则冶铁业史料来论证明代采矿冶炼业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而进行了详尽的考证。认为这则史料是《嘉靖徽州府志》记录元代胡编校《星源图志》上所载铁冶业的情况，并非明代嘉靖年间的史实。著者在作了种种分析与考证之后得出结论说：“到目前为止，还

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明代民营大作坊采矿冶炼业和铸铁业两个生产部门的经营方式已经具备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特点，因而明代民营铁冶业的资本主义萌芽还不能说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阶段。”我们知道，经济史研究既要占有翔实材料，更需要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作深入的解剖，提出自己的见解。只有这样，经济史的研究才能显示出活力，才能步步深入，才能经过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对若干重要问题做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结论。

断代史的研究，固然不同于通史的研究，但它与通史的关系又非常密切。因为，没有纵向与横向的联系，孤立地去研究断代史或断代经济史，必然如同“瞎子摸象”，得不到要领。著者研究明代钢铁生产，注意把它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和世界历史范围内进行考察，从而能够显示出明代钢铁生产的特征和意义。比方说，著者分别列举了唐、宋、元、明历代的生铁产量，进而说明明代的“生铁产量发展到了划时代的水平。”根据世界历史资料的论载，说明“我国在15至17世纪前半期，钢铁生产已经超过了17世纪至18世纪40年代世界各国的钢产量。”又比方说，在论述明代勘探铁矿和炼铁炉的技术和炼钢技术的进步与创新时，总是与中国明代以前的朝代和世

界各国同时期乃至稍后的状况进行比较，进而说明明代“苏钢”的冶炼技术，“在世界炼钢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并且认为“这种先进的炼钢技术完全可以沿着自己发展的途径，转变为近代化和现代化的炼钢技术的。”著者以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肯定了中国明代的生铁产量和炼钢技术不仅不落后于外国，且处于世界最先进的地位。至于这个发展过程被打断，中国的钢铁生产由盛而衰，甚至走上落后的道路，著者认为那是到了清朝，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国内腐朽的封建统治造成的。

当然，即就明代来说，钢铁生产虽然达到了高度的发展，但著者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它的成就和进步方面，而是实事求是地剖析了明朝政府时严时松、时开时闭的统治矿业的政策以及明代中后期的不断增重铁课，以达到封建政府严格控制开矿的目的和给予民营冶铁业以极大的打击和摧残。

本书的不足，主要是对钢铁生产在整个明代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影响）没有展开论述。在与西欧国家钢铁生产比较中，运用西方国家钢铁生产同时期的资料尚有欠缺，有待进一步发掘。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  
责任编辑：凌峰

## 全国第六次城市精神文明建设 建设理论讨论会在广州召开

本刊记者范英报导：为期5天的“全国第六次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理论讨论会”于1990年3月底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40个城市的150多位代表，以及广州地区部分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共提交了100多篇论文。

会议以党的十三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思想，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从理论与实践，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冷静思考过去，冷静考虑未来，探讨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与规律，以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改变两个文明建设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现象，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振奋民族精神，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搞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促进国民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

这次会议的重点议题是：1. 总结10年来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和问题，经验与教训；2. 研究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发展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对策；3. 探讨如何全面改善和提高社会主义公民的素质和全民族的素质；4. 如何解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流、《求是》杂志副总编吴建国、中宣部理论局局长靳辉明等。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杨资元主持了开幕式。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兼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主任张汉青在大会上作了《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报告。

## “广东社会安定与发展理论研讨会”综述

1990年3月3日—5日，广东社会学学会与江门市的社科联、市委党校、五邑大学、教育学院，在江门市联合举行了“广东社会安定与发展理论研讨会”。现将其中讨论的两个问题介绍如下：

### 一、必须重视广东社会基层政权建设

与会同志认为：当前中国压倒一切的问题是稳定。社会基层组织是整个社会的细胞。基层政权建设的状况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安定与发展密切相关。广东大部分地区的基层政权建设较好或基本正常，这是主流，但一些地方所出现的土地山林管理失控、计划生育不落实、恶性案件时有发生等，直接或间接地潜存着社会的一些不安定因素。

主要原因在于基层政权建设不力。一些基层政权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主要表现是：①对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认识薄弱；②一些基层政权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没有抓好；③管理不善，缺乏凝聚力；④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和体制还不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此，与会者建议：①必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增强党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②依照有关基层政权组织法，成立有权威、有活力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成为党和政府与群众联系的纽带，发动公民参政议政，发扬基层社会主义民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充分发挥其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③实现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不断提高基层选举的民主程度，建立申诉制度，改革组织制度，实现民主管理和监督；④发挥农村社区文化的导向作用；⑤完善基层集体经济组织，加强基层政权组织行政管理和群众自治的经济基础；⑥建立、健全基层政权组织的服务体系，包括法律、科学、技术、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社会保障等服务，为广大群众

解除后顾之忧；⑦整治瘫痪半瘫痪的基层政权组织，焕发其活力，促进社会稳定。

### 二、人口流动的二重性

与会者认为：社会安定并不等于不存在社会流动。关键是如何合理利用与实现合理、合法的社会流动，更好地发挥其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作用。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合理、不合法的低水平社会流动对社会秩序和治安所带来的副作用。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更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广东境内的“流民”不少。所谓“流民”就是“流动的公民”，指的是非政府有计划的自发性的迁徙，其中也包括合理的“人口流动”，亦包括盲目不合理的“人口流动”，称之为“盲流”。“盲流”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较大，其中许多人走上流乞与犯罪之路，导致低层次的失业与犯罪，增加了社会交通、公安、粮食、劳动、工商、民政、计划生育等诸方面的困难。广东“流民”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现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未能充分发展，产业结构正在调整，人口数量激增和质量日益下降形成强烈反差的结果，这是商品经济社会中的必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从实质上说也是社会多余劳动力和空闲生产资料的自发性结合，是劳动力流动规律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控制人口流动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控制人口增长过快是社会稳定的战略要求，提高人口素质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应以科学的方式、方法来判断社会流动的结构、素质、流入方式和流速等，寻找解决劳动力就业的根本出路。

此外，这次研讨会还就社会违法犯罪现象与社会安定、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安定、关心残疾人等论题进行了探讨。

（光力）



# 珠海市体育服务总公司



本公司是全民所有制(下属企业部分是中外合资)企业,是工业、商业、服务、广告、保健、卫生等多功能经营的综合性公司。现与国内20余个省、市及港、澳、台建立了经营性业务往来。欢迎各地客商来料加工,合资合作经营或洽谈贸易。

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中路胡湾体育场

电话: 224091 228698

222352

电挂: 7555

邮编: 519000

总经理: 孙志强



总公司下属珠海市体育医疗保健中心,集气功、健身、健美、美容和医疗为一体,家主治,条件优越。



总公司下属文体用品中心,批发、零售各类文化体育、科教、旅游工艺品、服装等设名牌体育用品部,兼营进出口代理业务。

电话: 226430

电挂: 7555

经理: 李艳辉



# 肇庆市华侨房产建设公司

肇庆市华侨房产建设公司（原广东省华侨房产建设服务公司肇庆市分公司）是市府侨务办公室领导的国营合法企业，具有法人资格。服务对象包括广大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归侨、侨属、团体、单位以及社会各界人士。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为上述人士或单位提供商品住宅，并接受国内、外投资、引资开发房地产；承接委托新建、维修、代管、代购、代销侨房；家电装修等。

公司的宗旨是：坚持急客户所需，一如既往贯彻国家侨务政策，热情服务，严守信用。

凡用侨汇购买本公司建造的住宅、别墅，均可以按照侨务政策规定，办理“农转非”入户肇庆市端州区内，享受市区居民的同等待遇。购买建筑面积50M<sup>2</sup>至80M<sup>2</sup>米以上的入户一至二人。入户、粮食手续由本公司代为办妥。单位、个人用人民币购买住宅、别墅或预约建造独家住宅、别墅，一样欢迎。所购住宅、别墅，均到肇庆市公证处签署购房合同公证。房屋所有权归业主，可以出租、转让、继承、赠送或出售。房屋产权契证由市有关部门统一发给，受国家法律保护。



办公地址：广东省肇庆市文明路口三十八号侨务楼二楼

经理：温炳常 副经理：梁作流

联系人：谭汝坚 覃少明 赵仕坚

电话：231553 电挂：0963 邮政编码：526040

